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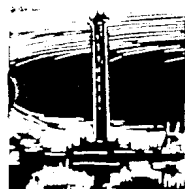


陈嘉庚传

陈碧笙 杨国桢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陈嘉庚传



陈碧笙 杨国桢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陈嘉庚
陈碧笙 杨国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6.75印张 6插页 161千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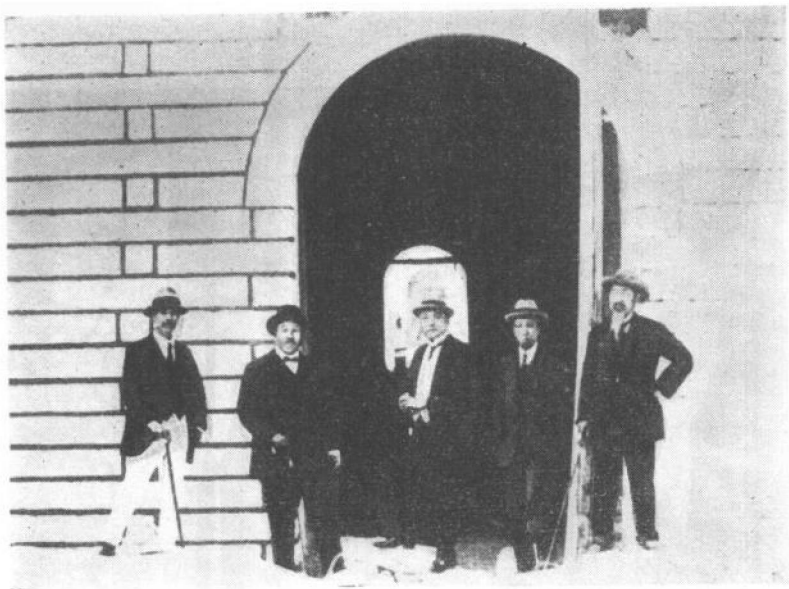
书号：11173·43 定价：0.84元



陈嘉庚先生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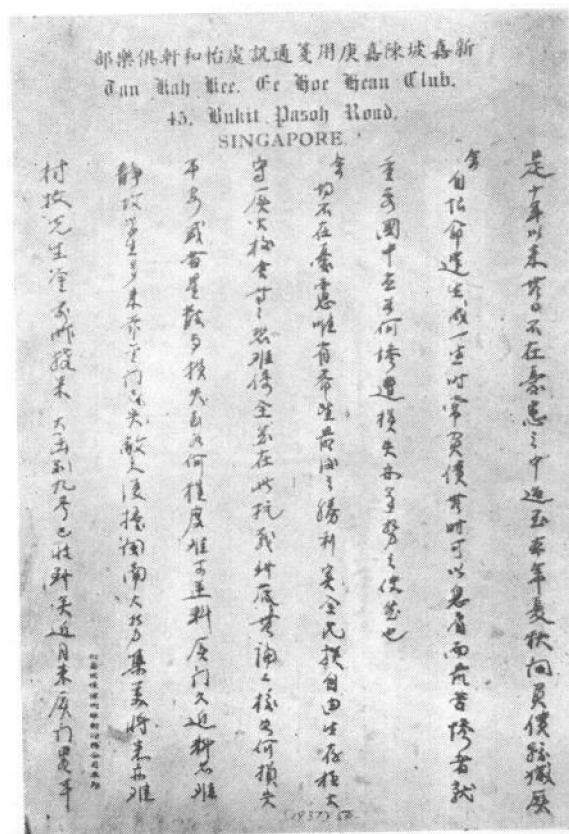


陈嘉庚先生德配张夫人像



上：厦门大学初建时陈嘉庚先生（左一）同新加坡闽侨林顺义先生（中）、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先生（右一）前往视察。

下：一九三七年八月陈嘉庚先生致集美学校校长陈村牧信的手迹。



抗日战争时期陈嘉庚先生担任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主席。图为在新加坡号召华侨支持祖国抗日。



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traditional Japanese house with a thatched roof. A person is standing in the open doorway. The house has white walls and a dark thatched roof. There are trees and bushes in the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增為
光國

卷之二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重庆各界为陈嘉庚先生举行安全



上：一九五〇年三月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各社团举行的欢迎会上报告祖国解放后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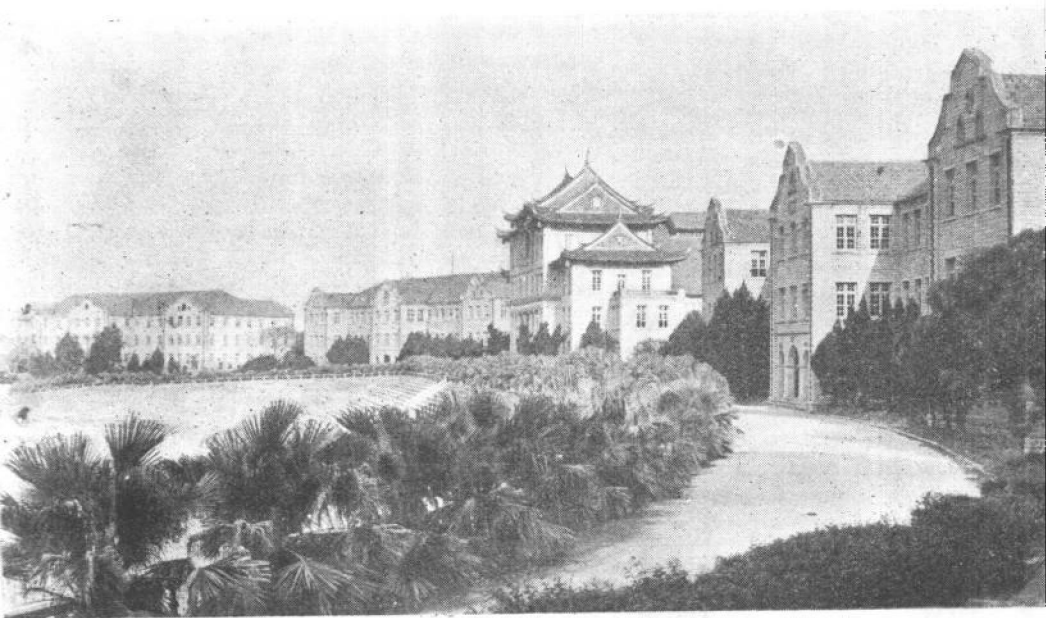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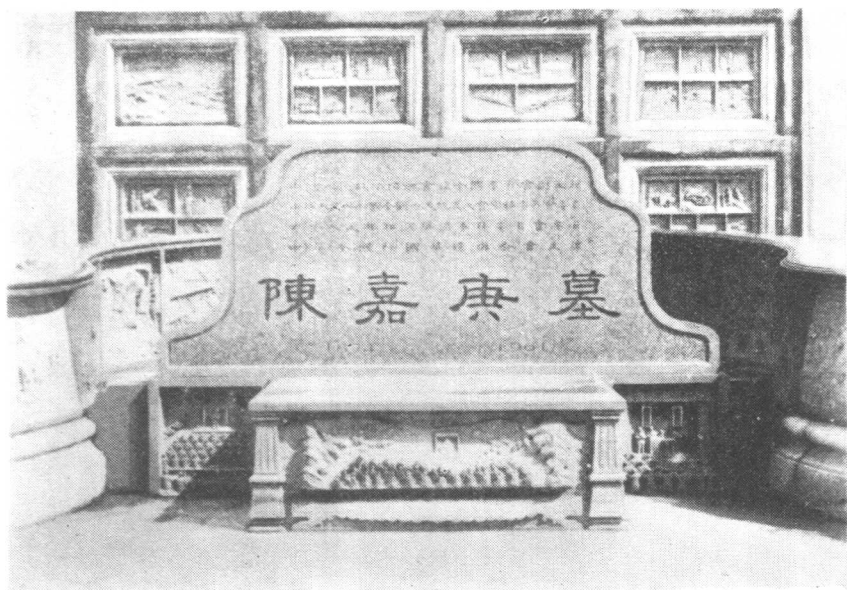
下：陈嘉庚先生在延安参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举行代表大会的会堂。

上：一九五五年陈嘉庚先生再度访问延安，途经黄陵县时参谒黄帝陵。



下：陈嘉庚先生所创建的厦门大学部份校舍。





陈嘉庚先生之墓

集美鳌园外景



前 言

陈嘉庚是爱国华侨的一面光辉旗帜，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关于他的生平事迹，虽然已有几种著述行世，或则语焉不详，或则仅限于某一角度，均未足窥其全貌。我们从七十年代初开始搜集各方有关资料，1973年整理成《陈嘉庚年谱》一稿，作为写传的依据。但因为事务繁忙，未遑兼顾，迟到1979年才开始动笔，1980年完成初稿，1981年厦门大学六十年校庆纪念期间，征求了某些熟悉陈嘉庚生平事迹的人士的意见。本书就是在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定稿的。由于作者水平的限制，加上付印时间紧迫，许多意见未能收齐，错误与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深望广大读者和熟悉陈氏生平的同志不客气地加以批评指正。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承陈村牧、陈毅明等同志提了不少宝贵意见，有许多重要资料是集美学校校委会和厦门华侨博物院提供的，谨在此表示感谢。本书第一章至第十章主要是杨国桢执笔的，第十一章以后主要是陈碧笙执笔的，并在此附带说明。

陈碧笙 杨国桢

一九八一年五月于厦门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初次出洋·····	(1)
第二章	发 家·····	(11)
第三章	从加入同盟会到倾资兴学·····	(19)
第四章	厦门大学的创办和海外实业的盛衰·····	(29)
第五章	从抵制日货到支援祖国抗战·····	(42)
第六章	回国慰劳·····	(57)
第七章	访问延安·····	(66)
第八章	为民请命·····	(77)
第九章	威武不屈·····	(98)
第十章	避难爪哇·····	(108)
第十一章	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	(124)
第十二章	迎接祖国解放·····	(136)
第十三章	参加开国盛典与畅游南北·····	(154)
第十四章	为着祖国的富强和统一·····	(169)
第十五章	晚 年·····	(178)
附 录		
	试论陈嘉庚·····	陈碧笙(191)
	陈嘉庚年表·····	(208)
	主要参考书目·····	(214)

第一章 初次出洋

陈嘉庚出生于公元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多事之秋。

一八四〇——一八四二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割让香港，开放五口通商，开始丧失领土主权。一八五六——一八六〇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中国失去了更多的主权。仅割地一项，沙俄通过一八五八年的《璦琿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一八六〇年通过《北京条约》割去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一八六四年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此外，允许各国公使驻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等地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到内地游历、通商、传教，拱手出卖海关主权，等等。一八六四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被清军和外国洋枪队联合绞杀，中华民族灭种亡国的危机日益紧迫了。

由于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日本，一

开始便把征服全中国作为自己的国策，并首先把魔爪伸向我国宝岛台湾。一八七四年五月，日本借口琉球遭难船民事件，悍然发兵三千进犯台湾，在琅玕登陆。这次军事进犯虽因台湾各族人民的抵抗、清军大举增援入台以及英国的干预而未能得逞，但同年十月三十一日签订的《中日北京专约》，清政府反而要赔偿日本军费五十万两，并承认琉球是日本的属国，这无疑是中国的奇耻大辱。

陈嘉庚就是在这十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一日（农历九月十二日）出生在与台湾一水相望的闽南海滨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市集美镇）。

当年的集美社，是一个不知名的渔村。流贯同安县的浔江（即东溪），从石浔出海。浔江西岸，大陆延伸到集美，已是“尽尾”了，往前便是大海，隔海十余里就是厦门岛。因此，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便用这个地理特征来做地名，叫做“浔尾”、“尽尾”，集美即是由谐音转变而来的雅称。

集美突出地踞伏于海滨，不大的地方零零落地散布着九个居民点，即后尾、塘墘、向西、清宅、二房、上听、渡头、郭厝、岑头等九角头。与它相邻的有孙厝、浒井等社，再远一点，天马山下，即是属于板桥乡的二十四社。这些地方，属泉州府同安县管辖，地方偏僻，土壤贫瘠，人们多倚海为生，海滩上置石养蚝（牡蛎），是主要的生活出路。

集美社住民大多姓陈。象中国绝大多数地方一样，这支陈氏家族是几千年前中国封建社会家族制度的产物。陈氏在中国历史上，可以上溯到周代，东晋中原士族大举南渡后入闽，宋末迁至同安县下亭溪上庐（今属坂头林场），元时二世祖陈基，住嘉禾里（厦门），因为隔水穹远，往返不便，从亭溪迁来集美渡头，以养鸭为生，日久便在东坛求地盖房，定居下来。到陈嘉庚这一辈，已

是第十九世了^①。

集美陈氏除在明代天启年间出了一名进士之外，其余都没有功名。族内只有少数地主比较富裕，大多数是贫苦的劳动人民。明末郑成功据金、厦两岛抗清，集美曾是郑军的据点之一，并于此发生过多次激战。相传陈氏青年有不少参加了郑军，至今在海滨的山丘上还留有“延平故垒”和“国姓井”等遗迹。有清一代，沿海劳动人民因不堪封建剥削结伙出洋谋生的日多。特别在鸦片战争以后，厦门成了对外通商口岸之一，附近劳动人民被外国洋行拐骗到南洋、美洲等地当“猪仔”（苦力）的，每批动以百计。那些经过九死一生得以幸存下来的人们，又牵引同乡、同族的贫苦农民前往谋生。这样，“过番”当“南洋客”，便成了劳动人民死里求生的一条路。集美社有不少的穷人，在生机断绝的关头，也走上这条路。

陈嘉庚的曾祖父陈时赐，有兄弟五人，鸦片战争以前，有居乡的，有出洋的。出洋的一支定居在槟榔屿和新加坡。陈嘉庚的祖父陈簪集，在本社“耕渔自给”，所生三子，老大陈纓节、老二陈纓酌、老三陈纓杞（又名杞柏，字如松），都到过南洋^②。陈嘉庚的父亲陈杞柏，就是在少年时抛下新婚的妻子，只身前往新加坡的。到陈嘉庚出世时，他已是一个拥有一家米店的中等侨商了。

陈嘉庚是在父亲远离的情况下，由母亲张氏一手抚育长大的。那时，父亲自新加坡的汇款时继时辍，他和同社其他孩子一样，必须帮助家里做些拔花生、剖蚝之类的轻活。一八八二年（光绪八年），陈嘉庚九岁，始入本社“南轩私塾”读书。塾师陈寅，是个迂腐的学究，给孩子们教授《三字经》和《四书》，仅仅照本宣科，未加解说。学童们只是跟着念，俗称“念书歌”，

①② 陈嘉庚自述手稿，集美学校校委会藏。参见陈厥祥：《集美志》。

学了几年还不懂文义。加上塾师不太负责，来一个月，即回家休息一月或半月，学童们时读时辍，学业进步极慢。因此陈嘉庚就学多年，识字甚少。直到十六岁才对古文和报刊文字“略有一知半解”^①。早年的私塾生活，使他对旧式教育的弊病有了深刻的印象。

陈嘉庚的懂事，主要还是从乡社父老们的口授言传中得来的。农渔业劳动之余，社里老人们往往借着抽烟喝茶的机会，说古道今，议论时政，陈嘉庚和其他孩子们从他们的谈话中，得到了一些知识。

一八八四年，陈嘉庚十一岁。这年八月，法军侵略舰队于炮轰台湾基隆之后，又进而突袭福州马尾，把清廷辛苦建造的南洋水师军舰十一艘，商船十九艘炸沉。国耻愁云笼罩大地，集美社的人们同声叹息。祸不单行，闽南一带又发生大旱灾，接着瘟疫流行，人民死亡相继，集美社的乡亲们死的死，逃的逃。陈嘉庚的亲族三十余家，一百多口，生存的只有半数，留在社里的人就更少了。

陈嘉庚没有跟着人流出逃。他站在延平故垒上面，眼望着碧绿无边的大海和载满“番客”的帆船，想着国运的颠危和乡亲们的苦痛，心潮似大海的波涛在翻滚。平日父老们讲述的“国姓爷”（郑成功）抗清驱荷的高大形象，栩栩如生地浮现出来，引起他的无限向往与敬慕。他多么希望有“国姓爷”这样的英雄出世，解救民众于水火啊！

爱国爱乡的思想就这样随着陈嘉庚年纪的增加，逐渐在心坎里生根、发芽。不过今后该走什么道路，他还不曾想过。随后，塾师陈寅去世，“南轩私塾”停办，陈嘉庚失学。这时，他父亲来信催他前往新加坡。憧憬前程，茫茫无措的陈嘉庚，开始踏上

^① 陈嘉庚：《个人企业追记》，“未成人经过”。

了“南洋客”的路途。

二

一八九〇年（光绪十七年）秋，十七岁的陈嘉庚来到新加坡，在其父经营的“顺安”号米店学商。

新加坡面积五百八十平方公里，紧紧扼着马六甲海峡的咽喉，是东西洋交通的枢纽，同时又是东南亚经济文化的中心，当时与槟榔屿、马六甲同是英国的海峡殖民地。英国是在国内进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于一八一九年夺取新加坡的。但是，比英国早得多，即在十四世纪时，明朝统治下的中国人就已经移徙到这里，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开发土地，为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英国占领新加坡后，总督莱佛士更是多方俘掠中国“苦力”到此从事奴隶劳动。从一八二〇年到一八三〇年，每年运到新加坡的中国苦力有六千至八千人。从一八八一年后的十七年间，平均每年运到海峡殖民地的中国苦力达十一万人。正如莱佛士所供认的：“没有中国人，也就没有新加坡。”世世代代不断移徙和被掠卖而来的华人，大部分是开采金矿、锡矿的工人和耕垦荒地，种植树胶、凤梨、椰子、胡椒、蓝靛、甘密等各种蔬菜的农民，其余是木匠、铁匠、泥水匠、造船匠等手工业劳动者，也有商人或店员。在新加坡这块土地上，洒遍了中国苦力的血汗。

陈杞柏早年来新加坡，进入商界，以经营米业起家。他先后开设过“顺安”、“德安”、“复安”三家米号，后两家是与友人合股的，此时已归于侄儿名下。米号的业务，是从暹罗（泰国）、安南（越南）和缅甸诸米行采买大米，转售于新加坡各零售米店及外地商行。“顺安”号的经理兼管财政，由陈嘉庚的族叔担

任，他父亲及其眷属住在“顺安”号三楼上，每日午刻才下到二楼看书、接客，办理自己经营的硕莪厂和房地产的业务。陈嘉庚来后，就在“顺安”米店里协助族叔管理银钱货帐，兼任书记。

陈杞柏自发家之后，在新加坡娶了侧室，侧室死后，复娶一妾苏氏，生一子名天乞，年纪尚小。陈杞柏已多年不管店务，苏氏又嗜赌成癖，经常出外赌博，有时也招一些妇女来店聚赌。刚从纯朴的家乡出来的陈嘉庚对这种腐败生活当然看不惯，但亦无可奈何。

一八九二年，族叔回国，陈嘉庚接任“顺安”米号经理和财务。这一年，他父亲又创办“日新”号菠萝罐头厂。两三年间，陈杞柏经营的米号、房地产和硕莪厂均有获利，除欠账外，约存资产十余万元。

一八九三年秋，陈嘉庚回国，与板桥乡秀才张建壬之女宝果成婚。他在家乡集美住了将近两年，一面经营渔业，一面从塾师补习中文。一八九四年冬，出资二千元建立惕斋学塾。这是他捐资兴学的开端。

一八九五年夏天，陈嘉庚第二次出洋，仍在新加坡“顺安”米号任经理。二、三年间，由于房地产涨价，屋租收入增加，“顺安”规模不断扩大。除硕莪厂承顶与人外，在柔佛加办菠萝罐头厂一所，经营菠萝园数区，共数百英亩。

一八九七年冬，陈嘉庚的母亲在集美病逝，停柩在堂，他父亲以营业乏人照顾，未许奔丧。直到次年秋天，族叔南来接替后，才起程回国。陈嘉庚在乡择地筑了墓穴，但地理先生却说正穴方向不合，须待两年后下方能下葬。他不得不于一八九九年春带着妻子第三次前往新加坡，仍任“顺安”米号经理。此后两三年间，陈家营业颇有起色，“顺安”米号四万余元，菠萝罐头厂及

种植园六万余元，房地产除押款外存三十万元，“振安”铁店一万余元，另加营九八店“金胜美”号二万余元，白灰店“庆成”号一万余元，除利息外，实有资产三十五、六万元。陈杞柏于意得志满之余，开始筹建住宅。他仍旧不过问店务，“顺安”米号已交陈嘉庚经营，此时又将“金胜美”号和收买菠萝等业务，交给年方十六、七岁的陈天乞主持。陈嘉庚意识到陈天乞出掌财权，将为苏氏赌款大开方便之门，但这是父亲的决定，他不便谏阻。

陈嘉庚出洋前后十年，抱着光宗耀祖之心，代父经商，“公忠尽职”。正象他自己后来所说的：“无论在洋回梓，均不私蓄一文钱，家内亦不许有金饰”^①。陈家的资产增殖了三倍，他本可以象庶母那样挥金如土，或沉溺于灯红酒绿之中，这在当时的殖民地社会里，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陈嘉庚却不肯这样做。人们可以作这样或那样的解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作为刚从祖国踏上异邦土地的新人，比较多地保存着乡土赋予的朴实的气质。在这个“南洋客”的身上，逐利四方的经商精神与乡土观念，一开始就奇妙地交织在一起，而在长期反抗帝国主义欺侮凌辱的斗争环境中，渐渐溶凝成海外中华儿女所具有的那种坚韧刚强的民族气质和纯挚热烈的爱国爱乡精神。从二十岁回梓完婚、创办惕斋学塾时起，陈嘉庚“对党祠堂私塾及社会义务诸事，颇具热心”，他自己说是“出乎生性之自然”^②，实际上是这种气质和精神的反映。

有一次，陈嘉庚偶然从一位友人那里看到一本药书，名叫《验方新编》，是日本横滨中华会馆翻印赠送的非卖品。大概是劝人行善的缘故吧，书内还特地注明“任人印送”字样。陈嘉庚

① 陈嘉庚：《个人企业追记》，“回梓葬慈亲”。

②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弁言》。

翻着翻着，脑海中闪过闽南乡村瘟疫流行、村落邱墟的悲惨情景。啊，每村有一本这样的药书该有多好呀！他立即备款，托香港友人汇往日本横滨中华会馆定印，寄回家乡一带散发。前后几次，共有六七千本。最后一次加印五千本，因代寄的那家日本出口商店倒闭，不能继续印送而中止。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而且也未必有补于祖国危难于万一，但他那种热心公共事业的良好品质已开始显露出来了。

三

一九〇〇年冬，陈嘉庚为返乡葬母，第三次回国。

苦难的祖国，一片疮痍。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京师内外惨遭洗劫；秀丽的南方港口城市厦门，也被帝国主义瓜分的阴谋所笼罩。陈嘉庚记得，前一次离乡的时候，日本领事正逼迫厦门道台划出虎头山附近地面为日本租界，到新加坡只不过半年多的时间，便听说这竟已成了怵目惊心的事实！从厦门登岸，到处可见日本人和日籍浪人招摇过市，日本的台湾银行在此设立支行也快一年了，市面上已经流通着该行发行的纸币。就在几个月前，八月二十四日，日本领事利用日本僧侣失火焚毁东本愿寺事件，诬指中国人放火，派海军陆战队登陆恫吓要挟，闹得厦门居民逃散，商店闭门，至今不少人仍然谈虎色变。国弱民贫，灾难深重的祖国啊，出路在那里？！陈嘉庚的心中，郁结着无言的苦痛。

陈嘉庚在悲痛的气氛中安葬了母亲的灵柩。不久，厦门市區突遭大火，一连烧了两天一夜，千余间店屋烧为平地。颓垣败瓦，堆积满街。政府募工清理，挑往填垫海口提督、打铁两码头海滩。不到一个月，便填平了数万方尺的实地。此时，有人向陈嘉

庚建议投资购地建屋。他根据新加坡经营房地产业的经验，认为有利可图，连忙写信给父亲，并说明如肯承买，契据当用陈天乞名字。陈杞柏回信同意。陈嘉庚便于一九〇一年春向厦门官厅购买一万元的海填地，计划在一年或稍多一点的时间内，用两三万元先建一半约三十余间的店屋，然后出洋。

在陈嘉庚亲自管理的一年余中，建屋工程进展颇快。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日本籍民”倚势图谋强占一部分空地，陈嘉庚愤然向清政府提出控告，但因为国势衰弱，官吏畏日如虎，这场官司一直拖到一九〇三年上半年才告了结。

陈嘉庚打赢了官司，建筑店屋也告一段落，记起父亲几次托人催他速返，不宜久搁，便于这年七月第四次前往新加坡。

陈嘉庚刚踏入“顺安”米号店门，就感觉到一片衰败凌乱气象。到新住宅拜见父亲，见父亲脸上毫无笑容，越发不安。他连忙回店找族叔查问究竟。族叔身染半身不遂之疾，久已不管店务，此时神色沮丧，仅说外欠流动借款三十二万元，比前年差不多增加二倍。问其原因，则推说不知。陈嘉庚惊惶万状，夜不能寐。

第二天上午，陈嘉庚埋头查核来往账项，大体上弄出个眉目。原来，在他回国的三年间，苏氏母子利用接管菠萝罐头厂和“金胜美”、“庆成”两号以及族叔染病之机，任意支取舞弊十余万元，各业经营大为衰退，高利贷主趁势加重利息，加上房地产价格大跌，亏损二十五万元。好端端的一个“中兴之家”，已濒于衰落的境地了。

这对陈嘉庚来说，恰如晴天霹雳，打击非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陈嘉庚毕竟还只是初出茅庐的“南洋客”，只能用中国传统的天命观念去理解，把“祸不单行”归咎于“气数使然”^①了。

^① 陈嘉庚：《个人企业追记》，“气数或当然”。

自从陈嘉庚回到新加坡，族叔天天催他接事。负债高达二十五万元，如何撑得下去？厦门房地产不但一时难以变卖，而且不属自己名下，无权擅作主张。那么，出路何在呢？他感到渺茫。离开新加坡回国，一走了事吧！让苏氏母子照旧挥霍下去，最多只能维持三、四个月，欠账将更加无法偿还。在此艰危之际，又何忍弃父亲而他去！

他左思右想，最后毅然决定接受下来。在父亲的赞同下，他规定苏氏每月只能支取家用款两百元，同时着手结束“金胜美”、“庆成”、“振安”诸号业务，把柔佛菠萝罐头厂出顶，得款一万余元；在新加坡的菠萝罐头厂招入合伙，改称“日新公司”；又卖出空地一段，除还押款外，尚余五万余元。经过这种割肉补疮的办法，总算还清货款，“顺安”米号“名誉转隆”了。

不料到了交冬之后，米业减作，劣账迫收，再也无法维持，不得不于一九〇四年春宣告倒闭。算清账目，尚负债二十余万元，陈杞柏就这样走完了从发家到破产的历程。

陈嘉庚目睹父亲从繁盛到破产的情景，印象是深刻的。四十年后，他回忆当时的心情说：“家君一生数十年艰难辛苦，而结果竟遭此不幸，余是以抱恨无穷，立志不计久暂，力能作到者，决代清还以免影响信誉也。”^①他要从头起步，闯出一条新路来。这一年，陈嘉庚三十一岁。

^① 陈嘉庚：《个人企业追记》，“收束之结果”。

第二章 发 家

“顺安”米号收盘以后，陈嘉庚不愿意过赋闲生活，便集资七千余元，因陋就简，在距新加坡十英里外的洪水港山地，建造一所菠萝罐头厂，取名“新利川”。厂房用木料茅草搭成，机器买旧的，两个月便建成投产，刚好赶上了当年菠萝旺产的季节。与此同时，“日新公司”经理逝世，依照英国殖民地法律，其股权应当停止，公司归陈嘉庚独营。这是陈嘉庚独立经营的第一批工厂。

“日新公司”所经营的菠萝罐头厂，在与潮州人合办的半年间，获利一万八千余元，又原经理应得母利一万七千余元，须留待其家属向当地政府申领遗产手续，在这段期间，他可以利用这些资金扩大营业，这正给陈嘉庚的事业提供了发展的良机。

马来亚各区盛产菠萝，由菠萝加工制成的罐头，远销欧美各国，仅新加坡一地外销数量即年达二百万箱。每年夏初，菠萝源源上市，罐头生产进入旺季。那些经营菠萝罐头外销的商号和洋行，为了保证自己的货源，经常向厂商提供制罐用的原材料，如白铁片、白糖，枋箱之类，付款期为四十天，罐头厂工资每半个月清算一次，只有购买菠萝须用现款，所以不用多少活动资金，便可以获得厚利。“日新公司”在归陈嘉庚独办的半年间，获利甚

巨，对陈嘉庚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陈嘉庚自接管“日新公司”以后，暗地留心十余家同业的经营情况，发现他们对市场供销情况若明若暗，并不真正了解，生产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他了解到欧美洋行所采买的罐头，有条庄、块庄、方庄、枚庄、圆庄、刻花庄、糖庄、水庄、糖水各半庄等等，不下五六十种，其中以条庄、方庄、枚庄为最大宗，年产达一百七十八万箱，约占总产量百分之八九十，每次成交动辄千箱万箱，是同业争夺的中心。其余数十种杂庄年仅一二十万箱，每次成交量不过数十、百箱，向不引人注意；可是，价格较高，每箱要比普通装多得两三角至七、八角。陈嘉庚想，人弃我取，如果能够在这一门“小生意”上下点工夫，岂不积少成多，稳操胜券吗？因此，他每天上午九时左右，必同副手叶某分别到各洋行探询国外有无来电，需购何庄，把所有杂庄定货全部承揽下来。这样一来，市场需要的大部分杂庄菠萝罐头，几乎归他一家独占了。

那时候，新加坡连同柔佛等地共有厂商二十余家，竞争颇为剧烈，年获利万元以上的只有少数几家。陈嘉庚推其原因，大半是由于不大注意成本核算所致。各厂采购菠萝，历来都是按枚论价，而菠萝每枚的大小和成熟程度各不相同，有的还渗有一些坏烂，议价时不计重量，全凭眼力，而且须待每季停工后才开始计算盈亏。陈嘉庚对这种单凭经验，不核成本的盲目经营方法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规定当日购进的菠萝必须当日制完，当夜即结算盈亏，以此作为次日采购议价的标准。在生产中，尽量减少剖工上的损失。他自己不计劳瘁，每日清早及下午必到工厂巡视，掌握行情，指挥生产，“往往至五六点钟之久”，这比“日新”旧经理的做法，真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

经过三个月的生产，收入果然大增，“日新”获得净利近三

万元，“新利川”获利九千余元，两厂合约四万元，陈嘉庚自称为“初出茅庐”的第一次成功^①。

接着，陈嘉庚进一步扩大营业范围，他扩建了“新利川”的厂房，增置机器设备，还投资二万元，加开一家米店，名“谦益”号，兼作两个罐头厂的营业机关。为了预防菠萝丛老化减产，保证两厂原料的供应，又用二千五百元在“新利川”附近数英里外，购置空芭地五百英亩，取名“福山园”，立即雇工开荒种植菠萝，计划两年之内，产量可供生产菠萝罐头二万余箱之用。这是当地最大的菠萝种植园。这年冬季，虽然菠萝罐头市价略有下降，但由于经营得法，两厂仍获利二万余元，米店得利八千余元。总计独立经营的头一年，除伙伴红利外，陈嘉庚获实利六万余元。

就这样，陈嘉庚开始在新加坡的菠萝罐头制造业中站稳了脚跟。

二

一九〇五年夏季，“日新”、“新利川”两厂再次凌驾同业之上，获利三万余元。陈嘉庚心满意足之余，更图扩充。他看梧槽港是收购外埠菠萝的最好地点，便在该港口附近租屋，创办“日春”罐头厂，就近利用周围各地所产新鲜菠萝，加工制造。这时，他还发现制造冰糖有利可图，新加坡制糖业向爪哇糖商采购白糖，还款期一般为三四十天，而熬制冰糖仅需八九天，加上装配下船至多十五天，如使用信用汇票不到二十天便可以收到货款。这样不但免出资本，还可以预收一部分定金，真是一项不用本钱的生意。于是，他又在“日春”罐头厂内，添设熬制冰糖

^① 陈嘉庚：《个人企业追记》，“初步好机会”。

的车间。当时新加坡冰糖厂有十余家，全部由潮州华侨经营，熬糖用大锌锅，以木柴为燃料。陈嘉庚附设在“日春”内的冰糖煮锅，改用内铜外铁制成，与罐头厂同用一个蒸气炉，以木屑为燃料。这一改革，使燃料成本每担节省两三角，每日煮糖以二百余担计，便降低成本数十元。

这年冬季，菠萝罐头行市开始下跌，三个罐头厂仅得利一万余元，是独自经营以来获利最少的一季，但总计全年获利仍有四万余元。陈嘉庚对这次小挫并不介意。他盘算着，明年“福山园”种植的菠萝已经长大出产，加意经营三厂，不难取得获利四、五万元的记录。他进而打算，在来年夏季结束之后，拿出历年净得利润十万元上下，与债主商议还清父亲的旧欠。

不料一九〇六年夏季，菠萝罐头市价下跌更甚，各色杂庄罐头也大为减销，甚至出现“经月乏人问津”的境况。“福山园”第一次出产菠萝，在“败市”的打击下，亦无利可图。陈嘉庚惨淡经营，总算还保住盈利一万元的局面，但准备为父亲还清旧欠的夙愿，却无从实现了。

这一次挫折，虽然使陈嘉庚沮丧，却也起了清醒头脑的作用：单靠经营菠萝罐头制造业发家，是不行的，在商业竞争极端激烈的时代，必须善于抓住市场的脉搏，进行多种经营，才有可能稳住脚跟，开拓新的局面。这一想，他的思路顿时开阔起来，周围变幻不定的工商业情报，引起了他的兴趣和注目。

有一天，陈嘉庚照例到各洋行探询外商来电订货事宜，从一个英国职员口中听到了陈齐贤把马六甲橡胶园高价售给英国公司的消息，不禁怦然心动。橡胶树本来是南美洲的一种野生植物，所出生胶在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上用途很大，逐渐发展为人工种植。一八七六年，英人威咸，在畿辅、锡兰、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试种橡胶。一九〇一年，林文庆和陈齐贤投资二十万元在马六

甲种胶五千英亩，现在售出二千英亩，就得款二百万元，获利达二十五倍，怎能不令人目瞪口呆呢？

菠萝罐头制造业的受挫，陈齐贤出售橡胶园的启发，使陈嘉庚茅塞顿开。他原来就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实业家，主意拿定之后，便迅速行动起来。几天以后，他立即花了一千八百元把陈齐贤剩下的十八万粒种子全数买来，在“福山园”菠萝丛边，每十五尺见方开一个窟种下去。两个月后，十八万粒橡树种子全部在“福山园”安家落户了。当然，这时陈嘉庚还不知道，他日后发家的基础，正是这些种子在“福山园”奠定的。

陈嘉庚带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开始经营橡胶园。同时他也在其他行业上开拓局面，特别是他最为熟悉的米业。

“谦益”米店左邻有一家“恒美”米店，兼租芽笼桥头一家印度人熟米厂，每日可绞出白米一千余担，专销印度。这年冬初，“恒美”股东内部发生意见，多数退出，由该店经理另外招股经营。陈嘉庚知道这种熟米每担比生米可多售一元以上，而且，“南洋华侨前多脚气病，若食此米，则脚气可愈”，销路不成问题，于是招一友人与原经理合作承办，仍用“恒美”字号，商定资本六万五千元，陈嘉庚出四万元，经理及友人各出一万二千五百元。合伙之后，熟米价又涨，他们急购距芽笼桥头不远的一块空地，铺设晒谷砖埕，扩大熟米生产。与此同时，陈嘉庚索性把竞争剧烈、获利不大的冰糖厂停业。

三

一九〇七年，是陈嘉庚企业蒸蒸日上的一年。他的成功，主要是熟米厂的功劳。

自从去年入股“恒美”熟米厂后，米价常好，每个月净得实

利一万多元，至年终核算，“恒美”合办十六个月，得实利十六万余元。这对陈嘉庚来说，是从未有过的记录。“谦益”米店经售的生白米，虽然远为逊色，也较前略有长进，得了一万元的实利。

橡胶树尚未成林，祸福未卜。菠萝罐头厂却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这年夏季，菠萝罐头价格猛跌，普通庄头每箱跌价近五分之二，是新加坡自有菠萝罐头制造业以来最低的一年。一向经营得法、独占大利的“日新”、“新利川”、“日春”三厂，也面临着不景气的局面，但与其他厂商相比，日子还算好过，仍取得二万余元的盈利。“福山园”出产的菠萝，也获得五千元的实利。

由于去年的小挫而改变了经营方向，陈嘉庚各业收入实利，全年达十三万元。仗着这一成功，陈嘉庚便在年底着手清偿父亲旧欠，除“顺安”号的地皮房产估价给债主承受外，不敷约二十万元，议妥折还九万元了结。陈嘉庚当即付出现款六万元，余数在四个月内还清^①。在实现了为父还债的夙愿之后，他就能全神贯注发展他的事业了。

一九〇八年春，“恒美”所租芽笼桥头熟米厂到期，厂主印度人不肯续租，硬要售价十六万元，除去已付典价十二万元外，陈嘉庚不得不续付现款四万元把它承买下来。买后不到两个月，熟米价格下跌，原经理料难获利，决意退出，于是由陈嘉庚独力经营。由于两次挫折，银根稍感拮据，还好熟米价格不久转升，到年终核结，得利六万余元。菠萝罐头厂依然没有多大起色，三厂得利仅一万余元。加上“谦益”米利八千余元、“福山园”六千余元，合计亦有九万余元，扣除股伙、红利外，陈嘉庚实得约七万余元。在那个不怎么景气的年头，陈嘉庚还算保住了一个

^① 陈嘉庚：《个人企业追记》，“顺安债还清”。

小康的局面。

冬去春来，正当陈嘉庚冥思勾画新年企业发展计划的时刻，“福山园”附近有几处旧菠萝园，因为树龄已老，市价又跌，园主情愿以每亩五十元的低价出售。陈嘉庚认为这是扩种橡胶的大好机会，把有五百余亩园地全数买受下来，立即雇工将杂草芟除干净，种上橡胶，和“福山园”联成一片，成为一个拥地一千多亩的大橡胶园。

陈嘉庚的企业经营还是波涛莫测的。这一年，他又连遭两大不幸。一是他父亲陈杞柏夏天在家乡去世，二是“恒美”熟米厂于秋季失火焚毁。父亲的丧事难免有一番耗费，熟米厂的重建，更需要大笔资金。为了企业的前程，他没有回国奔丧，一切由年初回乡完婚的弟弟陈敬贤就近料理。为了重建“恒美”，他不得不将橡胶园先抵押给广益银行借得七万元应急，继又于一九一〇年夏以三十二万元的价格将“福山园”售与陈齐贤。秋季收清价款，除还广益和陈齐贤两笔欠款外，尚余十七万元。^①

陈嘉庚闯过难关，立即在柔佛觅地两处，一在笨珍港，栽种橡胶和树茨，名曰“祥山园”，一在老谢港，因距新加坡较近，栽种橡胶和菠萝，仍名“福山园”。

一九一一年春，陈嘉庚为采购稻谷事，来到暹京曼谷。他听说北柳港盛产菠萝，专供生食，无人设厂制造，因专程前往。他借了一条小汽艇，深入各小港考察，证明所闻属实，此外还发现当地所产次等稻谷的数量也很大。此时菠萝价格已开始回升，新加坡因连年市况不佳，产量锐减。如果在这里设厂制造罐头，只须收购当地所产的三分之一，每年就可以生产四五万箱，同时兼制熟米，可以一举两利。于是立即买地建筑码头、厂房，从新加坡、曼谷购备机器，月余日即建成投产，名曰“谦泰”，这是陈

^① 陈嘉庚：《个人企业追记》，“遭遇两不幸”，“树胶园卖出”。

嘉庚兴办的第四个罐头厂^①。

在北柳期间，陈嘉庚参观过一个福建华侨创办的“鸣成”米厂。这个厂新办不久，在晒谷砖埕上装有一个可以活动进退的屋顶，旁有供推挽之用的轻便铁路一条，天晴时将屋顶推开晒谷，天雨及夜间将屋顶拉密遮盖，不仅可以节约大量劳力，且能避免湿谷霉坏的损失。陈嘉庚看后大为佩服，一回到新加坡立即拨款二万元，在“恒美”厂装设活动屋顶和轻便铁路。

陈嘉庚自经营菠萝罐头入手，以熟米加工厂发家，走上了开辟橡胶园的道路，虽然历经曲折，他已经是拥有两处橡胶园、四个菠萝罐头厂、一家米厂、一间米店，存款约四五十万元的华侨实业家了。在英国海峡殖民地，这当然算不上大富，但比起父亲极盛时期的家业，却已经迈出一大步了。

① 陈嘉庚：〈个人企业追记〉，“在暹罗开黄梨厂”。

第三章 从加入同盟会到倾资兴学



长期以来，在南洋各地的华侨中，存在有一个反清的会党——洪门。一八九五年十月，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总办杨衢云由香港到西贡和新加坡，结交兴会党，劝其加入兴中会。从此，新加坡有了兴中会的活动。一九〇〇年六月底，孙中山为营救因筹款被捕的日本同志宫崎寅藏，首次来到新加坡，一上岸就被英国殖民当局扣留，经华侨林文庆奔走疏通获释。十月，惠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会员尤列也来到新加坡，以行医为掩护，鼓吹革命，发起建立“中和堂”，在吉隆坡、怡保、槟榔屿等地设立分会，自是兴中会的影响日大。一九〇三年六月，上海发生“苏报案”，章炳麟、邹容相继入狱，全国震动。消息传来，厦门侨商陈楚楠、潮州侨商张永福及其甥林木顺，毅然与所设“桃源俱乐部”会员联名致电英国驻上海领事，要求援引保护国事犯条例，勿引渡章、邹给清政府，又集资翻印邹容所著《革命军》（为避清政府耳目改名《图存篇》）五千册，运入潮州、梅县、厦门、漳州、泉州等地散发。一九〇四年春天，陈楚楠、张永福等在新加坡福建街二十一号创办《图南日报》，宣传民主革命，深受华侨欢迎，销路由三十余份增至二千数百份，受到孙中山的注意和赞赏。

一九〇五年八月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于次年（一九〇六年）二月再度来到新加坡，在晚晴园建立了同盟会分会，为英、荷二属的总机关，初次加盟者十二人，以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副之，许子麟为书记，林义顺为交际^①。不久，《图南日报》因资金周转不灵停刊，陈楚楠等人又于一九〇七年创办了《中兴日报》，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展开激烈的笔战，使革命思想迅速地在南洋华侨中传布。从此，以新加坡为中心，南洋各地华侨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与祖国南方各省相呼应。

早对清政府腐败无能十分不满的陈嘉庚，从阅读革命书报中深受同盟会革命主张的影响，孙中山的革命事迹，更是使他心向往，敬佩不置。一九〇九年，陈嘉庚由友人林义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一天晚上，陈嘉庚参加了新加坡同盟会员在晚晴园的秘密聚会。会上，孙中山和他们讨论制订党旗的方案，大家对“青天白日”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有的说红色不好，有的说红色好，双方争得脸红耳赤。孙中山默默地听着，正巧有人拿开水给他喝，他点了一滴红墨水到杯中，水呈现出红色，然后很高兴地说：“红是吉利的”，把水一口喝下。大家听孙中山这样一说，便不再争论了。这次聚会，是陈嘉庚倾心革命的开始，留下的印象是特别深刻的，到了晚年，他还如数家珍似地向人家谈起这件难忘的往事^②。

一九一〇年春天，陈嘉庚正式加入同盟会，剪掉辮发，与清政府断绝关系。

一九一一年春，同盟会总部发动了第二次广州起义，福建支会组织了林文、林觉民、方声洞等几十名革命志士，从福州、连

^① 陈楚楠：《晚晴园与革命史略》。

^② 陈嘉庚在一九五六年集美学校纪念孙中山先生九十诞辰大会上的讲话，记录稿，集美学校校委会藏。

江和日本赶往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各地革命党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前仆后继，终于在是年十月十日成功地发动了武昌起义，使清朝统治陷入土崩瓦解之中。

十一月八日福州光复，消息由路透社电迅速传到新加坡，福建华侨一片欢呼，拥集到天福宫福建会馆开会，商议筹款救济和支援福建革命政府、维持福建治安事宜。大家一致同意组织“保安会”，推举陈嘉庚担任会长。陈嘉庚为了探明真相，立即致电福建同盟会会长黄乃裳询问：“闽省是否光复？都督何人？此间已成立保安会，筹款救济。”第二天，黄乃裳从福州回电：“全省光复，都督孙道仁，需款急，请速汇”。他十分振奋，立即汇去银圆二万元，发电要求维持闽南治安。后来传说，当时福建革命政府收到这笔款后，大事宣传“南洋新加坡汇来二十万元，尚有百万元可陆续汇到”，浮动的人心于是趋于安定，对稳定局势起了很大的作用^①。

福建光复之初，库空如洗。都督孙道仁发电要求陈嘉庚“再汇款以应急需”。陈嘉庚为此热情奔走，发动华侨踊跃捐献，月余之间，先后汇回十余万元，给新政府以有力的财政支持。

十一月十五日，光复各省都督府代表在上海举行临时会议，商讨组织民国中央政府。下旬，孙中山从法国乘船回国，于十二月十六日途经新加坡^②，与陈嘉庚再次晤面。孙中山提出：到国内时，如私人需款，可否帮助？陈嘉庚慨然答应资助五万元。二十五日孙中山先生抵达上海，二十九日被南京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赴南京就职，急需旅费，即致电陈嘉庚求助，陈嘉庚立即汇去五万元^③。

从加入同盟会到支援辛亥革命，体现了陈嘉庚爱国的政治热

①③ 陈嘉庚：《闽省光复与南洋华侨》，《南侨回忆录》第3页。

② 《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82页。

情。在誉称“革命之母”的华侨社会里，陈嘉庚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陶冶，终于走出经商发家的小圈子，投身于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陈嘉庚兴高采烈，“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

清朝末年，散居东南亚各地的华侨，在国势危急和维新改良思潮的推动下，以发扬中华文化和培植华侨爱国精神为宗旨，纷纷开办华侨学校。陈嘉庚侨居的新加坡，便有养正学校（1897）、启发学校（1906），端蒙学校（1906）、道南学校（1906）、育英学校（1911年）的建立。^① 这批华侨学校，为团结华侨社会、支援祖国资产阶级革命，起过良好的作用。少时深受私塾教育之害、“抱憾不少”的陈嘉庚，以巨大的热情资助华侨教育公益事业。辛亥革命前一年，他担任新加坡道南学校的第三届总理，直接开始了办学活动。现在祖国光复，民国政府成立，百废待兴，他扪心自问：如何尽到自己对祖国应负的责任呢？考虑再四，决心从家乡做起，回乡创办集美小学校。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秋天，陈嘉庚第四次回梓。阔别祖国已近十年，对福建教育的情况一无所知，他满腔热情而来，面对的却是一片腐败的现实。清末学制改革之初，同安县办起了一所县立小学校，学生一百余名，十余年过去了，却没有一班毕业生！原来，那时的办学权操在县长手中，县长委派乡绅当校长，校长招来教员学生，县长更动，全校也随而变动，十余年间县长更动很多次，当然没有一班学生学满六年的了。一县如此，他县

^① 傅无闷主编：《南洋年鉴》，一九三九年。

也多如是。小学如此，而乡村私塾又大半停歇，少年儿童上学无门，陈嘉庚“常到诸乡村，见十余岁儿童成群游戏，多有裸体者，几将回复上古野蛮状态，触目心惊，弗能自己！”^①

集美社虽然还办着私塾，却各房分立，六七房共办有私塾六七所，各有男生一二十人，女孩不得入学。塾师学识平庸，学生在学不过是“关蛮”而已。陈嘉庚觉得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奔走各房，劝告各房长将私塾停罢，全乡一致合作，创办集美小学。而创办小学，首先面临师资缺乏的问题。集美各房有学生一百五、六十名，分五个年级，应聘校长、教员七人。可是那时同安县师资连简易科毕业生才寥寥四人，其中一人已改业从商，结果只聘来两人。清末学制改革之初，福州便成立了师范学校，有学生三百人。陈嘉庚对这所福建省唯一的培养小学师资的学校满怀希望，亲往福州实地考察。谁知这所声誉素隆的学府，只是纨绔子弟的镀金场所。每年名义上招生两班八十名，多不公开招考，闽南人极少入学机会。所收学生程度参差，学业勤惰更所不计，“毕业”后从事教职者寥寥无几。陈嘉庚了解到上述情况，不由不对福建教育的前途担忧，“默念待力能办到，当先办师范学校，收闽南贫寒子弟才志相当者加以训练，以挽救本省教育之颓风”。

一九一三年春，集美小学假大祠堂和附近各房祠堂开学，共四个班级，学生一百八十多名。接着，陈嘉庚出资二千元，收买村西面积数十亩的大鱼池一口，鸠工填地，建筑校舍和操场。这年夏间，建成教室七间及其他附属房屋，小学便移入新校址上课。

陈嘉庚创办集美小学校的夙愿实现后，于是年秋天返回新加坡。

^① 陈嘉庚：《闽垣师范学校》，《南侨回忆录》第5页。

三

陈嘉庚在新加坡的实业，支持了他的兴学活动。随着实业的拓展，他兴学的计划日益扩大了。

当一九一三年秋，陈嘉庚从集美返回新加坡时，他的实业并没有多大发展，谦泰罐头厂因淡水变咸，损失三万余元，被迫停闭；笨珍港的“祥山园”因病虫害而放弃了。但其他各项营业幸而颇有盈利，全年实利仍达到三万五千元。因停办谦泰罐头厂而顶入两家罐头厂，使他在新加坡菠萝罐头业中跃居首位，所产罐头居全坡产额之半。一九一四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时航运紧张，市场销路停滞，各厂被迫停止生产，艰难维持。幸而不久航运重开，存货陆续售出，年终结账，仍获净利四万五千元，保持着前进的趋势。陈嘉庚看出战时航运大有可为，是兴办和维持实业的生命线。在一九一五年中，始则租入“万通”（载重一千三百吨）、“万达”（载重二千五百吨）两轮，运输米谷；继而增租二千吨级轮船两艘，为英政府承运楠木片到波斯湾。一年之间，竟获利二十余万元，加上其他实业收入，净利高达四十五万元之巨。第二年，陈嘉庚购置“东丰”轮（载重三千吨），一九一七年又置“谦泰”轮（载重三千七百五十吨），重点经营海上运输，同时兴办制胶厂，把罐头厂预定的白铁片高价转售出去，竟一帆风顺，获利年年提高，仅一九一七年净利即达九十余万元。

陈嘉庚经营海运得手之后，便于一九一七年春天，派弟陈敬贤回家乡筹办集美师范学校和中学，积极建筑校舍，期一年后正式开学，招师范生三班、中学生二班，可容寄宿生三百人；并用高价购买鱼池后面大片田地，迁移坟墓，在小学校舍后方及左右

侧兴建礼堂、膳厅、宿舍和操场。

在创办集美师范和中学之时，陈嘉庚考虑到闽南师资缺乏，自己久居南洋，与闽省教育界人士素不相识，决定从教育向称发达的江苏省设法聘请。在特地访问一位从上海聘来新加坡任教的教师之后，陈嘉庚立即写信给上海江苏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委托他代聘校长和教职员。

为了防止出现福州师范学校办学腐败的弊病，陈嘉庚决计对师范招生制度加以改革。他认为，兴办师范学校的宗旨既为普及教育与培养合格师资，学生必须具有服务教务的志愿。农村小学教师月薪仅二三十元，定非富家膏粱子弟所愿为，唯有招收贫寒子弟，加以适当训练，才能胜任。其次，普及教育的关键在于穷乡僻壤，一般人都不愿到那里任教，故招生范围也应力求普遍，以便回原地工作。因此，他发函通知闽南三十余县劝学所长，要求每一大县代为招选贫寒学生五、六人，每小县三、四人，共一百二十余人，所选学生须有志教职，详填履历，到校后加以复试，凡违背定章或不及格者决不收纳。为了奖励师范生，他还特地规定，除和中学生一样免收学宿费和由校供备被席蚊帐外，还豁免膳费。对于华侨学生，规定由新加坡本店介绍的南洋小学毕业生，概可回国升入集美中学，如到校时考试未及格者，则进入补习班学习，以示优待。

创立集美学校初期，陈嘉庚常常因为找不到胜任的校长和教师而十分苦恼。一九一五年春由江苏第二师范代聘来的教师，多不合格，有的甚至不如集美原有的教师。是年夏季，特派陈敬贤到上海觅聘校长，亦无成就。一九一九年，又托江苏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代为物色，仅聘到校长一人，教师五人，而新校长又是“才干庸常”，办事“无何可取”，陈嘉庚为此忧虑焦灼，不可言喻。后来省悟到从外省聘请校长不仅困难很多，而且本省人才

反而得不到录用，因决计在省内外广聘教师，校长则待本省有相当人材，然后慎重聘请。一九二〇年，由友人介绍认识安溪人叶渊，见其办事有办法，有魄力，可以胜任，即聘为集美校长，一切行政教学交其全权办理。从此，集美学校的教学和行政管理逐渐走上正轨，稳步地发展起来。

四

在这期间，陈嘉庚还积极扩充集美学校，扶植闽南地方教育和南洋华侨教育事业。

陈嘉庚在购置轮船经营海运之时，就深感中国航权丧失，渔利废弃，“我国公私船舶，即在国境犹寥若晨星，况在海外各属殖民地，何从觅其踪影！”“所有船舶之数尚不足与最少船舶之国比拟，甚至世界数十国航业注册，我国竟无资格参加，其耻辱为何如”^①？！他决心创办水产及航海学校，以振兴航业，开发水产资源。辛亥光复之后，全国水产航海学校，仅上海吴淞一所。陈嘉庚乃致函该校，要求代聘一二位教师，所得答复是国内无处可聘，不过现有两位高才生即将毕业，如资以经费送往日本留学，两年后便可回国任教。陈嘉庚复函同意，一面拨款资助他们赴日留学，一面向德国购买机器，在厦门自建渔轮一艘，供学生出海实习之用。一九二〇年二月，集美学校水产科正式开学（一九二五年春增设航海科），学生待遇与师范生同，所有膳费学费一律豁免。为了保证水产毕业生的出路，特向法国订购新式渔轮一艘，来厦捕鱼，准备扩展为渔业公司，后因厦门缺乏冷藏设备，所捕之鱼销路短少，只好将该轮驶往上海捕鱼。

陈嘉庚以为我国以农立国，而科学落后，改良无法，收获不

^① 引自陈厥祥：《集美志》。

丰，民生困苦，必须大量培养农业科技人材，以资研究改良。一九二五年，他函告叶渊，并拨款十余万元，在天马山麓开办农林学校，于次年开学，不久，由于该地毒蚊极多，师生多患疟疾，继以治安不良，校内物品屡遭抢劫，暂行停课数月后复办。

陈嘉庚对集美师范学校开办以来的成绩颇为满意。他鉴于女子入学不易，便决定添办女子师范部，学生待遇与男子师范同。于一九二〇年招生，次年二月开学。为了培养商业人材，他还创办集美商科后改商业部，于一九二〇年八月开学。一九二一年，规定以集美学校为师、中、水、商、小等部及医院、图书馆的总名称，增设科学馆，又将小学移往寨内社。寨内是郑成功抗清的故垒，城墙早圯而南门完好，陈嘉庚以这一古迹“颇足表示我汉族独立之精神，敬保存之，以示后生纪念。”^①一九二七年春，将原有各部独立为校，计有男小、女小、男师、男中、女中（由女师改成）、水产航海、商业、农林、国学专门九校，另有医院、图书馆、科学馆及幼稚园，仍统称集美学校。同年秋，创办幼稚师范学校，以幼稚园隶之。

为了提倡和改善闽南教育，陈嘉庚规定集美小学不收外乡学生，以鼓励各乡村自办小学。一九一九年，他发起组织“同安教育会”，对各乡三十余所小学给予补助费，计划向各地华侨募捐，每年在同安创办二十校，十年内普及小学教育。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先后创办了四十余校，后因华侨捐款中断而未能实现。此外，他还捐资维持泉州一所私立中学，派人调查同安县立小学办学情况，助费加以改善。

陈嘉庚久居南洋，对当地华侨教育问题也特别重视。过去华侨学校寥寥无几，且以初等教育为限。为了提高华侨教育水平，

^① 陈嘉庚：《集美小学记》，见《集美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刊》，一九三三年。

陈嘉庚于一九一三年提出兴办华侨中学的建议。一九一八年六月，联络新加坡、马六甲十六所华侨学校总理开特别大会讨论。一九一九年春，与林义顺联合倡办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①，建筑校舍，从上海聘来校长教师，于是年八月正式开学，这是南洋华侨自办的第一所中学。在陈嘉庚的大力提倡下，各属华侨领袖闻风响应，相继成立了中学校多所，小学校也随之而有大量的增加。到了抗日战争前夕，南洋各地华侨学校共有三千多所，学生四十余万人，比祖国内地各省更为普及。这些侨校经费都由华侨捐款自筹，没有受到政府补助，教师多数由国内聘来，教学概用国语，因此南洋国语普及的程度也比国内南方各省为高。南洋华侨教育的发达，对促进华侨社会团结、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增强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发扬中华文化有利的事，陈嘉庚无不热心赞助。一九一八年，美国教会学校校长那牙计划筹款一百万元，在新加坡倡办一所大学，该教会自认五十万元，准备向华侨募捐五十万元。陈嘉庚提出以设立中文科为条件，首先认捐十万元，并先交三万元。在他的带头捐助下，五十万元之数迅速筹足，并已购地建筑校舍。不料英国殖民地政府以准备自办大学为理由，不准注册，这所教会大学的计划被迫打消，陈嘉庚捐助的三万元，后来移作其中学的理化基金。

辛亥革命后的十年间，陈嘉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办学上。他用实际行动实践了“报效祖国”的诺言，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和钦佩。

^① 杨进发：《陈嘉庚先生与华中二三事》，新加坡《星洲日报》，一九八〇年四月。

第四章 厦门大学的创办和 海外实业的盛衰

一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陈嘉庚的海外实业仍在继续发展。虽然“东丰”、“谦泰”二轮先后在地中海被德国舰艇击沉，他的海运事业被迫宣告终结，但因得到保险赔款共一百二十万元，除扣除购船原本外，还得利六十万元。而由于经营橡胶厂、转售白铁片和米店营业顺利，财产越积越厚了。他把两笔轮船保险赔款在柔佛高踏丁宜路购进橡胶园一千英亩（取名“大同”），又荒地二千英亩，发展橡胶种植，又于新加坡马珍律港边购进空地三十万方尺。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陈嘉庚由于各种事业在战时发展顺利，已经成了拥有四百万元资产的大实业家了。他的实业发展重点转移到橡胶业上，除原有橡胶厂外，又投资五十余万元，与人合组“振源”、“振成丰”、“檳城”三个橡胶公司。米店营业继续保存，而所有的罐头厂则全部让出。

和陈嘉庚的实业发展恰恰相反，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繁荣和富强，而且在列强的干涉下，这次革命的成果几乎被剥夺殆尽了。一九一二年三月，窃国大盗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三年十月，袁世凯在镇压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后，正式登上大总统的宝座。袁世凯

为了实现专制独裁的野心，大搞“敦睦邦交”，向列强开放全国利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日炽，悍然以“对德宣战”为口实，称兵占领德国租借的山东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沿线地带。一九一五年初，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秘密提出夷中国为附属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心切，于五月九日秘密加以承认。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后来人们把这一天订为“国耻日”。这年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登上了“中华帝国”皇帝的宝座。可是好景不长，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被迫取消帝制，不久死去，政权落到军阀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手中。一九一七年六月，张勋带“辫子军”入京，逼走黎元洪，于七月一日拥戴溥仪复辟，但昙花一现，仅十二天便宣告收场。接着是段祺瑞执政，进一步投靠外国，加强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内政混乱，外侮日深，国几不国，陈嘉庚痛心疾首，寝食难安。一九一八年，他写了《致集美学校诸生书》，大声疾呼：“吾国今处在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①

他认为中国事事落后，宰割由人，如欲发愤图强，一洗国耻，振兴教育是唯一有效的良方。不论启迪民智，提倡生产，改革政治，以至抵抗外国侵略，都有赖于教育，为此必须再接再厉，百折不挠，“不惜牺牲金钱，竭殫心力而为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他认为实践自己理想的机会已经到来，因此决定亲自回国扩充集美学校和筹办厦门大学。

一九一九年五月，在陈敬贤南来接管实业之后，陈嘉庚便启程回国。行前，他把在新加坡的不动产橡胶园七千英亩和房地产皮面积一百五十万平方尺，捐作集美学校永远基金。在“恒美”

^① 《厦大周刊》第十三卷第十九期。

米厂宴请同业华侨人士时，他发表演讲，陈述自己的志愿说：

“此后本人生意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除花红之外，我留一部份添入资本，其余所剩之额，虽至数百万元，亦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是乃余之大愿也”^①。

为了实现救国救乡的志愿，他决计倾资办学；为使办学得到雄厚财力的支持，他尽力办好实业。以发展实业来扩大办学活动，是陈嘉庚前半生信守不渝的原则。后来，当他的办学活动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称赞，把他誉为“毁家兴学”之时，他觉得这实在是过誉了。他多次向友人指出这种说法的错误，因为自己的兴学并没有达到毁家的地步，而且他并未萌过毁家兴学的念头，如果家真正毁了，又用什么来兴学呢？

陈嘉庚回国之日，正是“五四”运动席卷全国，中华民族出现新的觉醒之时。“五四”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民主和科学”口号的提出，也给陈嘉庚的办学活动以巨大的推动力。他情绪高昂，信心百倍，亲自撰写《通告》，阐明筹办厦门大学的动机和目的，

“专制之积弊未除，共和之建设未备，国民之教育未通，地方之实业未兴，此四者欲望其各臻完善，非有高等教育专门知识，不足以踣等而达。吾闽僻处海隅，地瘠民贫，莘莘学子，难造高深者，良以远方留学则费重难期，省内兴办而政府难期，长此以往，吾民岂有自由幸福之日耶？且门户洞开，强邻环伺，存亡绝续，逼于眉睫，吾人若复袖手旁观，放弃责任，后患何堪设想？！鄙人久客南洋，志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不揣冒昧，拟倡办大学校，并附设高等师范于厦

① 《陈嘉庚先生言论选辑》，见《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第136页。

门。”^①

七月十三日在厦门浮屿“陈氏宗祠”召集筹办厦门大学发起人会议上，他慷慨陈述说：

“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若并此而无之，是置国家于度外，而自取灭亡之道也。……欧美先进各国，统计男女不识字者不及百分之六、七，日本为新进之邦，亦不满百分之二十，我国则占百分之九十余，彼此相衡，奚啻霄壤，国民之程度如此，欲求免天演之淘汰，其可得乎？！嗟嗟！我国不竞，强邻生心，而最痛巨创深者，尤莫我闽若也。……野心家得陇望蜀，俟隙而动，吾人若不早自猛省，后悔何及！诚能抱定宗旨，毅力进行，彼野心家能剗我之肉，而不能伤我之心，能断我之臂，而不能得我之心，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勿自馁其志，而视为杯水车薪，无裨大局，乃知众擎易举，众志成城，是所深望海内外同胞也！”^②

他当场认捐厦门大学开办费一百万元，常年费分十二年付款共三百万元，以为表率。

创办厦门大学，首先遇到觅地建筑校舍的问题。陈嘉庚以为大学校址当以厦门岛为最适宜。厦门与祖国宝岛台湾隔海相望，又为闽南华侨出入所必经，港阔水深，万吨巨轮，畅通无阻，将来闽省铁路通达，必将发展为更繁盛的海港。他考虑到大学发展的远景，校址必须相当广大，经过实地查看，终于选定了五老峰

^① 《集美学校校友会杂志》第一期，一九二〇年。

^② 《厦大周刊》第12卷第21期，厦大十二周年纪念专号，

下的演武场一带。演武场是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练兵之所，清代为阅兵场，鸦片战争以后曾兼作跑马场，后来阅兵与跑马俱废，成为洋人高尔夫球场。其地面积约二百余亩，下系沙质，雨季不湿，平坦坚实，细草如茵。北面奇峰突兀，怪石矗立，主峰下有驰名中外的南普陀寺。南临大海，站在沙滩上远眺，大担、二担等岛屿浮现在天水相连的画面，点点渔帆，阵阵海风，勾动过多少游人的诗情！这天然生成的佳境，实在是办学的好地方。如果把东起胡里山炮台，西至厦港许家村的这片公共山地，全部划归厦大校界，面积可达二千余亩，将来不愁没有发展余地。“教育事业原无止境，以吾闽及南洋华侨人民之众，将来发展无量，百年树人基本伟大，更不待言！”^①他越想越感到惬意。

陈嘉庚虽然在心里为厦大绘制了美好的远景规划，但他也考虑到当时的政府未必肯拨给全部地址，所以，作为第一步，他提出拨演武场四分之一为校址的请求。这一请求得到批准后，他托上海美国技师毛惠设计绘制校舍蓝图，并积极物色校长教师。

一九二〇年一月，汪精卫来漳州找陈炯明，陈嘉庚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时期与汪结识，便邀请他来集美参观，向他介绍筹办厦门大学的计划，并聘汪为厦大校长。但不久汪精卫因粤军回粤成功，便以政务繁忙无暇兼顾而辞职。于是，陈嘉庚另组厦大筹备委员会，聘蔡元培、郭秉文、胡敦复、余日章、邓萃英等人为筹备员，十月在上海开会，举邓萃英为校长。

初创的厦门大学，设“师范”（文、理科）、“商学”二部，本科四年，预科二年。一九二一年三月，在厦门及南洋各埠招收新生一百三十六名，四月六日，暂借集美学校“即温”楼正式开学。

邓萃英当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开学不久，即欲匆匆忙

① 陈嘉庚：《演武场校址之经营》，《南侨回忆录》第14页。

忙赶回北京，校务交何公敢、郑贞文两人办理。陈嘉庚对此类“挂名校长”极端不满，在劝留无效之后，月底有一批学生写信责备邓萃英，陈嘉庚签列首名，邓只好表示辞职。陈嘉庚没有挽留，他立即电请时在新加坡行医的林文庆返国，接任厦大校长。

陈嘉庚选定五月九日“国耻纪念日”那天，为厦门大学校舍建筑奠基。他亲自修改美国技师设计的图案，第一批校舍建筑改为一字形，“群贤”楼居中，左右是“同安”楼和“集美”楼。当时的校址内，怪石参错，荒冢林立。陈嘉庚亲自督促工人，清理坟墓，开采石条，就地作为校舍地基和筑墙的材料，不但坚固美观，而且节省建筑费不少。次年二月，首批校舍落成，学生由集美迁到新校址上课。随后，又相继建成“映雪”、“囊萤”、“笃行”、“兼爱”、“博学”等楼和生物学院、化学学院以及白城教职员住宅等。

厦门大学是当时福建省唯一的大学，又是国内科系最多的五所大学之一和最早招收女学生的七所大学之一。初办时，仅设师范、商学两部，后陆续增设工学、新闻、法学等部（科）和国学研究院、预科等。^①一九三〇年，扩充为文、理、法、商、教育五个学院，共十七个系。一九三六年改为文、理、法、商三院九系。应聘来厦大执教的，有不少第一流的名教授，如文学家鲁迅，动物学家秉志、何博礼（德国人），植物学家钟心煊、钱崇澍，数学家姜立夫，天文学家余青松，化学家刘树祺，物理学家朱志淦等等。从该校毕业的历届学生，有的走上革命道路，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有的长期从事教育科研工作，成为著名的学者；不少人散居海外，为发展各侨居国文化经济，密切华侨同祖国的关系，作出贡献。

^① 《厦门大学组织表》，《厦大周刊》第一百五十八期，一九二六年十月九日。

陈嘉庚设想的厦门大学，规模宏大，可容纳学生三四万人。因为自己财力有限，原计划在创办一两年略具规模后，即向南洋富侨劝募。就他所知，福建华侨资产在数百万、千万元以上者颇不乏人，那时住在鼓浪屿拥资千万以上的富侨即有三人。灌口有一位旅居荷印的华侨，富冠全侨，资产在亿元以上，一年即获利二三十万元。陈嘉庚与他相识后，以为“机不可失”，就写了一封亲笔信，请其认捐五百万元为厦大基金，或不拘多寡，捐办一个医学系，以为纪念。信去后，只得其经理用电话通知说：“信已收到”，一句也不提捐款之事。陈嘉庚并不因此而灰心，又续向万隆、泗水两位富侨为厦大募建图书馆一座，所费不过数万元，但也遭到拒绝。劝募失败，陈嘉庚毫不气馁，决心按自己的财力陆续兴建教员宿舍和科学实验室。在写给厦大基建负责人陈延庭的信中，他提出初步建设的方针，“依时代（按五年左右）、学生不多（成千）”的要求，“各科只求完备建设，不求广大规模”^①。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说：“弟意建筑厦大校舍之最要不出三事：第一件就是地位之安排，因关于美术上之重要及将来之扩充是也；其次就是间格（隔）与光线，……第三便是外观，……能免花费少资，粗中带雅之省便方可也”^②。为什么“只求完备”、“粗中带雅”呢？除了财力限制之外，陈嘉庚还有长期的设想。他解释说：“余料不出二三十年，世界之建筑定必更大变动，许时我厦大生额万众、基金万万，势必更新屋式及合其时科学之用法，故免作千百年计，而作三五十年计已足矣”^③。在辛苦经营、草创厦大之际，陈嘉庚这一立足现实、放眼未来的做法，反映了他坚持办学的决心和远见。

① 陈嘉庚致陈延庭函，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集美校委会藏。

② 同上，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一日。

③ 同上，一九二三年四月三日。

在陈嘉庚致力兴学期中，全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绵亘不断，集美、厦大两校也相继发生了驱逐校长的学潮。陈嘉庚怀着兴学救国的目的创办集美、厦大，提倡新教育，招收贫寒的有志青年，为“五四”前后的思想解放潮流在闽南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当日的集美、厦大，是福建的“民主堡垒”，学生提出改革教育、改革社会的要求，是进步的。陈嘉庚也认为教师无能，校政乖舛，政府机关得过且过，都是值得谴责的，但他对学生罢课也感到苦恼，认为这样一来，“虽明知其弊，亦无法改善”。他提不出更为妥善的办法，“转念质虽欠佳，而量则愈多愈妙，所谓聊胜于无”，决心“一意热诚致力，毫无反顾”，不因学校出现弊病而缩手灰心。

在陈嘉庚的苦心支撑下，厦门大学在军阀混战和社会动乱的环境中，艰难地成长起来。

二

陈嘉庚返国创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期间，他的海外实业经受了挫折，地价胶价大跌，损失达九十万元。“裕源”、“振成丰”、“槟城”三橡胶公司或因股东意见不齐让与他人，或因亏损停业，幸赖制胶厂和米店年年得利，一九二〇年实利仍有九十九万元，一九二一年略增为一百万元。一九二二年，陈敬贤因病回国，陈嘉庚不得不第六次出洋，到新加坡主持营业。

根据几年来各业形势的变迁和经营上的经验教训，陈嘉庚认识到橡胶加工和制造业的重要性，集美学校之扩充，厦门大学之创办，“所需经费多赖此途之利源”^①，必须首先办好。他到马来亚各埠视察，发现各处小规模胶厂多因两年来胶价日跌而亏

^① 陈嘉庚：《个人企业追记》，“第六次南来”。

损，急欲卸去。他抓准时机，出资三十余万元收购了峇株巴辖、麻坡、巴双、峇株牙惹、怡保、江沙、实吊远、太平、霹雳九个胶厂，又投资十余万元，逐厂扩充吊栈热房、改装机器；另用数万元修整扩大已停闭两年的檳城胶厂，俱限年内报竣，使每月生产胶布能力增至三万余担。此外，又增资十余万元扩充橡胶熟品制造厂。在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胶厂每年实利都在一百万元以上、一九二四年实利增至一百七十余万元。

在这期间，陈嘉庚所经营的企业，纯以橡胶为中心。他私下估计，生胶制造厂已扩充到最大限度，橡胶园也达到饱和状态，

“新旧相抵，无须垫本”，惟熟品制造厂尚有发展余地，因不惜投下巨资，扩大经营。同时，发展制胶厂还含有为祖国输送熟练职员工人的意义，他在《个人企业追记》中自述说：“二十世纪为树胶之时代，日本小国尚有大小胶厂四百余所，以我国之广大，无一相当树胶厂。新加坡系产胶区域，政府虽属英国，所需男女工人概我华侨，对于化验制造机器可臻完备，出品种类亦多，可以训练职员工人，如师范学校之训练学生，俾将来回国可以发展胶业。个人营业之外，尚抱此种目的，故不惜资本，积极勇进。”

由于制造厂所产各种轮胎、胶鞋、医药用具和其他日用品等，概属新产品，乏人推销，于是决计先在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各大商埠自设分店，直接推销产品。次年，又在香港、上海和国内各大都市增设分店十余处。

一九二五年，英国殖民地政府限制橡胶生产，胶价转涨，每担从年初的三十余元升至冬季的二百元，加上胶制品畅销各地，陈嘉庚经营的橡胶加工和制造业蒸蒸日上，“为一生登峰造极，得利最多和资产最巨之时”^①，年终结算实利，达到创纪录的七

^① 陈嘉庚：《个人企业追记》，“三年总核算”。

百八、九十万元。当时他所经营的橡胶园面积一万余英亩，工厂三十余所，分店百余处，代理商遍及五大洲，雇用职工常达数万人，规模之大为南洋第一。据他自己估计，全部资产计有：橡胶园六百万元，谦益等胶厂厂房机器一百万元，活动资金四百万元，胶品制造厂厂房机器一百五十万元，活动资金亦一百五十万元，火锯厂、罐头厂及米店共五十万元，房地产五十万元，共一千五百余万元，除欠银行近三百万元外，实有资产一千二百万元。

在这期间，他支付集美、厦大建设和日常经费二百七十余万元，义捐十余万元。另外又筹款二十四万元为南洋华侨中学扩建校舍，并创办了新加坡最大的华文报纸《南洋商报》。

三

可是好景不长，一九二六年春起，胶价突跌，江河日下，入冬每担仅值九十余元，各胶厂不但无利可图，而且亏损日甚。陈嘉庚原计划创办的造纸厂，已付买机器款二十万元，只好自动放弃。厦大已动工的校舍继续建完为止，集美校舍已建筑近半，到冬季亦不得不完全停止。是年各业亏损和支出厦大集美建校费用各约九十余万元，合计超支一百八十余万元。

越年（一九二七年），胶市迄无好转迹象，加上各小厂竞争剧烈，“绝无毫利可图”，但仍希望胶品制造厂能够打开出路，又在南洋和祖国增设分店十余处，另外投资十数万元承卖环球饼干厂一所。

是年，米店及火锯、罐头、饼干各厂虽略有获利，仅足应付义捐和家用，而为了维持集美厦大两校经费，陈嘉庚仍继续付出七十余万元，加上银行贷款利息四十万元，两共超支一百二十万

元。

一九二八年，由于日本胶制品在东南亚削价倾销，陈嘉庚的胶品制造业遭到了严重的打击。祸不单行，私销日货的奸商因痛恨《南洋商报》宣传抵制日货，揭露奸商走私，竟不择手段，雇人放火焚毁了陈嘉庚的胶品制造厂，损失近百万元（除保险费外损失五十余万元）。陈嘉庚仍不忍放弃办学事业，照旧汇款六十余万元为集美厦大经费，是年超支更达一百六十余万元。三年的惨淡经营，陈嘉庚每况愈下，资产损失殆半，仅存实额五、六百万元了。

一九二九年起，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大危机，物价暴跌，专靠出口外销的橡胶每担仅值七、八元，胶鞋每双值二角（原售一元多），陈嘉庚各厂各分店所存原料及制成品估值也下跌一百余万元。而为了支付两校经费及贷款利息，陈嘉庚又加欠银行一百多万元，无力偿还。到一九三一年八月，终于被迫接受银行条件，将所有资产折值二百余万元，银行也拨出现金若干，改组为陈嘉庚股份有限公司，由银行代表三、四人组成董事会，下设总经理一人，仍由陈担任，副总经理一人，由董事会指派，补助两校经费每月限定五千元。这样，陈嘉庚就从大企业主地位下降为外国金融资本支配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股东。在持续“不景气”的最后两年中，陈嘉庚俯仰由人，很不称心。一九三二年，物价继续下跌，各业无利可图，连利息也付不出。一九三三年春，将新加坡、檳城两胶厂租与南益公司经营。入夏，内地各小胶厂营业已略有转机，董事会却决定全部出租，各分店亦一律停业关闭。陈嘉庚虽极力反对，均置不理，最后只好照董事会意见，将巴双厂租与南益公司，约明获利分半数为两校经费，麻坡厂租与益和公司，利润全数充两校经费，峇株厂租与宗兴公司，怡保、太平等厂由各经理人合租，获利抽十分之三

为两校经费。

七月一日起，英国政府提高进口税率，新加坡是英国属地，所产胶鞋不在增税之列，伦敦英商纷来订购，陈嘉庚估计制造厂每月可以生产各色胶靴、胶鞋二、三十万双，获利十二余万元，一年之后，此业必可中兴，十分欣慰。不料伦敦某英商通过新加坡汇丰银行对他施加压力，要求将各厂所产胶鞋归其一家包销，陈嘉庚严词拒绝，汇丰经理毫不客气地说：“我英国的利权不容他人染指。”陈认为所谓“他人”当然包括华侨在内，不肯签约，而董事会竟越俎代签。陈嘉庚由此看清了在外国资本的钳制下，前途发展无望，因决计全部收盘不干。从是年冬季起，他将各厂分别清理，饼干厂年年有利，招李光前承受，约明抽三分之一的利润充两校经费，新加坡胶厂续租与南益公司，月加租一千元，也抽利润十分之二为两校经费。一九三四年初，清查账款，尚欠人七万余元，通知各货主或将原物领回，或取制成品抵数。至是，陈嘉庚股份公司及所属各厂各分店全部停闭结束。

在有限公司成立期间，厦集两校经费每月不敷一万余元，三十个月共达四十余万元，均由陈嘉庚设法变卖厦门学校产业十余万元，并向集通息借三十万元，才得以勉强支撑下去。

在经济危机和外国垄断资本压迫的夹击下，不论经济如何困难，收支如何拮据，陈嘉庚对于厦集两校经费仍然极力维持，从不退缩。一九三〇年，一些伙友劝他停办学校或缩小学校规模，他坚决不肯说：“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①一九三二年，某外国垄断集团提出以停止维持集美、厦大两校为条件，把陈嘉庚的企业作为附属公司而加以“照顾”，他断然拒绝说：“宁使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

^① 陈嘉庚：《个人企业追记》，“牺牲非孟浪”。

一九三四年，所有营业全部收盘结束之后，他仍设法动员林文庆南来募得捐款二十余万元，连同出租各胶厂应分利润，使两校得以维持下去。一九三六年，又亲向李光前、陈六使等募款十一万五千元，自捐四万五千元，在马来亚购买橡胶园四百英亩，充作厦大基金。他曾对厦大校友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是永远有希望的，我们的学校是永远会存在的。”他为厦大、集美两校多方奔走，筹集经费，的确是百折不挠，竭尽了半生的心力的。直到一九三七年，他看到两校虽能维持现状，但设备缺乏，难以发展，深恐误及青年，经过反复考虑，终于决定将厦大无条件移交国民党政府接办，改为“国立”，使自己得以“专力维持集美”。他后来回忆这一件事，沉痛地说：

“厦大自民十年（一九二一年）开办，迄余公司收盘，适十二年足，及至交卸共十六年奇，余支出款项，适与当时认捐四百万元数目相符，其凑巧如是。每念竭力兴学，期尽国民天职，不图经济竭蹶，为善不终，貽累政府，抱歉无似。回忆古语云：‘善始者不必善终’，亦聊以自解耳。”^①

陈嘉庚为兴学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他曾经说过：如果在企业中落期间，停止维持集、厦两校经费，是有足够的财力度过不景气之年，以期东山再起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且坚定地说：“果不幸因肩负校费致商业完全失败，此系个人之荣枯”^②，从不引为后悔。这种倾资兴学、百折不挠的精神，的确令人钦敬。

① 陈嘉庚：《厦大献与政府》，《南侨回忆录》第19页。

② 陈嘉庚：《个人企业追记》，“牺牲非孟浪”。

第五章 从抵制日货到支援 祖国抗战

陈嘉庚从发家到破产所走过的道路，是成千万海外华侨实业家悲惨遭遇的缩影。祖国贫穷落后，政府腐败无能，华侨犹如“海外孤儿”，没有靠山，任凭外国殖民统治者和金融垄断资本家的欺侮摧残。“栋折梁崩，侨将压焉”。陈嘉庚从自身的经历中，对祖国国运颠危，灾难日深，抱有切肤之痛。他殷切盼望着祖国独立富强，不惜为此含辛茹苦，奔走呼号。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本派兵侵占济南，陈嘉庚联合新加坡华侨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被举为会长，召集侨民大会，在两三个月中募捐国币三十余万元，救济被害山东民众，同时积极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此时，中国的大革命已经失败，开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各派军阀之间的长期混战。这种局面，是帝国主义列强分裂中国所造成的。陈嘉庚一时还看不清楚国内政局紊乱变幻的本质和根源，他怀着维护国家统一的善良愿望，支持南京政府，并且亲自订下一条“规则”，“拥护南京政府为首要目的”，悬挂在他所创办的《南洋商报》办公处中，要大家共同遵守执行。

“鸦片流毒我国，民众受害甚惨”，陈嘉庚自幼就有极深刻

的认识。而英国殖民地政府长期实行鸦片公卖，每年获利千余万元，“概系我华侨之脂膏”。一九二八年，国际联盟派三国代表团到新加坡调查，陈嘉庚代表华侨开会欢迎。会前殖民地官员通过闽粤两帮侨领袖施加压力，再三告诫“切勿提起鸦片事”。陈嘉庚心中“自有主张”，在席上列举许多事实，力证“南洋华侨受鸦片惨害，而尤以马来亚为甚”，要求代表团“劝英政府早日实行禁绝”。自此以后，公卖鸦片始有所缩减。

在三十年代初经济危机严重期间，殖民地政府曾拨款改良水利，劝导马来族人民种稻，但却不许占当地人口半数、失业最为严重的华侨参加。陈嘉庚对这种歧视政策深为愤慨，特在华人参事局提议应该一视同仁，允许华侨种稻，虽经会议通过，殖民地政府却拒不执行。陈嘉庚因辞去参事局员之职，表示抗议。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陈嘉庚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通过致日内瓦“国际联盟”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电，要求履行各种条约，维持世界和平，并联络华侨抵制日货，开展反日宣传。他后来自述说：“余明知开会发电虽无丝毫效力，然祖国遭此侵暴，海外侨民不宜充耳无闻，自应唤醒侨民，鼓动志气，激励爱国，冀可收效于将来。至联络抵制事项，出于不得已下策，任何激烈牺牲，亦往往不能持久，盖由居人篱下，当地当局不但不表同情，尚屡以法律裁制或袒护对方也”^①。就在这个时候，陈嘉庚从一家日本煤炭公司南来新加坡的代表口中，得悉日本少壮军人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内幕，对祖国的前途更加担忧。他先后在《南洋商报》上发表《对日问题之检讨》、《世界是否仍须尊重公理与和平》、《军缩与太平洋风云》等文，阐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发生，消息传来，陈嘉庚深为

^① 陈嘉庚：《九一八与南洋之抵制日货》，《南侨回忆录》第31页。

十九路军奋起浴血抗战所感动，积极向华侨筹募巨款，汇往上海，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全军听到这个消息，都受到极大的鼓舞”。三月六日，他写信给集美学校校长叶渊说：“时至今日，任何人皆应抱牺牲精神，各尽所能，以与暴日抗，希勉励学生，激昂勇气，……今日国家危如累卵，平、宁、沪文化机关几将破产，在此可以维持之校址，师生应当如何互相勉励也”^①！这些言行，都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赤诚。

陈嘉庚从一九二八年起被新加坡华侨推举担任福建会馆主席，热心华侨社会公益事业，推动华侨团结和爱国救乡活动。一九三五年，中国在外寇日逼的严重危急关头，有十一省发生严重水灾，陈嘉庚出任“华侨筹赈祖国水灾会”会长，积极动员华侨募捐，汇款回国救济灾民。一九三六年，生活书店出版的《永生》杂志，被国民党查封，钱俊瑞等在陈嘉庚的资助下，另行出版《现世界》半月刊，深受读者欢迎，一连再版三次。国民党又以该刊“专门反日，而不反共”，密令禁止发行。陈嘉庚极力支持该刊据理力争迫使撤消禁令。那时候，陈嘉庚还把救亡御侮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上，盼望“祖国政府能治理良好，领导人民团结，为华侨作模范”。一九三六年秋，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组织反蒋的“西南政府”，陈嘉庚在新加坡召集侨民大会，发电反对，认为“外侮日迫，万万不可内哄”；又另电李宗仁、白崇禧，“勿与贪吏陈济棠合污，敌人得陇望蜀，应共筹抵御，不可自生内战。”十二月传来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扣的消息，陈嘉庚召开华侨“援蒋救国”大会，声明拥护南京政府，发电要求张学良迅释蒋介石。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国民党人发起献机祝寿运动，要求马来亚华侨捐献一架，陈嘉庚在得到殖民地政府的同意后，担任购机寿蒋会主席，登报并

^① 《集美周刊》第十一卷第五期。

分函马来亚十二区侨领在吉隆坡开会，募得国币一百三十余万元，汇往南京，约可购飞机十三架，比原计划超出十几倍。

长期侨居海外的陈嘉庚，毕竟对祖国的政治斗争不甚了解，他拥护南京政府、拥护蒋介石，是因为他认定南京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强有力的领袖，没有这样一个政府和领袖，便无法团结全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而这样一个政府和领袖是否有决心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他在当时是没有认真考虑过的。对于一九二一年成立，在大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大革命失败后经受五次围剿和长征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陈嘉庚还缺乏具体的了解和认识。他曾经指出：“凡被日寇蹂躏诸地，他日日寇败而均可变为赤化矣”，“如果能真赤化，则尤胜于列强公委之共管也”，但又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是“假赤化”的“赤匪”，他们的领袖充其量不过是项羽、李密、陈友谅一类的乱世英雄，而不是刘邦、李世民、朱元璋一类统一中国的风流人物^①。正如他后来回忆的：“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辩其黑白”^②。这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造成的，我们不能以此来苛求陈嘉庚。

二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二十九军冯治安部奋起抵抗。这一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开始，中国从此开始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

① 陈嘉庚致集美校董先生函，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集美校委会藏。

② <南侨回忆录弁言>。

们，被迫发出了最后的吼声！

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通电全国，实行全面抗战！接着又于同月十五日发表《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发动民族抗战，收复失地，争取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三项主张。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压力下，蒋介石迟到七月十七日才在庐山发表谈话，勉强宣布对日抗战，但仍派遣代表与日本秘密谈判。

八月十三日，日军大举向四大家族的统治中心上海发动新的进攻，蒋介石被迫将一部分非蒋系的杂牌军调到上海抗战。消息传到新加坡，陈嘉庚以为战争已发动，关系国家民族存亡，事体极为重大，立即由总商会出面发出传单，召集侨民大会，汇款救济祖国伤兵难民。十五日，大会召开，陈嘉庚担任大会临时主席，决定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由委员三十二人组成。陈嘉庚在会上宣布“大会目的专在筹款，而筹款要在多量而持久”，并自动认捐常月捐至战争终止，每月国币二千元。十六日，委员会开会，推举陈嘉庚为主席，办事处设怡和轩俱乐部，议决捐款分特别捐和常月捐两种，“概作义务捐送”，汇交“中央政府行政院”，“不收政府公债券，不得另设其他捐款机关”。九月，金门失陷，菲律宾闽侨组织福建救济会，马来亚各区华侨也纷纷组织筹赈会，陈嘉庚考虑到没有总机关领导，不但筹汇不能一致，也无从比较成绩，便发起组织各区筹赈谈话研究会。他的建议受到马来亚各区筹赈会的赞同。于是，十月十日，各区筹赈会代表在吉隆坡集会，统一对筹赈的认识和规划。到会代表百余人，推陈嘉庚为临时主席。当时南京政府宣布对所有义捐都发给公债券，菲律宾华侨已经接受，马来亚也有人准备接受，陈嘉庚就此发表意见说：“此次抗战救亡，为有史以来最严重之国难，国民须尽量出钱出力。海外华侨只负出钱一项而已，若不作义捐而贪

取公债，出钱之义何在？且何以对祖国同胞？”^①在陈的热情激励下，“全体决议不取公债”，并决定在年底以前全马要募足坡币一千万元，新加坡募足三百万元，余由各区分摊。

国民党政府对日开战后，决定发行“救国公债”五亿元，指令陈嘉庚等三名闽侨在新加坡、马来亚募购四千万元。陈嘉庚认为这样做很不妥当，因为华侨中广东省籍者为数不少，且以新加坡一处领导全马亦不可能，所以他写信提议在新加坡增加三名粤侨，并由全马十二区筹赈机关一致负责进行。这一建议本属切实可行，但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却以“陈嘉庚不肯负责”为词，电告国民党政府，计划另立机构，包办劝募公债，国民党政府还派刁作谦南来帮助，结果被英国殖民当局拒绝，没有成功。这一件事，使陈嘉庚对国民党外交官深为失望，因为他们“在此国家危险时代，尚不自量力而犹醉心虚荣也。”最后，国民党政府仍不得不委托筹赈会负责办理。陈嘉庚为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根据新马华侨已经捐认大量赈款的情况，承担劝募公债二千万元，自己首先认购十万元，以为提倡。十一月一日，他在写给集美学校董事长陈村牧的一封信中，严正地指出：

“金门失陷，厦集已成为最前线，此后厦大、集美两校将损失至如何程度，殊难逆料。然欲求最后之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唯有全国人民抱定牺牲到底之决心以赴之。……兹又开始劝募救国公债，我政府甚望侨胞能踊跃认购，余又不得不同样有相当之表示，以为倡率，故亦认购十万元。即此区区之款，尚须告贷半数，始能足额。值兹国族生命已届最后关头，余惟恨现无百万资产，否则亦必以全数购买救国公债，绝不犹

① 陈嘉庚：《马来亚筹赈会议》，《南侨回忆录》第45页。

豫也”^①。

在国难当头之际，陈嘉庚毫不犹豫地走在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

三

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南洋华侨中的抗日救亡活动也进入新的高潮。“七七”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海外华侨输财纾难，统计不下一万万元，其中南洋各地即占十分之八。为了进一步团结华侨，使筹赈救亡工作得收统一行动之效，组织南洋华侨最高救亡领导机关，已属刻不容缓。一九三七年秋，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写信向陈嘉庚建议在香港或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总机关，不久，印尼侨领庄西言也提出类似的主张，陈嘉庚自揣缺乏相当才望，不敢接受。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厦门沦陷，鼓浪屿中外人士组织“国际救济会”，电请南洋各地华侨筹款协助，同时，“福州救济会”也发来电报提出同样要求。李清泉、庄西言再次写信给陈嘉庚，倡议召集南洋各地侨领开会，讨论救济华南事宜。陈嘉庚认为华侨不便过问祖国军事政治，只同意集议研究推进筹款办法。七月三十日，陈嘉庚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电询：

“庄西言建议，在星组织华侨领导机关，此项组织有无必要？环境能否许可？如何组织始有成效？盼核复电渝”。陈嘉庚复电说：“环境无问题，如以国府命令电各属埠，集星组织机关，研究有益筹款，庚甚欢迎”。二十天后，孔祥熙来电：“已委外交部电知南洋各领馆，通知各属侨领派代表到新加坡开会，希筹备一切。”陈嘉庚认为这是政府命令，“当然接受”。

^① 陈嘉庚信函原件，陈村牧藏。

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准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代表大会十月十日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召开，到会者有英属香港、马来亚、缅甸、北婆罗洲、荷属爪哇、苏门答腊、西婆罗洲、西里伯、美属菲律宾、法属安南及暹罗各地四五十埠华侨商会、慈善会、筹赈会代表一百六十八人。暹京曼谷因亲日派当权，未派代表，外埠派有少数代表秘密参加，香港尚未有筹赈会的组织，仅部份闽侨派来代表两名。大会决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简称“南侨总会”），举陈嘉庚为总会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议决在新加坡武吉巴梭四十三号设立总会办事处，每月议募义捐国币四百余万元，并发表《大会宣言》^①说：“中国之抗战，实为御侮而战，实为自卫而战，实为维护国际盟约而战，实为保障世界和平而战”，“大会同人集议伊始，用首次决议通电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大会号召全体侨胞，“今后宜更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愿我八百万同胞自今日起，充大精诚，图大团结，宏大力量，以为我政府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云云。接着又在《南侨总会通告第一号》^②中，重申“焦土抗战”、“全面抗战”和“长期抗战”三个口号，作为全体侨胞共同努力奋斗的目标。当时在南侨总会直接领导下的分支机构，在新加坡、马来亚、北婆罗洲有二十个单位，在缅甸、泰国、越南、香港、菲律宾有三十个单位，在苏门答腊、爪哇、望加锡、西婆罗洲有三十五个单位，其他间接接受领导者为数更多，南洋各地华侨如此广泛而有力地组织起来，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①② 均见《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代表大会专刊》。

四

“南侨总会”成立之际，日军疯狂向我华中、华南挺进，广州、武汉相继陷落，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抗战进入危急的阶段。“速胜论”破产，“亡国论”甚嚣尘上。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十月二十二日，陈嘉庚从路透社电中得悉此事，即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发电给汪精卫，严正指出：“敌暂时得意，终必失败，路透社电传先生谈和平条件，侨众难免误会，谓无抗战到底决心，实则和平绝不可能，何若严加拒绝，较为振奋人心也。”^①次日，汪精卫复电，百般饰词狡辩，说什么“中国为抵抗侵略而战，故对外向无拒绝和平之表示。去岁比京会议，主张调停，中国接受，而日本拒绝，国际遂决定日本为祸首，而援助中国。今岁国联大会，援引第十七条主张以和平方法解决纠纷，中国接受，而日本拒绝，国联遂决定对于日本实行第十六条之经济制裁。凡此皆证明日本为戎首，中国为抵抗侵略，与不拒绝和平，并非矛盾，实乃一贯。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之独立生存，何必拒绝？否则，中国自无接受之理。中国之立场如此，决心如此，光明正大，绝无丝毫屈服之意”云云。

陈嘉庚接电后，确信汪精卫对日乞和属实，而外电纷纷传播，国民党政府正与日本政府谈判和平条件，蒋介石将辞职，他更感到情势危急。二十五日，他发电驳斥汪精卫，严正指出：“比京会议，国联大会，诸代表居在客位，任何时可以发表和平意见，但无论诚伪虚实，均不致影响我抗战力量，动摇我抗战决心。若

^① 本节所引为反对和议事来往电文，均载“南侨总会”年刊，参见《南侨回忆录》第70—73页。

先生居重要主位，则绝对不同，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关系至大。倘或失误，不特南侨不可谅解，恐举国上下皆不能谅解。昨日路透电谣传，和平将实现，蒋公将下野，世界视听为之淆乱，可不警惧耶？万望接纳老友忠告，严杜妥协之门，公私幸甚！”同日又发一电，指出：“武力虽弱，敌寡我众，民气旺盛，长期全面抗战，华侨外汇金钱源源增加，敌决不能亡我，美英苏亦决不坐视。若与言和，各省定必反对，分裂纷乱甚于自杀，务希惠鉴鄙言，抗战到底！”

二十六日，汪精卫复电，力持其主张为无上良策，嘱陈嘉庚劝南侨赞同其主张。至此，陈嘉庚知对汪已无挽救希望，即将双方来往五电均交各报发表，另拟一电，极不客气地把汪精卫比作秦桧张昭：“继续抗战，终必胜利，中途妥协，实等自杀，孰利孰害，彰彰明甚。若言和平，试问谁肯服从，势必各省分裂，无法统摄，不特和平莫得实现，而外侮内乱将更不堪设想。坐享渔利，惟有敌人。呜呼！秦桧阴谋，张昭降计，岂不各有理由，其如事实何哉！先生长参政会，犹记通过拥护最高领袖抗战到底之决议案否？态度骤变，信用何在？二次之会，又何必开？海外全侨，除汉奸外，不但无人同意中途和平谈判，抑且闻讯痛极而怒，料国内群情亦必如是。万乞俯顺众意，宣布拥护抗战到底，拒绝中途妥协，以保令誉，而免后悔。”电文尚未发出，国民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便来阻止，说：“这种电报千万不能再发，免使外国人耻笑”。陈嘉庚不置可否，心中鄙其无人格，与汪精卫是一丘之貉。高凌百一走，他便把电报发出，并交各报登载。另外又发一电给蒋介石说：“汪先生谬谈和平，公必被误，万乞坚决实践庐山宣言，贯彻焦土、全面、长期抗战三大策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博最后胜利。若中途妥协，即等自杀！秦桧张昭，无世不有，幸公明察之！”当时重庆及各省为什么对

此等大事保持沉默，他想不通，决定将致汪两电发往重庆各日报登载，以打开沉寂局面。

过了二天，即十月二十八日，陈嘉庚考虑到重庆各报必不敢登载上述两电，适值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开幕，他便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向大会提出“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议案，用电报发出。那时山城重庆正淹没在亡国论、主和论喧嚣一时的阴郁气氛中，这个电报提案一到，犹如晴天霹雳，驱散了万里妖云，不一会儿就有二十位以上的国民参政员联名签署交付讨论。依照向例，在讨论前，议长须将提案题目向全会朗诵一遍，这次汪精卫以参政会议长担任大会主席，只得硬着头皮向全会高声朗诵，“面色突变苍白，神气非常的不安”。讨论时，虽然有几个“汪记”朋友有气无力地为这位“副总裁”辩护几句，但究竟敌不过一定将抗战进行到底的正义呼声。

陈嘉庚的提案，经在文字上略作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以大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后来邹韬奋在《抗战以来》一书中追述当时讨论的情景说：“提案的内容只是寥寥十一个大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汪精卫在陈嘉庚提案攻击下，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于十二月十八日离重庆潜逃安南。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调整日本”与“新中国”的基本原则：“第一是满州国与中国完全外交之建立；第二是中日反共公约之缔结，附有各地之驻兵权；第三是在平等地位上中日经济合作，附有日人在中国内地居住营业自由、华北与内蒙之资源特权。”二十八日，汪精卫自河内写信给重庆中常会和国防最高会议，提议：“我方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次日在香港公开发表“艳”电，

赞成近卫声明的三原则。陈嘉庚闻讯，于十二月三十一日致电蒋介石指出：“汪精卫甘冒不韪，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稽其行迹，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我公庐山宣言，抗战到底，全国拥护，已成抗日铁案，中途妥协，等于灭亡。汪固深知此义，最近参政会决议，公务员中途言和，即为汉奸国贼，汪身居议长，岂竟充耳弗闻？乃敢弃职离都，背党叛国，殆谓南京傀儡，已首席高悬，非彼莫属耶？此而不诛，何以励众？更何以根绝效尤？”强烈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至此，国民党才不得不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但仍未宣布国法处分。陈嘉庚对此种包庇行为极为不满。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三日，他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事委员会、国民政府及国民参政会质问：“汪与党羽，因中央宽假，得脱身离境，乃复发出艳电，冀摇人心，全国上下，莫不痛恨，咸谓中央必能严令通缉，以正典刑。不意仅革党籍，未及国法”。“今日前方将士浴血挥戈，后方民众卧薪尝胆，战区受难同胞无虑数千万，蒋委座复锐意推动精神总动员，而独容汪贼与其党羽逍遥法外，实南洋八百万侨众所莫解！”蒋介石复电，以“国法未施，已为天下共弃，亦足以垂炯戒”等语相搪塞。汪精卫公开勾结日本，派人在南洋到处活动，散发大量宣传品，企图淆乱听闻，破坏抗战。陈嘉庚复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发出《南侨总会通告第二十一号》，“揭发国贼汪精卫之罪恶，请侨胞毋为妖言所惑”。对于汪精卫恶意指挑的国共合作问题，陈嘉庚着重指出：

“自前年西安事变，共党领袖即力主拥护中央，服从三民主义，真诚合作，共赴国难，早为全国敬仰。抗战以来，屡建殊勋，更臻团结；并复宣布拥护蒋公，遵行国策，轰轰烈烈，光明正大，可以质诸天地鬼神而无

愧，岂汪贼及其少数嫉忌党人所能破坏耶？”^①

在反对投降派的斗争中，陈嘉庚不顾个人私谊，不怕得罪国民党巨头，敢于第一个站出来揭露声讨汪精卫卖国求荣的罪恶活动，并且追究到底，这种公忠体国、除恶务尽的精神，赢得了许多爱国军民的同情和敬佩。而通过这一场斗争，陈嘉庚也开始觉察到作为抗战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对汪贼的卖国活动，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深恶痛绝。

五

“南侨总会”成立一年间，陈嘉庚领导南洋华侨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总会的分支组织，发展为八十多个团体。

“对祖国战区的筹赈工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未曾有；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②。在华侨承担常月义捐和购买巨额“救国公债”的情况下，陈嘉庚还勉励闽侨认购福建省公债（各地总计一百余万元）。为了救济残废伤兵，陈嘉庚接受爱国侨胞的提议，由“南侨总会”发出通告，接受侨胞捐献公债券作为基金，设立“救济残废伤兵委员会”。日寇铁蹄蹂躏华中、华南之后，中国海口概已沦陷，对外交通仅存陆路二条，即新疆路线和西南路线，而以西南的真缅路为主。当时滇缅公路刚刚开辟，路面崎岖不平，十分缺乏有经验的汽车司机。陈嘉庚受“西南运输公司”委托，由“南侨总会”发出通告，号召华侨司机回国服务。数月之间，各地华侨司机和机修工人踊跃报名，热诚回国服务者达三千二百余人。他们自甘放弃海外优裕生活，在腐败的国民党统治下的大西南，流血流汗，艰苦

① 《南侨回忆录》第74页。

②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十三号。

备尝，日夜驾车奔驰于险峻的高山深谷之中，表现出中华海外儿女为国牺牲的崇高品质。为了改善滇缅路管理不善的情况，陈嘉庚还派出代表，携带增设七个停车站的援助计划回国视察。代表归来后，他分别函电昆明“西南运输公司”办事处和重庆军事委员会，要求尽速改进滇缅路的管理。为了提供药品，南侨总会还发动各地华侨捐献，并在新加坡设厂自制匹灵片及仁丹等药。一九三九年秋，英德宣战后，马来亚政府禁止各物出口，制药厂被迫停办，旋将机器运回重庆设厂制造。此外，还募捐了寒衣五十万件，救济祖国抗战后方军民。

陈嘉庚领导“南侨总会”，与亲日汉奸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早在“南侨总会”成立不久，华北汉奸江朝宗、池尚同（前集美学校校长）、王大贞（泉州人）等联名来电鼓吹对日言和，妄图引诱陈嘉庚和“南侨总会”赞同，陈嘉庚回电痛斥他们“卖国求荣，谄媚无耻，沐猴而冠，终必楚囚对泣，贻子孙万代臭名”！新加坡市政局有一粤侨议员主张订购日本水泥，陈嘉庚在筹赈游艺会怒斥其“忘祖”、“腐化”，于是舆论同声反对，使他不得不收敛作罢。

陈嘉庚还热情支持国内人民和海外华侨的各种爱国救亡活动。在一九三九年一年里，他热情协助武汉合唱团、新中国剧团、中国歌舞剧艺社等抗日文化团体到马来亚各区演唱募捐，按月汇款维持因宣传抗日被国民党政府停止津贴的上海《国民日报》（后改为《神州日报》）。他以福建会馆名义，募捐六万余元援助马来亚峇株巴辖日营铁矿的华侨罢工工人，营救因反日示威被当地政府拘捕的爱国华侨。

陈嘉庚为争取国际友人援助中国抗战，号召华侨爱国守法，在遵守当地政府法律的前提下，开展爱国救亡活动。一九三九年夏，日本要求英国政府引渡天津租界内的中国白银和反日爱国人

士，英驻日大使有妥协表示，海外华侨纷起反对。陈嘉庚以争取英国支持中国抗战为重，召集新加坡侨民大会，号召侨胞“衡其轻重，加以原谅，万万不可作轨外行动”，同时以大会名义致电英国议会，要求主持正义，帮助中国。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做法，赢得英国议会许多议员的同情和支持。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三日，英国政府对德宣战。陈嘉庚于十五日发表《南侨总会通告第二十三号》，号召华侨“推诚拥护英国之义战”。十二月二十八日，新加坡政府以“反英嫌疑”和“暗助非法团体”的莫须有罪名，驱逐“南侨总会”委员侯西反出境。陈嘉庚一面向新加坡当局提出质问，一面召集大会，为侯西反鸣冤，并号召“南侨总会”所属组织更加努力工作。

陈嘉庚在致力领导华侨抗日救亡工作的同时，继续关心和支持祖国和南洋华侨的文化教育事业。他创办新加坡水产航海学校，招收学生一百余人，为祖国培养人才，以备抗战胜利后挽回海洋权利之用。他继续出资维持集美学校的经费，还发动集美校友捐款二十三万元修复被炸校舍，向华侨陈六使劝募公债券一百万元，充作集校基金。

在战云密布、国势危急的紧要关头，陈嘉庚挺身而出，以身作则，引导南洋华侨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开展，无愧为海外爱国侨胞的一面光辉旗帜。

第六章 回 国 慰 劳

一九三九年冬天，陈嘉庚看到日军大举进犯我国，沿海重要港口相继沦陷，海外华侨不仅回国困难，就是对祖国抗战局势、民众生活以及机工回国服务情况也缺乏确实的了解，对祖国的思念更加殷切。为了慰劳忠勇抗战的战士和灾难深重的同胞，他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简称“慰劳团”），登报通告南洋各地华侨筹赈机关派代表参加。代表资格：（1）须通晓国语和略识中文，（2）没有吸鸦片烟等不良嗜好，（3）每人要自备旅费新加坡币一千二百元，（4）私人如具备以上条件，经当地筹赈会或商会介绍，也可以参加。为了使教育界人士有参加机会，陈嘉庚还特别规定，家庭生活困难者，由所派机关负责补助。慰劳团初步决定来年三月出发，进行往返三个月的慰劳活动。各地爱国华侨团体热烈响应，陆续报名参加者达五十余人。

新加坡国民党人对华侨一向自称是代表祖国抗战政府，对重庆政府又冒认是爱国华侨的领袖，把广大侨胞踊跃输将、支援抗战的贡献掠为己有。如果华侨慰劳团真的成行，他们的卑鄙面目便要彻底戳穿，所以不惜千方百计进行破坏。始则在他们所操纵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叫嚷：“回国慰劳团必须侨领亲行为合

格”。因为侨领多系资本家，既不通国语，又担心个人安全，难得有几个人参加。接着又提出“经费自备，不应动支公款”。实际上慰劳团的经费恰是私人捐助的。最后只好造谣诬蔑，胡说什么：“徒花费十万元巨资，大半为外国赚去，回国慰劳乃形式上无谓应酬，无丝毫实益”等等。甚至由几个人化名致电重庆，诬告慰劳团团员大半是共产党员。种种花样不一而足。有一天，国民党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突然来见陈嘉庚，开口便说：

“慰劳团将回国，你何不到重庆？”陈嘉庚素知自己国语不通，年老畏寒，几年来腰骨时常疼痛，经不起久坐，自发起组织回国慰劳团以来，从未动过亲身回国之念，所以坦然回答：“绝无此意”。高凌百又说：“我来新加坡数年，未曾回国述职，想回国一行，可以作你的代表，如何？”陈嘉庚说：“慰劳团有团长，毋须代表。”高凌百说：“我已决定回去，顺便代表而已。”陈嘉庚听了深感蹊跷，几个月来高某反对慰劳团最烈，今日却主动要充当代表，岂不可怪？高凌百声称决往重庆，必非好意，或系别有使命，慰劳团前途实可担心。他筹思之下，越发感到非自己亲往不可，因匆促做出决定，并立即电邀南侨总会副主席、印尼的庄西言和菲律宾的李清泉同行。庄西言回电同意，李清泉去美国未回，陈嘉庚便约南侨总会秘书李铁民同往，兼任翻译。

一九四〇年二月底，慰劳团正式组成。团员五十人，除菲律宾、香港、安南、缅甸等处代表就地启行外，到新加坡集合者有三十余人，开会数次，选出团长和职员。陈嘉庚在会上一再发言指出：“此次回国是代表千万华侨进行慰劳，绝不是应酬游历，大家必须谦逊俭约”，“善保人格”，“更不可夸张自满”。国民党人眼看慰劳团和陈嘉庚就要成行，竟通过一个英国商人向殖民地政府告发陈嘉庚是共产党。大概是谎言造得过于离奇，连殖民地政府也不敢相信，这一着又以失败而告终。

三月六日，慰劳团搭乘“丰庆”号轮船，由新加坡赴仰光，准备由仰光经昆明转往重庆。陈嘉庚为了赶上国民参政会会期，于三月十五日偕李铁民乘英国邮轮离新加坡，十九日抵仰光，为了等候庄西言到来，在那里停留一星期。二十六日，陈嘉庚和庄西言、李铁民等五人乘“康定”号飞机自仰光直飞重庆。

二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时十五分，陈嘉庚等在重庆江底机场下机。重庆各界人士在机场设临时茶会欢迎，陈嘉庚即席答记者问，阐明回国目的。他激动地说：“我离开祖国已十八、九年了，对于国内的情形，很欠明悉。但是我有一颗心，这颗心随时随地都惦念着祖国！……这次我们回来，带来的是一颗心，一颗赤裸裸而又热诚的心”^①！他声明自己和庄西言是以南侨总会正副主席的身份回国，准备与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约期会集重庆，并不是慰劳团团长。此次回国的目的，一是向抗战军民致敬慰之意，二是考察战时国内状况，带回南洋向华侨报告宣传，使千万华侨增加爱国热心，以外汇财力助祖国抗战。至于慰劳考察行程，他郑重地表示：

“余久未回国，究可往若干处，能否达到，不便预告。若第八路军所在地延安，如能达到，余亦拟亲往视察，以明真相，庶不负侨胞之委托。”^②

茶会后，各界准备三顶轿子供陈嘉庚等乘坐，陈嘉庚看大家都是步行，也坚持步行登上石阶三百级，到达岸上，然后由庄西

① 《渝机场万头攒动，欢迎陈嘉庚先生》，上海《国民日报》一九四〇年四月三日。

② 陈嘉庚：《自仰光飞重庆》，《南侨回忆录》第99页。

言陪同，乘汽车抵嘉陵招待所下榻。这时，他听说国民党政府已拨款八万元，由组织部、政治部、海外部派员接待，市内有名旅馆一二等房位均被保留供慰劳团住宿，深感不安，认为政府如此讲究排场，各界人士以及各省区地方官吏势必群起仿效，在平时尚属不宜，在抗战期间更觉不合。他立即写了一份启事，交各日报刊登，声明慰劳团一切费用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一文，“且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第二天，他又托人借用嘉陵招待所空屋两座，为慰劳团住所，又向某社团借来桌椅、盘碗，准备自办伙食。

华侨回国慰劳团自滇缅路进入国境之后，云贵两省国民党政府机关沿途设宴招待，一起接着一起，竟有一地滞留三四天，甚至七八天的。在等候慰劳团到来的日子里，陈嘉庚对蒋介石以下的国民党要人都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要人也一再设宴招待，陈嘉庚因此到过嘉陵宾馆好几次。这是一座建筑设备十分富丽堂皇的宾馆，相传是行政院长孔祥熙所开。陈嘉庚起初简直不敢相信，以为孔是最高行政领袖之一，那来如此巨资？又怎肯与民争利？后来孔祥熙亲口承认不讳，他目瞪口呆，惊讶不已。有一次，陈嘉庚应邀到全国经济学社年会演讲华侨投资问题，主席马寅初听后，上台发言说：“现在国家不幸遭强敌侵略，危险万状，而保管外汇之人，尚逃走外汇，不顾大局，贪利无厌，增加获利五七千万元，将留为子孙买棺材？”他越讲越激动，声泪俱下，陈嘉庚深为震动，也深受感动。他万万想不到华侨捐献祖国抗战的血汗，竟是这样落进贪官污吏的私囊！又一次，他在与孔祥熙和教育部长陈立夫谈话中，得知国民党政府准备把厦门大学改为福建大学，他认为这样一来，暂迁长汀的厦门大学战后势必迁到省会福州，顿时气得说不出话来，直到三月三

十一日晚参加国民参政会举行的茶话会时，才就这件事公开提出质问：一、新加坡当局接办华侨创办的陈笃生医院，尚不肯埋没创办人名誉，我国素称礼义之邦，反欲如是摧残，诚所不解！二、厦门大学是我国研究海洋生物的重要基地，为世界所公认，为何要任意改名？甚者准备放弃？三、厦门是福建华侨唯一出入门户，如无故将厦门大学改名，难免使华侨产生疑问心理，影响筹赈和侨汇收入。陈立夫被质问得狼狈不堪，两天后亲访陈嘉庚，表示此事从此作罢，决不再提。陈嘉庚在重庆还见到了冯玉祥、何应钦、陈诚、白崇禧、戴季陶、孙科、宋子文等人，除个别人如冯玉祥将军还算谈得来外，大多数都没有给他留下良好的印象。在广泛参观访问中，所闻不外是官吏营业，机关滥设，特务横行，民不聊生；所见长衣马褂，脂粉旗袍，灯红酒绿，车马如龙；倡“新生活”而污秽满目，夸“民主”而钳制舆论；谈“抗日”而销售敌货；真是“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他私下叹息说：“那些国民党中央要员都是身居国家要职，但都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最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国家前途深可忧虑，但现在又不能说。”^①在一次招待宴会上，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想拉拢陈嘉庚入党，说：“我们欢迎陈嘉庚先生来共同领导国民党！”陈嘉庚一听此言，马上露出很不愉快的脸色。善于察颜观色的戴季陶赶紧转圜说：“陈先生一向为国家社会服务，入党与不入党是一样的。”

在重庆期间，中共参政员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三人专程拜访了陈嘉庚，并赠送陕北出产的羊皮衣三件，双方就解决国共两党磨擦问题交谈了几个小时。叶剑英在谈话中表示赞成白崇禧提出的调解意见，“但求能一致对外，中央不再存心消灭延安，

^① 庄明理：《悼念陈嘉庚先生》，《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第28页。

则均可接受。”陈嘉庚转达侨胞希望“国内和协对外，期获最后胜利”的愿望，并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的诚意。

陈嘉庚还广泛地接触社会名人、报界记者、福建同乡和厦大集美校友，参观街市、工厂。这时候，陈嘉庚也听到许多恶毒攻击延安解放区的话，如说什么那里的“人民如何苦惨，生活如何穷困，稍有资产者则剥榨净尽，活埋生命极不人道，男女混杂，人伦不讲”等等，觉得与他所接触过的几位中共领导人的言行大相径庭。为着了解真相，他暗下了亲往延安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和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在红岩村举行欢迎茶会。陈嘉庚在叶剑英、林伯渠、邓颖超陪同下前往参加，到会者百余人，秦邦宪、叶挺也在座。林伯渠主持茶会，首先致欢迎词。陈嘉庚在致答词时，介绍了南洋华侨声援祖国抗战的情况，还特别强调国共两党团结问题，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今日抗战的中国，正如同父母生出来的一对兄弟，或一对姊妹。兄弟姊妹的面目虽不相同，名字虽不相同，但心是一样的。……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过你们共产党革命的目的，辛辛苦苦，流血牺牲，也不过是为改造社会，使国家民族好。我呢，这些年来也挣一些钱，都拿来办学校，所谓取诸社会，用诸社会。我的希望也不过是要社会好。这一点初心，我想我和你们共产党人改革社会的动机原是一样的。”^①“若不幸发生内战，海外华侨定必痛心失望，对义捐及家汇不但不能增加，势必反形降低”，“万望两党关系人以救亡为前提，勿添油助火，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叶剑英上台致谢，说他欢迎的不是资本家的陈嘉庚，而是欢迎革命的陈嘉庚^②。会后，陈嘉庚详细询问了到延安沿途交通食宿情况。叶剑英一一作了解答。几天后，毛泽东主席来电，正式邀请陈嘉庚访

^{①②} 仲约：《记陈嘉庚先生在祖国》，缅甸《仰光日报》，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晨刊第三版。

问延安。

四月十四日，慰劳团全部到达重庆。经过十几天紧张的参观访问之后，分成三个团，每团十五人，于五月一日离开重庆，到各地进行慰劳活动。第一团由新加坡侨领潘国渠率领，前往四川、陕西、河南、湖北、安徽五省；第二团由菲律宾侨领陈忠赣率领，前往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六省；第三团由安南侨领陈肇基率领，前往甘肃、青海、宁夏、绥远、四川等省。约定事毕各自解散回洋。庄西言因荷印局势紧张，提前南返。陈嘉庚为了准备访问延安，没有与慰劳团同行。他在侯西反、李铁民的陪同下，于五月五日由重庆飞往成都。

三

从重庆飞成都，仅一小时航程。陈嘉庚一到成都，便拉着侯西反、李铁民雇人力车前往武侯祠参观。因为他自少年时代看《三国演义》起就对诸葛亮的事迹印象极深，五十年后得偿夙愿，自然是急不可待了。在瞻仰昭烈祠、武侯祠的宏伟庙容之后，他发现昭烈陵墓右侧，正在大兴土木，单从四周基址看，规模比武侯祠、昭烈祠、昭烈墓还要大，经过查问，才知道是四川大军阀刘湘后人为其营建陵墓。陈嘉庚认为刘备、诸葛亮都是历史上的“贤君良臣”，受到人民爱戴，刘湘何人，敢与争竞颉颃，岂不荒谬绝伦？而且建庙之款从何而来？难道不是民脂民膏？他感慨地说：“余意国民政府，若政治有是非，或四川省政府与民众亦有是非，则当加以纠正，不容泾渭合流，鱼目混珠。”^①

早在抗战前，陈嘉庚就从报纸上看到“四川鸦片之多要算全国第一”，“四川的政治糟糕已极”，“四川匪祸不堪言”等报道，这次听说四川省的田赋已经征收到民国七十年（公元一九八

^① 陈嘉庚：《鱼目欲混珠》，《南侨回忆录》第135页。

一年)即预收到四十余年以后时,亦不禁为之咋舌。

蒋介石此时正以兼四川省政府主席的身份留在成都,听说陈嘉庚来了,先在军校内公宴,陪客有军政要人百余人。次日又特邀午饭,饭后把陈嘉庚留下来谈话,问到成都后还想去什么地方?陈嘉庚答:“还要到兰州与西安。”蒋又问:“还有其他地方要去吗?”陈嘉庚知其意有所指,便直截了当地说:“延安如有车可通,也要去。”蒋介石听了,着急不堪,便大骂共产党“无民族思想”,“口是心非,背义无信”等等,又说:“周恩来不日可到,看此来有何结局”。陈嘉庚感觉莫名其妙,解释说:“余以代表华侨职责,回国慰劳考察,凡交通无阻地区,不得不亲往以尽任务,俾回洋校有事实可报告。”蒋介石只好说:“要往可矣,但当勿受欺骗也。”^①

陈嘉庚参观市容和四川大学之后,又乘车参观灌县都江堰水利工程和闻名已久的青城山。五月十四日,乘飞机到甘肃兰州。他除出席甘肃省主席兼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举行的欢迎会外,婉辞一切公宴。陈嘉庚来兰州的一项重要目的,就是想经此前往新疆考察西北路运输状况。因为自抗战以来,国际援助由公路运入我国者,除安南至广西、缅甸至云南的公路外,便是苏联至新疆一路了。经过探访和该线管理机关的介绍,才知道西北公路长三千多里,沙雾常发,沿途添油十分困难,每月运输量不上千吨,另外还有千头骆驼驮载,一次往来需三四个月,月平均亦不过数百吨,合计仅运一千吨多一点,对军运贡献不大,乃决定取消新疆之行。

兰州各界准备召开隆重的欢迎会,陈嘉庚听说第三慰劳团已到天水,不日即来兰州,建议届时一并举行,自己则利用这一段时间往青海西宁访问。沿路所见乡村,住宅简陋,村民衣服破碎,

^① 陈嘉庚:《蒋公问何往》,《南侨回忆录》,第136页。

不堪入目，男女孩童多露下体，兰州附近十岁左右女子多数缠足。陈嘉庚看见祖国内地如此贫穷落后，伤感无已。

陈嘉庚自西宁回到兰州，第三慰劳团已经到达。按照预订计划，第二天出席兰州各界欢迎会，并在会上报告慰劳团回国目的和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情形。

陈嘉庚先后在兰州逗留了七八天，参观了旧街道、黄河桥和成吉思汗遗骨，并与路经兰州的绥远省主席兼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会见。这是陈嘉庚回国以来第一次和抗日前线的高级指挥官谈话。傅作义以敌军士气衰落为例说明“胜利决属我”，听后他心中无限欣慰。是时，蒋介石亲信、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也在兰州，“诚意设宴”招待，陈嘉庚辞谢不去。越两日，戴笠特意来告，湖北钟祥、宜昌前线大捷，歼敌三四万人。陈嘉庚以为戴笠专搞情报工作，“其消息必灵敏可靠”，想不到几天后到西安一问，“所闻则大相逕庭”，宜昌早已失陷，敌寇甚形猖獗，不免大失所望。

陈嘉庚在兰州还与第三慰劳团员谈了话，指出：“我们华侨是无党无派的，……不是以任何那一党的立场去慰劳。……我觉得我这次回国，无论国民党共产党，各方面的领袖都要见一见，听听他们对我说的什么话。他们对抗战，对团结，说了真心实意的话，我要听；即使是假话，我也要听听。因为将来有一天，如果有谁不实践他们说过的话……不守信义，那末，我就有好说的了。我可以对侨胞说‘他亲口对我说的，他对我说的话都是假的’……”^①

这时，他又听说第一慰劳团已抵达西安，为了避免各界重复开会欢迎，便决定五月二十四日乘汽车直往西安，并从那里出发，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① 仲约：《记陈嘉庚先生在祖国》。

第七章 访问延安

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五日近晚，陈嘉庚一行来到西安，下榻西安招待所（即“营业旅馆”）。平生阅读历史，陈嘉庚对咸阳、长安印象甚深，这次亲临其地，真是喜慰无似了。

当天晚上，第一慰劳团团长潘国渠等即来相会。慰劳团已先到四天，本亦住在这家招待所，后因与中共西安办事处接触，陕西省府要人大为光火，竟将他们强行移居他处，并派“招待员”随同团员出入，加以监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慰劳团抵达西安的次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亲自来访，约他们到七贤庄办事处午饭。慰劳团接受邀请时，负责招待的陕西省府第一科科长寿家骏力阻其行，后又拿出请柬一张，说是已有他约在先。朱德将军改约下午三时，并说周恩来由延安经此将往重庆，特多留一天，与慰劳团会晤。慰劳团欣然答应，寿家骏等见公开阻挠无效，便暗中破坏，将汽车开往别处，至傍晚方回，使慰劳团无交通工具而失约。……

陈嘉庚听了潘国渠等的报告后，对陕西省府要人的卑鄙用心深为厌恶和鄙视，在第二天程潜、蒋鼎文、胡宗南等举行的晚宴上，他针对陕西政治腐败的情况，意味深长地说：

“我在南洋经营橡胶园，对如何管理橡胶树知之较

多。橡胶树最忌的是恶草和白蚁，恶草会把橡树缠死，白蚁会把橡树蛀死，二者如不除绝，橡胶园便无法管理成功。我国现虽遭敌人侵略，但最后胜利必定属我，我想抗战与建国，亦当与种橡胶园除绝恶草与白蚁一样，必须清除土劣贪污，则建国决可成功。”^①

他的讲话，比喻恰当，含义深刻，当时就有人对他说：“先生今晚说此几段话，胜过携来数千万元回国！”

在西安的几天逗留中，陈嘉庚和第一慰劳团一起活动：出席在秦王府前圪地举行的西安各界欢迎大会，参观第七军校操演，游览终南山、周文汉武陵、卫青霍去病墓、骊山秦始皇陵和马嵬坡杨贵妃墓。

为了实现访问延安的愿望，陈嘉庚亲自访问了七贤庄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接待他的蒋处长告诉他：鉴于前几天慰劳团住处被迫迁移事件，未敢再到招待所联系。陈嘉庚说：“我可以自由打算。前次慰劳团失约，完全是重庆派遣同来者所为，对不起朱德将军的盛意，请代电延安道歉”。随即约定行期和行前的一切应有准备。

五月三十日清晨，陈嘉庚、侯西反一行乘坐陕西省政府所备的一辆小汽车和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两辆汽车离开西安，中午抵达三原县，晚宿宜君县。三十一日早继续出发，中途在中部县（今黄陵县）拜谒了“轩辕桥陵”和“黄帝祠”。近午抵达洛川县，这是国民党政府在陕西境内统治所及的最北的县城，过此便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了。陈嘉庚一打听，知道傍晚便可以赶到延安，心中十分高兴，催促及早开饭赶路。洛川农民、公务员及各界数百人列队欢迎，他除了略有点不安之外，便无暇加以注意了。饭毕登车，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些“民

^① 陈嘉庚：《抗战与建国之喻》，《南侨回忆录》第146页。

众”突然送上五件文书，陈嘉庚在车上好奇地略为翻阅，原来都是攻击共产党种种“不法”之词，内容大同小异，如出一手，因而随手撕碎，掷于路旁。后来寿家骏又特意送来一份，陈嘉庚心里想，此事“非出于西安省主席命意，必出于洛川县长主张”，“下属既多生事，上级必增加磨擦”，又“安得不恶感日剧”呢？

出洛川，便是陕甘宁边区所辖的郿县地界。自郿县往北，公路崎岖不平，但陈嘉庚响往延安心切，顾不得颠簸，车逢平坦处即疾驰而前，下午四时抵甘泉县休息。当他知道再过两点多钟便可到达时，心情更加激动，路上忐忑不安地自问道：

延安，共产党统治下的延安，究竟又是何等的景象呢？

二

一九四〇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五点半，陈嘉庚一行所乘的汽车比通常行驶时间提前一个多钟头到达延安，受到吴玉章、肖劲光、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和三千余名群众的欢迎。

在延安各界欢迎大会上，陈嘉庚作了简短的讲话。临结束前，会场后方突然发生一阵骚动，听说有两名国民党特务捣乱，经保卫人员采取果断措施后，几分钟内便恢复了秩序。

当晚，陈嘉庚等在招待所山上的窑洞过夜。数口窑洞一字排列，每洞长约三丈，宽一丈，高九尺，正面有用白纸重新裱糊过的门窗，气温较洞外略低，洞内陈设床椅数件，简单整洁。这种窑洞生活，在陈嘉庚生平还是第一次。

六月一日，陈嘉庚一大早便起床，北国的清晨，虽然时届夏季，仍然略有凉意。早餐后，参观女子大学，校舍就设在窑洞中，面积大者可容一班约三十余人。不久朱德将军赶来相晤，陈

嘉庚一再对上次西安失约表示歉意，朱德答说：这事“完全是省府恶意阻挠，不许慰劳团赴宴”所引起，“省府自来多端恶意，往往如是，致两党意见日深”。近午辞出时，秘书李铁民不慎触车顶碰伤额角，出血不止，经送往医院治疗，看护招待甚为周到。

毛泽东主席约定下午四时会见，此时尚有几个钟头的间隙，陈嘉庚吃罢午饭，便与侯西反一起，由服务员引导，缓步游览延安城。

延安城内自前年惨遭敌机轰炸，商店住宅倒塌，留下断栋残垣，居民多移住城外附近窑洞。陈嘉庚等走过穿城而过的公路，登上陡坡，浏览全城，只见三面山岭叠伏，宝塔屹立山顶，延河从城边绕过，形势优美伟壮。他默默地想着：延安地处南北交通要冲，战争胜利古城重建之日，这里一定可以发展成为数十万人口的大都市。

下午四时，陈嘉庚与侯西反乘车来到杨家岭，毛主席已在门前等候。陈嘉庚被迎进窑洞里，眼睛一瞥，屋内摆设的只有一张陈旧的写字木桌，另有十余张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都是些乡村农民用的旧式家私。共产党领袖的住处如此简单朴素，令他感佩不已。毛主席面容肖俊，蓄着长发，衣着朴素，神态慈祥，亲切地与陈嘉庚攀谈。虽是初次会面，却给陈嘉庚留下深刻的印象。

毛主席和陈嘉庚第一次长谈的内容，由于没有记录而不得其详。据陈嘉庚后来的追忆，他向毛主席表示了海外侨胞的慰劳，询问了毛主席的工作生活情况，知道毛主席习惯在夜间工作，鸡鸣后始睡。陈嘉庚劝其改在白昼工作，或更有利于身体健康。谈话之中，朱德将军、陈绍禹夫妇和一位南洋女学生、一位男学生先后到来，参加座谈，陈嘉庚特别注意到他们来时都是“无敬礼便坐，安然座谈，绝无拘束”，这种“平等无阶级制度”的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他深感新奇和赞叹。

日落时分，毛主席、朱德将军等与陈嘉庚共进晚餐，筵席设于门外露天场地上，对陈嘉庚来说，这是平生第一次赴这种由重要人物邀请而十分俭朴的宴会。十余人围坐一桌，一块陈旧不光洁的园桌面放置在一张旧方桌之上，四张白纸覆盖桌面，作为“桌巾”。开宴之前，一阵风吹落了白纸，便干脆不用，端上饭菜。席间，毛主席非常赞赏陈嘉庚的爱国精神，说：“我们大批的中国人在海外，都是我们的同胞，好好地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大家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救国”。并请他向海外侨胞转达^①。这一餐，陈嘉庚吃得非常轻松、愉快，他深深感领了中国共产党和陕北军民对海外中华儿女的厚意深情。

在延安的第一天，是陈嘉庚有生难忘的不平凡的日子。他看到了、听到了与国民党统治区截然相反的新鲜事情——这是敌人百般封锁甚至采用各种造谣污蔑手段力图掩盖的解放区的现实。眼界打开了，思路开豁了，多年来的种种迷团也焕然冰释了。对中国共产党英明正确的抗日主张和边区军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充满了敬慕的心情，陈嘉庚对国内政治形势的认识从此开始了转折。

三

由于李铁民碰伤住院，陈嘉庚在延安多留了几天，因而有机会对延安的政治社会情况，获得比较全面的了解，并与毛泽东主席、朱德将军等进行了数次深入的交谈。有一天，陈嘉庚听说国民党军两师已由胡宗南率领进占郿县宜川，军事形势日形严重，心中焦急非常，适朱德将军来访，便问是否事实？朱答：确有其事，其恶意可知，我暂静观一步，看彼如何行动。越两日，在招

^① 据参加这次宴会的厦大校友吴亮平的回忆。

待所再一次见到朱将军，陈又提起前事，朱说：“无何变动。”关于国共两党磨擦问题，朱将军详细列举了国民党阻挠边区军民抗战的种种事实，多为陈嘉庚所未闻。他事后在《南侨回忆录》追述说：

“……中央对我歧视日深，阻挠特甚。如步枪之子弹，原订每月供八百万粒，如约交付者只一年，过后屡催不交，或交少数。虽向蒋委员长交涉，经下手令囑交，亦领不足，迄今已八个月无交一粒。又自抗战以来，未有交我一支步枪，一粒大炮弹，其他可以想见。如君不信，见蒋委员长可问是否事实。前年敌军入山西猛进猖獗，阎将军军队被迫不堪，曾电重庆军委会，拟保主力，全军渡黄河守陕界。何部长将赞成，白副总参谋长则反对，云共产军三万兵，在山西更前线，尚能死守不退，山西军十余万反须撤退，理由何在？于是共商于蒋委员长，赞成白君主张，即电阎将军死守，或化整为零。可见若无我等军队勇敢死守，敌人不但占全山西，就是甘、陕、川均受威胁。又抗战以来中央军官兵屡屡升级，无师不有，而我军牺牲苦战未有升一人，其待遇不公如此。

“又前年西安事变，当时订约划出陕北十八县、宁夏三县、共二十一县为边区自治政府，由共产党主持，归中央政府直辖，与陕西省政府无关，并承认军队三万人，月助军政费六十八万元，共产党则实行三民主义。所订各条件，须经行政院通过，宣布全国各省县咸知，自订约之后，我已实行三民主义，中央行政院亦通过条件，然不肯发表，告知各省县。我所言句句属实，先生如不信，可问中央行政院要人便知。”^①

^① 见该书第157页。

四日下午，陈嘉庚由朱德将军陪同，参观第四军校。学生们正在比赛篮球，看到朱德到来，即有一个学生高喊：“总司令来比赛一场”，朱将军立即脱下大衣，与学生们打了两场篮球。陈嘉庚又一次为这种领袖与群众完全打成一片的作风所感动。

五日，与财政、公安负责人谈话。在与财政负责人（福建龙岩人）谈话中，陈嘉庚了解到所有商店都是“商民私人营业，与政府无关”，不论资本多少，政府均无抽税，民众田园“由人民自己管业，政府无干涉，就是新垦荒地亦然”，新垦荒地三年已有“三百余万亩”。政府抽税，每亩“收成产物每季如不上一百斤者免抽，如上四百斤者每百斤抽一斤，如加收一百斤即加抽一斤半，至多抽至七斤半为止”。除此以外，“其他捐税如房租、地租、保甲、糖、盐、布帛等税，完全无有”。陈嘉庚惊奇地问：“果如此，共产党政治何在？”回答说：“已实行三民主义有年矣。”在与司法负责人（厦门大学毕业生）及其他来自南洋的男女学生的谈话中，陈嘉庚得知当地“治安良好，无失业游民，无盗贼乞丐”，“县长概是民选，官吏如贪污五十元者革职，五百元者枪毙，余者定罪科罚，严令实行，犯者无情面可袒护优容”。公务员薪水每月五元，“虽毛主席夫人，朱总司令夫人，亦须有职务工作方可领五元零用，至膳宿、衣服、疾病、儿童教养、应酬等概由政府供给”。陈嘉庚听后钦佩无已。

在与公安负责人的谈话中，陈嘉庚对八路军如此大量扩充，会不会促使矛盾激化，表示忧虑。据答：“不如此，则无以自卫，恐被国民党消灭，且各沦陷区广阔，非如此亦不能抵抗敌人入侵，而非完全对内”。又问如此大量扩充，军械从何处来？答：“一部份抢之敌人，一部份买诸民众”。又问：民众安有许多军械可买？答：“敌我战争胜负之间，遗弃军械势所必有，拾得者双方均有私售于民众，由民众转售而来。本党多组织游击

队，兼用旧式武器，夜时杀敌，颇称利便。”

五日晚，朱德将军在延安戏院主持演讲会，陈嘉庚在会上报告了南洋华侨支援抗战的情况。六日，朱德将军和夫人康克清陪同陈嘉庚访问西塞县。七日晚，延安各界人士千余人召开了欢送陈嘉庚大会，朱德将军出席了大会。

和毛泽东主席相处更是毕生难忘。经常彻夜不眠、为国操劳的毛主席，多次亲临交际处，或同午饭，或共晚餐。陈嘉庚印象最深刻的，是毛主席的虚怀若谷，平易近人。在几次交谈中，陈嘉庚代表海外华侨希望两党能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凡有政治上不快事项，待抗战胜利后解决，此乃内部兄弟自生意见，稍迟无妨”。毛主席满口应承，并托他见到蒋委员长时，代为表白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同时将在此所见到的一切如实向侨胞报告。陈嘉庚表示这两件事“负责做到”。他此时已经下定决心，“凭自己的人格与良心，决不指鹿为马，不待到南洋，就是出延安界，如有人问，定据实报告”。有一次共进晚餐之后，毛主席在问明寿家骏的住处后，即走入窑洞前一间小平屋，与寿家骏谈了几个小时。陈嘉庚在窑洞口待与毛主席相辞，直等到晚上十时还没有看见毛主席出来，只好入洞就寝^①。这件小事给陈嘉庚留下深刻的印象，毛主席同国民党地方政府一个科长尚能如此长谈，足见其襟怀之广阔，态度之谦虚，实非常人所能及啊！

四

在前后九日的停留中，陈嘉庚在延安所获得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在自己思想上所引起的变化，也是十分剧烈的，他把在重庆和延安两地的所见所闻作了一番比较之后，不胜感慨地说：

^① 陈嘉庚：《毛主席与寿科长》，《南侨回忆录》第160页。

“余到重庆所见，男则长衣马褂，满清服制仍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染红指甲，提倡新生活者尚如是。行政官可私设营业，监察院不負責任。政府办事机关，除独立五院及行政院所辖各部外，尚有组织部、海外部、侨务会及其他许多机关，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交际应酬互相征逐，汽车如流水，需油免计核，路灯日不禁止，管理乏精神，公共汽车、客车、人力车污秽不堪入目，影响民众卫生。报纸为舆论喉舌，责在开化民智，则钳制严密，致每日仅出一小张，何能模范各省？其他政治内容非余所知，第就外表数事，认为虚浮乏实，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

“迨至延安，则长衣马褂、唇红旗袍、官吏营业、滥设机关及酒楼应酬诸有损无益各项，都绝迹不见”。

“如‘民众生活惨苦’，则所见所闻都未有，商店自由营业。至于‘男女不伦’，如行路来往，座谈起居，咸有自然秩序。常有一二南洋女生在招待所留晚餐后，将回校须十左右里，余问夜时有无关碍，答绝对无关碍，此处风俗甚好，一人原常夜行，此为余所见者。至于所闻，……虽男女同坐，无人敢戏言妄语，非法举动，都能守分。如互相恋爱，可自由结婚，只向政府处签押注册、简便了事。……男女衣服均极朴素，一律无甚分别，女衣较长些，人人如是。设有一两人粉装华丽、锦衣特色，不但被人视同怪物，自己亦羞愧不能自然。又如无谓应酬，浪费交际，亦无从开消，虽有资财竟同无用耳。”^①

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陈嘉庚，自然而然地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

^① 陈嘉庚：《重庆与延安》，《南侨回忆录》第162页。

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后来，他在《南侨回忆录弁言》上写道：

“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在《陈嘉庚言论集自序》中，他还写道：

“过去对国事忧虑悲观，无时或已。……民国廿九年（一九四〇年）到延安后，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军事则与民众合作，联络一气，同甘共苦，推诚相待。至政治方面，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整然，优待学生，慎选党员，民生安定。其他兴利除弊，都积极推行。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无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此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一九五〇年七月三日，他在写给董必武同志的一封信中，又回忆说：

“自到重庆后，其政治腐化，在洋久已了解，唯抗日战争发生后国共合作，深喜有最后胜利可期，不意见重庆政府等人轻视日寇重视延安，蒋匪竟明白告我必先消灭共党，抗战乃能胜利，似有对贵党剑拔弩张之势，我忧虑莫可言喻。盖南洋华侨之助款热诚，数年如一日，众为国共和协的（所）鼓舞，兹若不幸破裂，势必冷淡，鼓励乏词，故忧愁莫可比拟。重庆蒋方既无可挽回，但未（知）延（安）方面如何对待，故决心速往访延安。

及毛主席、朱总司令、陈绍禹诸君，俱同声退让，一意抗敌，决避内战，于是使我无限放怀。又最出我意料之外，则政治良好，爱民如赤，勤俭为公，到处如是，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知将来必能振兴中国，了无于〔疑〕义，自是一心仰服，矢志不移”^①。

陈嘉庚从延安的种种新生气象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和光明，又怎能不“无限兴奋，梦寐神驰”，“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呢？

^① 陈嘉庚信函底稿，集美校委会藏。

第八章 为民请命

—

一九四〇年六月八日，陈嘉庚惜别延安，与侯西反、李铁民等乘汽车经鄜县赴宜川，于十日抵达山西克难坡考察。在那里，他受到阎锡山等山西军政首脑的接待。当谈到白崇禧等正在努力调停国共两党“摩擦”时，阎锡山说：“此非根本办法。如果根本解决，国民党政治须实行改善，则共产党自无效用。否则，虽无共产党反对，他党亦能起而反对。”陈嘉庚认为这是“至情至理”的“金石良言”，表示“敬佩莫名”。十二日，陈嘉庚一行离克难坡南下。十四日中午在洛川午饭，县长前来劝说：“昨宜君界，发生共产党暴动，劫许多人，现宜君戒严，城市紧闭，甚为严重，不可前往。”陈嘉庚不听，继续就道，却一路无事。傍晚抵宜君县，当地县长又来诉说共产党劫杀情事，陈嘉庚叫他们开出清单，次早送去，内容与昨日所说又有所不同。陈嘉庚由是明白这是有意构造，愤慨地说：县长把抢劫推在共产党身上，“上级官吏如偏信之，安得不增加两党恶感？”①

陈嘉庚访问延安，使国民党老爷们惶恐不安。他们深惧这位耿介直言的爱国华侨领袖窥破真情，不利于他们一伙继续在海外进行欺骗活动，慌忙筹划对策。教育部长陈立夫带着国民党中央的旨意，抢在陈嘉庚之前赶到了西安。

① 陈嘉庚：《金锁关多匪》，《南侨回忆录》第168页。

十五日黄昏，陈嘉庚刚入西安招待所下榻，陈立夫在蒋鼎文陪同下接踵而至。坐谈之际，陈立夫不问陈嘉庚往延安观感如何，便滔滔不绝地辱骂共产党，“力言往昔共产党经过罪恶”，蒋鼎文偶而插话，“均是证实共产党残忍凶暴”。陈嘉庚默默地听着，不动声色。

十七日，陈嘉庚一行游骊山华清宫后回到西安寓所，突然接到一不相识的何某来柬，邀请晚宴。陈嘉庚本想辞谢不往，后来有人来告何君是铁路局主任，因蒋鼎文通知他特别安排座位，不得不前往应酬一番。这是一次奇特的宴会，宾主十一人，互不相识。宴会一开始，东道主何君便绘影绘声地唠叨起以前在某处主持铁路局时，共产党如何勾引敌人，多购敌货，强迫火车运输，如何“利用其匪徒交涉及种种贪污”行为，他又如何“屡阻无效”等等。话音刚落，陪客中有一人续言共产党诸罪恶，一段复一段。此人言毕复一人大骂共产党“不爱国”等等。陈嘉庚逐渐明白“今晚设此筵席，莫非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是打定主意静听，绝不答他一语。果然不出所料，其余三个陪客也是“互相言三语四，都是一种口气”。席将散时，陈嘉庚发言说：“国内党人在抗战危险时际，尚不觉悟，深失海外华侨指望。余个人未参加何党，此次代表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当然备有耳与目，决不致为一部份人所蒙蔽，负华侨之委托也。”^①

二十天来往返西安、延安之间的所见所闻，使陈嘉庚澄清了国共摩擦的是非黑白，他“亲见两党不合者五次，皆由国民党有意构造，如阻止慰劳团赴朱德之宴，洛川峻民众投书，宜君报告劫案，陈立夫、蒋鼎文来寓宣传，何主任设宴是也。”他评论说：“凡人负有社会任务或政治军事职责，若立心抱定忠信公正，不昧良偏私，自欺欺人，何用此鬼域手段，而为识者鄙薄，有何裨

^① 陈嘉庚：《醉翁之意不在酒》，《南侨回忆录》第169页。

益，岂非弄巧反拙耶？”①

国民党人的欺骗宣传失败了，陈嘉庚于当晚十二时半离开了古都西安，前往河南前线。

六月十九日，陈嘉庚行抵洛阳，受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省主席卫立煌的欢迎。在洛阳考察参观后，二十三日，到达南阳老河口，和李宗仁夫妇相见。二十五日，乘军事飞机抵汉中，次日又自汉中乘机抵成都，第一慰劳团已在前一天到达，回国慰劳的任务至此完全结束了。陈嘉庚的心情十分舒畅，对团员们说：

“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②

慰劳考察的结果，陈嘉庚对国家前途的看法已经开始变了，他不再悲观，而是更乐观了。

此时正届夏季，成都气候酷热，陈嘉庚乘车前往峨眉山避暑半个多月。七月十五日，几经辗转，从峨眉山乘轿到嘉定，十七日上午乘水上飞机到达重庆。第二天，陈嘉庚听说英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停止滇缅公路运输，心中焦急异常。经多方打听后，始知后方军火原料足供两年，禁运时间仅三个月，且值雨季，对我国抗战影响不大，又略感欣慰；即通过电台对侨胞广播祖国抗战前途乐观，英国亦系被迫实行禁运，呼吁侨胞“万万不可轻举妄动，致生事端。”

二十一日，中共代表周恩来访，虽是初次会面，相见甚欢。陈嘉庚特意查询参政员调处两党事进展如何。周恩来说：来此一个多月，最初“离题尚远，故屡停止，迨至近日间为英将许日要

① 陈嘉庚：《醉翁之意不在酒》，《南侨回忆录》第169页。

② 庄明理：《悼念陈嘉庚先生》。

求，封禁滇缅路，中央乃迁就，现大纲议妥，所差仅小事，料可圆满结束”。陈嘉庚听后感到欣慰异常。廿四、廿五两日，叶剑英来访，谈到月前越南海防被日军占领，我国汽油及军用品“存积如山”，因当局“将私货先运”，致“损失七万吨之多”，陈嘉庚又不禁扼腕叹息。

二十四日晚上，陈嘉庚应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的邀请，到“留法比瑞同学会”演讲《西北之观感》。虽然处在轰炸的疏散期中，又下着大雨，听众仍络绎而来，全场座位皆满。演讲中，他如实介绍了在延安的所闻所见，郑重地指出：“那里自抗战以后，土地革命已经停止了，一切抗日的人都很自由。民众生活也很好，不痛苦。说到教育，也很好，他们用新的方法，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成绩。……其余如生产事业，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开荒运动，一年之内开垦了百多万亩田地。这些都是事实”。他详细地描述了毛泽东所住的窑洞，说：“那样简朴是我意想不到的，对他们上下克己耐劳的、努力求进步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在如此艰苦的抗战当中，大家都应该有这种精神才对”。在讲演中，陈嘉庚还语重心长地呼吁团结抗战说：

“兄弟个人完全没有党派关系，总理革命的时候曾经加入过同盟会，以后就没有政党关系。侨胞们亦大多没有党派，我们是以国民的立场，认为举国一致，应该加紧团结。除了汪派汉奸，大家都是必需团结的，也是可能团结的。各党派的领袖们应该负起这个责任。这个不仅仅是国家一时的安危，而且关系民族永久的存亡”^①。

陈嘉庚演说用的是闽南话讲的，但这段话还未经翻译，全场即响起了持久的、热烈的掌声。

^① 《陈嘉庚先生西北归来纵谈团结抗战》，重庆《新华日报》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六日，第二版。参见仲约：《记陈嘉庚先生在祖国》一文。

陈嘉庚的演讲很长，散会时已是十点了。他的演讲给听众留下耳目一新的深刻印象，正如一位记者所报道的：“大家带着满怀的兴奋在细雨的夜里归来”。^①

正因为这番演说言人之所不敢言，以事实矫正了抗战大后方的错误视听，有力地揭露了反动派的造谣诬蔑，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不满和恐慌。第二天，重庆十一家日报中，有五家刊登演词大意，有五家只字不提，《新华日报》则刊登消息一条，并声明：“详细内容，见明日本报特写”。二十六日，《新华日报》在第二版上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陈嘉庚先生西北归来纵谈团结抗战》的特写。

在《新华日报》刊出陈嘉庚演讲西北观感的特写之先，国民党当局企图利用陈嘉庚的数十年知交侯西反来劝他改变态度。侯西反向陈嘉庚转述重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大意是：“陈嘉庚住延安七八天之短期，何能知许详细？以华侨领袖地位，未免为共产党火上添油”，等等。陈嘉庚对侯西反严肃地说：“尔可回复他等；演讲及标题均出于贵协会，而非余自动讨好。君与余同行，自知是否事实，何用多费唇舌？我所讲两种系所闻与所见，从中何句失实？君乃党员之一，可以证明。若云有助于共党者，则我所言诸项，贵党必认为良善政治，故云有益共党势力。然事实胜于雄辩，共党果有良好政治，自能树进势力，外间毁誉何关大局？贵党亦行良好政治与之竞争，勿令独占，则不特抗战必胜，而建国亦决必成。……国民外交协会，乃贵党组织机关，要余往讲《西北抗感》，余以为诚意欲知西北事实，而非要余造作宣传共产党罪恶，故接受之。若先有声明是项，则余必不往。余乃凭良心与人格，将所闻所见发表，余决不能昧良指鹿为马！余在延

^① 《陈嘉庚先生西北归来纵谈团结抗战》，重庆《新华日报》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六日，第二版。参见仲约：《记陈嘉庚先生在祖国》一文。

安大小会四五次，未有一句话奖誉他等，虽衷心表同情多项，然绝未轻说出口。所有发言，无非劝诫其忍耐退让，以国家为前提，团结抗战为天职，此为君所知者。尚有西安省府所派寿科长，亦可作证。”①

陈嘉庚明知说老实话不能取悦于国民党，必定会引起种种攻击，但他大义凛然，明辨是非，刚正不阿，威武不屈。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自己的人格与良心，才有益于抗战和建国。在严格控制下的“陪都”重庆，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二十八日，蒋介石接见陈嘉庚。当陈嘉庚提到阎锡山所谈：“国民党政治须行得好，共产党自消失无能，否则虽无共产党反对，亦有别党可起反对”时，蒋介石脸色突变，破口大骂共产党“无民族思想”，“无信无义”，“欲抗战失败”。他“面红气盛，声色俱厉”地叫喊说：“若不先消灭共产党，抗战决难胜利。此种事外国已多经验。凡国内反对党必先消除，对外乃能胜利。此项话我未尝向人说出，今日对你方始说出，确实是如此！”陈嘉庚见蒋介石言论“比较在成都所骂更激烈”，不欲多言，只说：“华侨心理，甚盼祖国团结一致对外，若内部事待胜利后解决，……”陈嘉庚说完，见蒋介石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便急行告辞而出②。

二十九日，星期天，蒋介石约陈嘉庚到黄山别墅午饭，何应钦、白崇禧、卫立煌、朱家骅、张治中、陈布雷、吴铁城、王泉笙、侯西反、宋美龄等作陪。饭后突来敌机空袭警报，陈嘉庚不便辞回，便与他们坐在会客室里闲谈。蒋介石忽问陈嘉庚：“到国内对国民党观感如何？”陈嘉庚意识到这一次蒋介石要亲自出马拉他参加国民党了，便不作正面答复，婉转地推说：“党务素

① 陈嘉庚：《党人大不满》，《南侨回忆录》第187、188页。

② 陈嘉庚：《必先灭共党》，同上书第188页。

门外汉，亦无注意，故不能答。”过不一会，蒋介石又问：“对国民党有何感想？”陈嘉庚答：“绝无注意此项事，实不能答。”再过一刻，蒋介石追问不舍，他只好回答说：

“国内国民党事，实不能答，若南洋余却知大概，请贡献数事。然南洋政权属他人，或者党人较可随便举动，故多为人不满。客年拟开国民大会，马来亚应举四个代表，中选四人，运动费开坡币一十万元，均为国民党人占有。就新加坡一埠而言，余所言有三四人最合格，名誉财产均有，并通晓国语，然皆弗克上选。其次，外国人害我国最惨者，前为鸦片烟，近年复添一种新祸，就是跳舞营业。……前英国人要交结一华女，亦非容易，现虽印度人，要寻一青年华女亦易如反掌。其致此之由，系新加坡三大跳舞厅，有一间用华女作俑，故互相效尤，至作俑之人，就是国民党闻人。再次，七七事变后约二三个月，南洋华侨抵制敌货剧烈，新加坡敌人自古巴送到羔丕（咖啡）六千包，重一万余担，无人肯买，乃暗贿总商会会长，每担三元，于是总商会提出议案，要代保证非敌货。第一次开会未解决，再召开第二次，为此人（指侯西反）极力反对不能通过，现总商会有案可稽，此亦党员者。”①

陈嘉庚的回答不合蒋介石的口味，白崇禧当即发言转圜说：“此后逐年派专员前往视察。”陈嘉庚却不肯转弯，进一步揭穿：“专员虽去奚益？凡稍有声势官员到南洋，华侨谄媚奉迎，汽车许多等候，应酬不暇，非舞厅则游艺会，若教育机关未一行到，何能视察实情侦查弊端？”蒋介石听罢，假惺惺地对吴铁城说：“以后派人往南洋视察，须禁止应酬。”②他不再追问

①② 陈嘉庚：《蒋委员长三问》，《南侨回忆录》第189、190页。

了，从陈嘉庚口中既然听不到半句附和奉迎、阿谀献媚之词，就更加谈不上拉他入党了。

陈嘉庚不怕邪，不怕压，尊重事实，耿直敢言，国民党人虽十分痛恨他，但一时也无可奈何他。一方面是碍于他的名望，另一方面是怕失去华侨捐献的外汇，断送中饱侵吞的一个重要财源。

二

华侨慰劳团任务结束，陈嘉庚登报声明和辞行后，于七月三十日早晨乘飞机离重庆到昆明，打算参观西南各省，回到福建家乡探亲，然后出国。

起飞前，朱家骅奉蒋介石之命，转告陈嘉庚：“将派王泉笙陪同前往西南各省，明后天王便乘机来昆明。”陈嘉庚明白王泉笙有随行监视之意，一到昆明，便亲笔作书邮寄蒋介石，信上说：

“早间朱君告，钧座拟派王泉笙同余来西南，谅必有人对钧座献言，恐余到西南宣传共产党好话，故派王君来监督。又钧座对余盛气痛骂共产党事，亦必有人报告余在国民外交协会演说各情。余所言乃据所闻所见事实，他等已改行三民主义，凭余良心与人格，决不能指鹿为马也。至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破裂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盖自抗战以来，欣庆一致团结，枪口对外，若不幸内战发生，华侨必大失望，爱国热烈必大降减，外汇金钱亦必减缩。……余所要求者，完全为国家民族计，与共产党毫无关系。自抗战以来，余绝未与共产党交通一字，亦绝未供给一文钱，此可以对天

日而无愧者矣。昨日钧座在黄山推诚下问对国民党感想一事，至再至三，虚怀诚恳，余无任感激，但在场人多，不便贡献，兹谨将所知奉闻，以报盛意：

（一）西南运输办理不善，尽人都知，事关抗战军运重事，毋庸多赘，在新加坡曾多次函电军委会，未悉可达钧座否？

（二）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全国经济学社年会，假重庆大学礼堂开会，马寅初主席言现时国家如此严重危险，而保管外汇之人尚且时常逃走外汇，虽加获五七千万元，将留为子孙作棺材本，几于声泪俱下。

（三）西安污吏尽人都知，该市与共党接界，未免使彼等有所藉口。

以上三害希设法改善，勿使抗战与政治有不良阻碍，貽累钧座进行。他日抗战胜利后，建国亦可成功，钧座名誉为全世界有史以来所未有，虽美国华盛顿亦不能企及，万乞注意勿为人所误，至荷至幸！”^①

这种迅速而巧妙的“抗议”，终于迫使蒋介石下令取消王泉笙昆明之行。

陈嘉庚在昆明参观了西南运输处车站，了解到日本侵入越南后中国军火原料的损失和志愿回国在滇缅路服务的华侨司机的生活情况，便于八月二日前往楚雄，三日抵达下关。下关运输处主任李某大摆筵席三桌款待，其他机关亦相继邀请，陈嘉庚对此大为反感，认为在抗战困难时际，还如此挥霍浪费，太不应该。赴宴回来之后，他声明不再接受宴请，否则就要离开，同时特地交代，明日赴大理只须备办简单午饭。

四日上午，陈嘉庚一行乘车参观大理石厂，下关李主任又大

^① 引自《南侨回忆录》第191、192页。

摆三席酒宴，声称酒宴是大理绅商招待的。但一开席，李某又独坐主位，他人都坐客位。陈嘉庚甚为厌恶，另叫一份米粥，吃完即到隔房坐待，一直等了下午三时许，呼拳喊令之声仍不绝于耳，他愤怒地走到门口，叫出侯西反等中途退席，不别而行，径回下关。在参观各单位的修理厂、停车场和加油站中，陈嘉庚发现下关机关林立，人员纷杂，设备简陋，车辆损坏待修者极多。晚饭后，参加华侨司机欢迎会，到者百余人，查明去年南侨总会捐赠的毛毯、蚊帐、衣被、鞋袜多未收到，都被那些“公务员”侵吞去了。三日，乘汽车回到楚雄，原定次晨六时出发，因为车站被后到卡车数十辆阻塞，迟到八时许才能将车开出。看到这种腐败现象，陈嘉庚气愤地说：“当此军运紧张，而当局冥顽无知至此，可胜叹哉！”

六日，陈嘉庚返回昆明。在昆明逗留期间，他曾赴过云南省府主席龙云的宴会，应邀到西南联大演讲，出席昆明各界召开的欢迎会。会后，有昆明各报记者十余人来访，陈先问：谈话是否见报，公之于众？记者答：当然要在各报发表。陈说在重庆也曾对各报记者谈话，次日“报载十无二三”，说是“多被检查员裁去，若然则多言奚益”？记者表示“决与重庆不同”，随即提出（1）华侨报界，（2）华侨教育，（3）国共两党摩擦，（4）回国观感，（5）对国民党的意见等五个问题，要陈嘉庚发表意见。陈说明“惟第五项不可回答”，其余均可接受。在谈到上月在重庆国民外交协会那次演讲时，陈说：范长江短评说陈某“第一个大胆敢说公道话”，其实“余无所谓大胆”，不过“凭余亲闻亲见、据实而言”罢了。^①

八月十三日，陈嘉庚离开昆明，前往贵阳访问，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在欢迎茶会中致词，希望华侨投资开发实业，陈答称：华

^① 陈嘉庚：《答昆明记者问》，《南侨回忆录》第203页。

侨“投资祖国，必靠大众方有成效，若靠少数资本家，决不能办到”。

十七日，陈嘉庚一行离贵阳往广西，经柳州，于二十一日抵桂林，立即到省政府见省主席黄旭初。行前，有人劝他说：“此间官员对国民党印象甚深，凡不利国民党者，切注意勿言。”陈嘉庚答：“他不问，我定不言，若有问，决不能指鹿为马也。”黄旭初果然问起对延安的观感及蒋介石说过什么话，陈嘉庚一一据实回答。越日，在黄旭初主持的晚宴上，陈嘉庚又发了一通抨击贪官污吏的言论，强调“必以是非为好恶，而不以刚柔为爱憎”^①。

八月二十七日，陈嘉庚离桂林赴湖南，二十九日晚抵长沙，次日出席由省府主席薛岳主持的各界欢迎会。九月一日晚上，陈嘉庚向薛岳辞行，薛岳取出重庆发来由何应钦署名的一张长约百余字的电报抄文交给陈嘉庚，内容专言“共产党罪恶”，电末有“转达陈知”字样。薛岳并说非仅湖南收到，他省也必定有之。陈嘉庚估计电文中一定还有其他未便抄给他看的内容，如说他“受共党包围”，或“与共党他项关系”之类。他对此嗤之以鼻，连抄电也不肯带走，当夜即登船经碌口换火车往韶关。

九月二日晚，陈嘉庚来到韶关，和广东省府主席李汉魂、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等相见。六日，离韶关经大庾岭往江西赣州，专员蒋经国与各界人士数百人在郊外欢迎，接至招待所下榻，“每日来寓数次，并设宴招待”，甚为殷勤。陈被留多住一日，于八日由赣州罐头厂经理集美水产学校毕业生黄文丰陪同，乘车前往泰和，途中，黄文丰告诉陈嘉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曾接中央来电，言校主受共产党包围，多说共党好话，嘱熊主席注意，故此间政界对校主之来，多有疑惑。”当晚，熊式辉主持

^① 陈嘉庚：《刚直与谄儒》，《南侨回忆录》第214页。

欢迎宴会，在致词中攻击近十年共产党“扰乱”，致江西“人民苦惨难以形容”等等。陈嘉庚针锋相对地致答词说：“彼此在此区域作战场五六年，损失重大，势所必然。然此系前时国内政争及军阀割据地盘之事，海外华侨绝不干预。迨七七事变，敌人侵入，将吞灭我国，国家危险，尽人都知，南洋千余万华侨，无党无派，一心一德，拥护中央政府，希望国内团结一致，枪口对外，俾可转危为安，故尽棉力贡献义捐逐月六七百万元。……组织慰劳团回国，无非欲中外联络，鼓励民众，提高爱国，俾回洋宣布，增外汇以助战费，绝非游历骋怀及为一党关系而来。况余居第三者地位，不能凭一派人所言及宣传品记载，便可回报华侨。故必身履其地，将所见所闻，凭良心与人格，回洋据实报告，虽在国内有人问及，亦必如是，决不能指鹿为马。而重庆乃有一部份人不满，向蒋委员长唆弄，以余受共党包围，且发电西南等省对余注意。此事余在长沙薛主席已电示。然余素与共党绝未有一字往来，亦未曾供给一文钱。此次代表南侨回国，只身行十多省，绝无丝毫权力，与作客无殊，乃有畏余若蛇蝎者。余所希望，国内须能一致，枪口对外，华侨外汇金钱方能增加，若不幸破裂，华侨必大失望，阻碍外汇决非小可！”^①

陈嘉庚原准备第二天就走，经熊式辉托人挽留，并自愿代电中央解释，他才勉强多留几天。他在泰和参观了博物院和江西大学，还特地到吉安游览两日。

十四日，陈嘉庚一行离泰和至宁都，次日抵光泽，十八日晚到鹰潭，又乘车夜行赶到上饶。次日，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相见。二十日到玉山，向铁路职工和各社团报告南洋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情况。

九月二十一日，陈嘉庚进入浙江省境，在金华先后与第十集

^① 陈嘉庚：《熊君说共产》，《南侨回忆录》第223页。

团军总司令刘建绪和浙江省主席黄绍雄会见，参观农校和市容。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重庆知友来信，获悉国民党中央对他的行动十分注意，并采取三项对策：（一）由何应钦电知西南等省，注意陈的行动。（二）发电新加坡总领事馆，以陈“与共产党亲善”，有“共产党色彩”，向英国政府提出禁止入境。（三）派吴铁城到南洋各地活动，破坏陈在华侨中的威信和地位。

陈嘉庚一路上对第一项早已领略，深信友人所说都是事实。他认为英国政府素知他的为人，“决不致盲从”，吴铁城活动即使能收效，至多不过“南侨总会主席另举他人，与余私人也无所损，所损者义捐外汇耳。然华侨知余者众多，亦非此等官僚可能放毒”^①。他神态自若，泰然置之，按照既定路程，向福建进发。

三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三日，陈嘉庚自龙泉进入福建，抵达浦城。因为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将自永安亲到南平相候，次日便乘车经建阳、建瓯赴南平，当晚出席陈仪的招待宴会。席上问及“自抗战迄今，闽省壮丁征调若干人”？陈仪答：“二十五万余人。”又问：“死亡及逃走者若干人？”答：“不知。”陈嘉庚大为惊讶。陈嘉庚在南平参观了一处模范村，“至村内未见有何改善整顿，对卫生上完全不讲，所有者仅几条粗造小道路及一间公会所”。陈在不客气地指出之后，慨叹说：“若如此有名乏实腐化情形，只瞒骗政府，费多少金钱，糊涂了事……闽省政治前途奚堪设想！”闽南、福州等地欢迎代表相继来见，陈嘉庚从他们口中得知各地民众“受苛政惨苦，有不聊生之概”，“乃思必须亲往

^① 陈嘉庚：《党人三计策》，《南侨回忆录》第230页。

视察，方不致误，决定先经闽北，然后经闽中、闽南、闽西等处”。他还听说，福州已预备五万元欢迎费，他认为人民生活困苦，如此挥霍甚属不宜，便亲自拟稿，分寄南平、永安、福州、泉州、漳州五地登报声明：“……在此抗战艰难时期，尤当实行节约，对欢迎及宴饮无谓应酬概行辞谢，况吾闽米珠薪桂，尤所关怀，故复登报表明真诚，乞希原谅。”①

二十七日，陈嘉庚北往崇安，在离南平不远处，见路旁有尸首两具，其一全身裸露，同行宪兵说是病死壮丁，衣服被押官取去，在途中遇到相当平民，就拿去抵额，将衣服与穿，故民众多有中年人失踪者。三十日折回建阳，次晨阅《南平日报》，见所登启事，被删去“况吾闽米珠薪桂、尤所关怀”两句，这两句正是他为了广泛征求各地民生痛苦情况特意加上去的，一问原来是省府招待员陈延进、李良荣奉陈仪长途电话通知删去的。他料定一定是陈延进先用电话密告陈仪，名为招待，实是暗中监视，不禁怒火中烧，走进膳厅，声色俱厉地当面痛骂陈延进等“丧心昧良，谄媚走狗”，“利令智昏，献媚奸吏”，气得连饭都咽不下去，立即戴帽执手杖出门上车，径往邵武。一路上盛怒未消，与陈延进不交一言。到邵武后，协和大学校长、闽南训练军官等屡来邀往开会，他心中不快，一一辞谢，对当地情况也无心采访。次日即折回建阳转往建瓯、古田，结束了在闽北的旅行。在建瓯时，他计算英国禁运三个月之期将满，便亲笔写信给蒋介石说：由于滇缅路管理不善，要求派工程师两三人于十一月底在昆明相待，同往视察，如不同意，他将由香港出洋。

十月六日，陈嘉庚到福州，各报记者、集美厦大校友纷纷来告国民党苛政下的人民悲惨情况。自去年实行统制运输以来，闽北运输船只日少一日，所余不及一半，陆上设检查所十二处，私

① 引自《南侨回忆录》第233页。

人携带一二十斤大米入城，亦被查禁没收。因此，物价腾贵，大米一担售至七八十元，市民无法生活，由万寿桥投江自杀者日有所闻，仅警察捞起的死尸就有九百具左右！有一家大小五口，同由桥上跳江而死的，又有一家男女老幼七口，倾所有财物买线面饱餐后同到大桥投江自尽的。徐学禹倡办“福建贸易公司”，与商民争利，甚至送出杉木百余万条资敌。政府对报馆严加控制，不但禁止公正言论，也不准登载一般社会新闻，违者科以“扰乱治安”之罪。有一记者见义勇为，将实情详写一份交给陈嘉庚。这些血泪斑斑的事实，使陈嘉庚的心情感到万分沉重，他认为国民党害民之惨，只能用“苛政猛于虎”来形容了。

十一日，陈嘉庚离开福州，经福清、莆田前往闽南。十五日，在仙游枫亭亲眼看见军队把壮丁七八人或十余人用麻绳缚在一起，从旅馆前面走过。十六日，在惠安署内看见关押有挑夫十余人，以备军队不时使用。十七日到泉州后，各界人士纷来控诉：“各种苛政害民凄惨及贪官污吏火上添油”许多事实。他统计自闽北至闽南前后约二十县，调查所及，或闻或见，大都同样事实，决无错误，因抱定为民请命的决心，毅然亲拟函电两稿，要求陈仪取消统制运输，电文如下：

“陈主席惠鉴：

余自到延平，多处代表来告，自统制运输后，转运比前甚迟，如前三天可到，现须六十余天，致各物昂贵，且多有臭烂损失及舞弊，商人缩手观望，尤以米粮为甚。饿死、自杀、饥病，难以数计。劳苦挑贩，虽百十斤亦不自由，似此与断绝交通无异。余历十余省，虽近战区，亦未闻见有此政令。万祈火急撤销，以解数十万贫民倒悬凄惨。以上事实经余考查确实，希接纳至

幸！”①

信函除上述外，另列具体事实八条，至于其他种种苛政，信中概未提及，因为他认为统制运输，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是最无关紧要，最容易撤销，而害民也最惨酷者。如果这一项都不获准，其他便更无希望了。

陈嘉庚将函电发往永安后，离开泉州探访侨乡。自南安县城溪尾，历访浮墙、刘林、码头、诗山等乡，然后经永春往安溪探访内迁的集美学校。在永春，他根据一路上的闻见，整理成七条，再次上书陈仪，要求他“迅速下令撤销，免贫苦人民数十百万人饥饿疾病死亡之惨”。廿七日，在安溪接得陈仪复电，不下数百字，所言多不切事实。

陈嘉庚探视安溪集美学校后，便回到阔别十九年的家乡集美。厦门沦陷后，不设防的集美多次成为日军轰炸目标，校舍多被击中，弹痕累累，他的住宅则被敌军燃烧弹烧毁，仅存墙壁而已，但旧种树木却长大许多，高出楼屋之上。在故里停留一宿，便动身北上，中午在灌口赴角尾途中，登山眺望集美，苍翠树木和各校的红瓦屋顶历历在目，陈嘉庚万分感慨地对同行的侯西反说：今日“望见集美校舍，是否此生最后一次”？侯西反问他为何如此悲观，他答说：“陈仪祸闽，如不改善，或不去职，余当然攻击到底。既与他恶感，余安能归梓？设陈仪能革去，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握政权，苛政害民，上下争利，余亦不能缄口坐视，势必极力反对，如此党人亦不能容，而视为眼中钉，余何能回梓？”②

十一月八日，陈嘉庚自漳州到龙岩，次日抵长汀厦门大学。他亲眼看到内迁的厦门大学，利用旧有寺庙，坚持教学，各科毕

① <南侨回忆录>第249页。

② 陈嘉庚：<登高看故乡>，<南侨回忆录>第258页。

业生多有出路，心中十分欣慰。陈仪派统制运输主任胡时渊等三人前来欢迎他去永安，在谈到统制运输时，陈嘉庚举出所见交通阻滞，百物昂贵，人民痛苦种种事实，要求予以撤消。胡答：

“战时必须统制，不能完全取消，只可修改”。陈嘉庚义正词严地驳斥说：“战时须统制，无非防备奸商运物资敌，而非阻止自家良好之生活交通。政府借此以取财利……将三天路程延至六十天左右方能运到，将良好食物置之臭坏，致令食粮昂贵，贫民饥饿、疾病、死亡惨痛，无异帮助战时敌人之残杀。余在洋经历两次大战，绝未闻当地政府施此误民自杀之政策。又回国以来历十余省，虽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江西、浙江等战区，亦未见施行此政策，独闽省有此。且闽省非战区，而曰战时必须，将谁欺？！”^①胡等无言可答，只说当回报陈仪决定。

十日陈嘉庚离长汀至连城，次日到永安。庄明理早他两天到此，陈仪约庄谈话，查问自闽北至泉州各地统制运输情况，庄明理据实详告，但陈仪仍坚持己见，越日发表演说，声称“战争时代运输必须政府统制，此乃各国通例，唯不识政治之人，故有反对，然政府必行其任务，以顾全大局，决不轻举放弃”云云。这篇演说，由陈仪署名，全文登载在日报上。陈嘉庚看后，明白陈仪毫无悔祸之心，见面时，对以往函电所说统制运输事，一句不提，略谈几分钟便告辞而出。

十四日，陈嘉庚到大田探望内迁的集美农林、水产、商业三校师生。次日回到永安，在那里除统制运输害民外，还听说田赋比抗战前增加十倍，不禁骇然。是晚在各界举行的公宴上，他怀着忧愁的心情，提出最后的忠告：“……南洋华侨以闽粤二省人占最多数，今日要采取本省好材料，携往宣传则无有，而历经本省数十县，见人民被统制运输陷害，至饥饿、疾病、自杀、死亡

^① 陈嘉庚：《与陈仪三代表论统运之害》，《南侨回忆录》第263页。

者不可胜计，……不日回到南洋，对众闽侨将如何报告？若指鹿为马，良心上实做不到。为保守人格、据实而言，恐未免阻挠闽侨义捐，及波及外汇，……所以函电再三哀求撤消运输统制，绝非无病而好作呻吟也”。最后，他以种树胶忌恶草和白蚁，比喻建国须防贪官污吏，讥刺陈仪。这是陈嘉庚在福建期间最不客气的一次公开谈话，后来他记述道：“余因明后天将离闽境，故本晚发言较有刺激性。”①

十七日，陈嘉庚结束在福建六十余天的访问，从长汀进入江西瑞金。在将出闽境之际，他决意打开缄默，揭露陈仪祸闽罪恶。他想到因此必将引起蒋介石的不满和国民党人的嫉视，今后难以再回家乡，心中忧郁不乐，他恋恋不舍地眺望着碧绿的闽山，坚定自己的信念：为了挽救福建人民于水火之中，即使自身不得返乡，也要抗争到底，义无反顾！

四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七日晚，陈嘉庚到达赣州，专员蒋经国来见，为了托其向蒋介石转达，即将所见福建统制运输种种祸害，略一陈述，“话尚未终，则见其神志似形冷淡，不甚注意”，遂中止不说，蒋亦匆匆辞去。

次日，陈嘉庚即在赣州召集同乡开会，列举陈仪祸闽种种罪恶，商定反对办法，分三步进行：（1）以个人名义发电向蒋介石和林森要求解决；（2）出国途中，召集西南各地福建同乡开会，互相联络、扩大宣传；（3）经缅甸至马来亚途中，向闽侨披露陈仪祸闽罪恶，然后在新加坡召开南洋各地闽侨大会，合力要求。在会上，陈嘉庚慨然说：“兹既确知惨状，万万不可坐视不

① <南侨回忆录>第269页。

救，袖手旁观！”“就使完全失败，亦当尽人事以听天！”他以“正当之失败，无可羞耻”的大义，勉励同乡与陈仪斗争到底。当天，他先提出权属中央的苛政一例，致电蒋介石说：

“闽省田赋，由十月一日起实行征收实物，价比前加三倍至十八倍，平均须加八倍，全省每年原六百卅万元，现须五千左右万元，闻他省未有如此多加，闽民安得独担重负！况百物昂贵，民生惨苦，万祈电止陈主席进行。”①

二十日，陈嘉庚在泰和召集泰和、吉安两地同乡开会，商议救乡进行办法，议决各省同乡救乡活动以泰和福建同乡会为联络中心，陈嘉庚负责筹措活动经费，并先交五百元。估计蒋介石对他在赣州所发电报将搁置不理，便再发一电说：

“兹再详陈仪、徐学禹祸闽数事：统制运输管理失妥，前三天可达，现须二个月多，致百物昂贵，尤以米价为甚。福州大桥自统运以来，贫民投江自杀，捞尸可证八百余人，其他不知若干。又创贸易公司，与商民争利，政治变作营业。又借军米为名，贱买贵卖，公务员各饱私囊。省参议员有罪，应归法院办理，乃因小故捕禁王、丁二人。陈学禹一身兼十二职，助桀为虐，他在上海罪案未满，便即委用，闻所靠者为朱君家驊。闽民遭此等苛政，苦惨甚于倒悬，万乞钧座仁慈，迅速解救！”②

二十三日，陈嘉庚到达桂林，记者十余人来见，查问福建政治情况，并说他们接到泰和、吉安记者电告，“有极重要闽省新闻，被中央检查员禁载，甚为愤慨”，现已“有把握由别方面发表”，陈遂将所知情况一一详告，引起了记者们的无限同情。

① 《南侨回忆录》第281页。

② 同上书第282页。

在桂林听到新四军与中央军发生冲突的消息，陈嘉庚挂念不释，往访行营主任李济琛查询。在谈到陈仪祸闽时，李济琛说：

“陈仪有大座靠山，骄纵任意，渠所托闽人陈才往闽北视察，被陈仪用人暗杀，无可如何！”“先生幸早离闽，否则难免危险也！”

二十四日，陈嘉庚在桂林召集同乡开会，吁请广西同乡与泰和同乡会联络合作，声讨陈仪。他认为蒋介石八天来绝无回电，

“忍心偏护一人，视闽人如犬马草芥”，他明知请援无效，仍不厌其烦再发一电：

“在赣州、泰和计呈两急电，报告闽民被苛政致饥饿、疾病、自杀、死亡诸惨状，乞求援救，想均收到。

余复经数省详细查询，田赋均未增加分文，运输亦无统制，贸易归商民经营，省府绝无兼办，军米亦无分派，邻省如此，而闽民独遭不聊生之酷。余在闽五十天，历三十县，耳闻目睹、确有实据，出于万不得已，为闽民请命，绝非无病呻吟，万祈大仁大义，格外鉴纳！”^①

根据此次回国与蒋介石会见五六次的经验，陈嘉庚认定亲向重庆求情和讲理，决无效果，“所希望补救者，在用势而已”。即“国内各省同乡会及南洋各属闽侨作大规模运动，将陈仪祸闽凄惨无人道实据，通电宣传攻击不止，报纸如不肯登载，则用印刷广播。以我理直气壮，上峰虽欲袒护，然为中外舆论大势所迫，或有相当补救”。所以，他在桂林自费印刷陈仪祸闽罪恶及有关函电，沿途散发，并分寄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省同乡会，在行抵柳州、贵阳、昆明时，也发动当地同乡一致行动。

十二月四日，陈嘉庚自昆明起程视察滇缅路，行前一日，他第四次发电与蒋介石说：“南方各省，独闽民惨酷，故不能忍心坐视。至战时统制，……我国人窃以为有害无益，故不论何者，

^① 《南侨回忆录》第284页。

万祈勿轻施统制”。^①他“明知屡言无效，然爱省爱国之心不能自已。再尽最后之忠告，成败均不之计！”八日，在芒市即将离开国境的前夕，他接到了蒋介石两通复电，一云：“来电收，闽省田赋系中央意旨，闽事可电我知，切勿外扬。”又一云：“昆明来电已收”。陈嘉庚再四的恳求，得到的竟是这样的答复！他愤懑已极，怒斥蒋介石护恶讳疾，自欺欺人，亦无乃太甚！“复禁余勿言，其主意莫非陈仪握权，职居刀俎，而闽民应当任其鱼肉乎？”^②他决计不理睬蒋介石，联络海外闽侨继续抗争，不达目的不止。

十二月十二日，陈嘉庚抵达缅甸仰光。十五晚，在福建会馆详细报告陈仪、徐学禹祸闽暴政以及屡电蒋介石请求无效的经过，并托集美校友所办印刷局，将与陈仪、蒋介石、林森等人来往函电编印五百本，除航寄香港闽侨救乡大会和留数十本给仰光闽侨外，大部分带往马来亚各地散发。

十七日，陈嘉庚从仰光搭轮赴马来亚，二十日抵槟榔屿。在槟城、吉礁、玻璃市、太平、实吊远、和丰、怡保、金宝、丹絨马林、吉隆坡、峇株巴辖等埠的华侨欢迎会上，陈嘉庚详细介绍了回国观感和陈仪祸闽事实。

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陈嘉庚回到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十个月来，陈嘉庚遍历祖国西北、西南各地，慰劳抗日将士，呼吁团结抗战，宣扬中国共产党领导陕北军民英勇抗战的光辉事迹，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福建的黑暗统治。他那种见义勇为，不畏强暴的爱国爱乡精神，赢得了广大同胞的尊重和钦佩，国民党反动派的中伤和破坏，徒见其心劳力拙，更加暴露他们专横诈伪的真面目。

① 《南侨回忆录》第287页。

② 陈嘉庚：《接蒋委员长复电》，同上书第291页。

第九章 威武不屈

正当陈嘉庚风尘仆仆，奔走祖国南方诸省，为民请命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拟定的在华侨中攻击、陷害陈嘉庚的罪恶阴谋，正在变本加厉地进行。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奉重庆政府之命，正式向新加坡政府提出禁止陈嘉庚入境的要求。在遭到英国人的断然拒绝之后，国民党海外部长吴铁城便亲自出马，以“蒋委员长代表”名义，前往香港、菲律宾、荷印（印尼）、马来亚等地开展毁谤陈嘉庚分裂侨胞的活动。吴铁城原任广东省主席，一九三八年冬日军进犯广州时，竟然未战先逃以致广州迅速沦陷这一段丑史，在广大侨胞中记忆犹新，粤籍华侨尤其切齿痛恨，不少人主张“不得开会欢迎，否则粤侨决不参加”。高凌百使尽了威胁利诱的手段，好不容易收买了一个粤籍侨领出头“倡议”开会欢迎，同时又绕开筹赈会，私下发函欺骗马来亚各区侨领前来参加，才得以勉强拼凑开场。

十二月三十一日，陈嘉庚行抵麻坡，在各界午宴中，有颜某者发言攻击新加坡筹赈会对吴铁城南来没有领导各界开会欢迎，献金也缺乏成绩。陈嘉庚立即答复说：就他所知，“南侨总会成立时曾通过一条议案，凡国内官员来洋，若未先经南侨总会承认及政府公文介绍，各筹赈会不负责招待，吴君（铁城）此来

是否经过此等手续？”颜不能答。陈嘉庚又说：“新加坡筹赈会组织法及逐次成例，凡要捐款，不论大小名目，须开会通过方得进行，而此次新加坡虽有人倡议献金，曾否开会通过？”颜又不能答。当晚，陈嘉庚回到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筹赈会同入五十余人设宴款待，相见甚欢，他即席就祖国抗战和内政情况发表了谈话。

为了欢迎陈嘉庚先生回国慰劳视察胜利归来，新加坡南侨筹赈会决定一九四一年一月五日星期日，在快乐世界运动场召开万人欢迎大会。吴铁城见报眼红，即以“陈嘉庚将宣传共产，对中英均不利”为由，嗾使英籍随员出面要求新加坡政府下令禁止。新加坡政府置之不理。那一天，热望了解祖国真相的广大侨胞，争先恐后地进入会场，座无虚席，情绪高涨。陈嘉庚从这一场面中感受到华侨群众对他的支持，他慷慨激昂，如实地介绍了祖国各省特别是在延安考察的所见所闻，比在仰光各界欢迎会上所说的更为详尽。他指出：

“陕北延安为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前时延安城内亦颇繁荣，居民二万余家。抗战后，敌机累事轰炸，全城夷为废墟，现已无人居住。城郊四面多山，遂从山下或山麓间，开辟马路，穿凿土洞，以为住屋。每洞深约三四十尺，阔十多尺，高亦如之。所有政府机关以及医院学校居民，概在其中。敌机无法轰炸，故亦久不再来。民众安居乐业，衣被亦颇整洁。西安事变，蒋委员长曾允准划定陕甘区二十一县为中共治理地，仍属中央统辖，而中共即取消原有政策，奉行三民主义。边区民众产业仍属私有，三年新垦荒地三百余万亩，亦系私人产业。商人贸易自由，市肆繁盛，与其他各省县同。卫生教育各费，概由政府负担。公务人员、士兵、学生，

每年由公家发给寒暑两季衣服各两套，上下一律，绝无等差。长衣马褂，唇红蔻丹，旗袍高跟鞋，则绝迹不见。风俗质朴，生活简单，宴乐应酬更谈不上。婚姻自由，男女有别。县长民选，公务人员舞弊上五十元革职，五百元枪毙。每天除工作外，须读党义书籍一点钟，每星期个人集合露天‘上大课’一次，听取名人演讲，闻其收取党员亦颇慎重。”^①

延安的清洁廉明，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贪污腐败，恰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听众为之耳目一新，国民党在华侨中长期捏造的所谓“共产共妻”的天外奇谈，再也没有人相信了。

陈嘉庚再接再厉，于一月十日下午在中华总商会召集全坡闽侨大会，全面揭露陈仪、徐学禹等祸闽罪恶，号召闽侨一致行动起来，坚持不懈地采取各种办法，倒陈救乡。

这两次报告，首先刺痛了吴铁城。他气急败坏地抛出了一篇又一篇的“奇文”，攻击陈嘉庚“口是心非”，“拥护蒋委员长是假的”等等，同时加紧收买记者和某日报，并计划筹办一家大型日报，后由于新加坡政府不许立案而失败。

吴铁城要求当地政府准许国民党注册为正式社团，除了利用中英联合抗日和亲到新加坡活动以外，还通过驻英大使郭泰祺和英国驻重庆大使向英政府提出交涉，英政府担心这样做将会给马来亚共产党取得同样合法地位的机会，而马来亚共产党当时正在蓬勃发展，所以最后拒绝了这个要求。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重庆《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封锁，刊载了周恩来同志手书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及“向江南为国殉难者致哀”的题词。这时，不仅中国人民坚决反对重开

^① 载新加坡《南洋商报》，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

内战，许多国际公正人士和爱国侨胞，也无不希望祖国能够团结一致抗日，他们函电纷驰，严词指责国民党丧心病狂，破坏抗战。陈嘉庚的心情虽然也是急如火焚，但考虑到自己的处境，暂时没有公开表态。而吴铁城等却趁机加紧活动，指使他们操纵下的马六甲筹赈会，吁请南侨总会致电中共，“告其切须服从中央政府命令”，同时又联络森美兰筹赈会，并盗用马六甲侨领曾江水名义，一再来函纠缠。陈嘉庚援引总会组织章程中提案须有十个筹赈会同意方得成立的规定，加以驳斥，并托人请曾江水来新加坡面谈。曾江水在明白有人盗用他的名义后，立即用电话警告其婿何某“今后不论来函或登报或提案，都不得再用他的名义”。吴铁城这一卑鄙的阴谋，再一次破产了。

一月二十四日，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发出通告，订于三月二十九至三十一日在新加坡召开第二届南侨大会，选举新的领导机构，另外通知于四月一日召开南洋闽侨大会，讨论救乡办法。他明知蒋介石对他“已生恶感，无法挽回”，“然不忍坐视闽民凄惨于不救”，故不计利害，坚决斗争到底，将陈仪、徐学禹祸闽罪状汇编一册，印刷千余份分寄各地，并正式向国民参政会提出撤换陈仪的议案。

这一系列举动，普遍得到南洋广大侨胞的热情支持，但却引起了新加坡国民党人的怨恨。他们不断开会密商，函电交驰，多方活动，力图破坏。

新加坡国民党人抓住倡办南洋师范学校为突破点，对陈嘉庚发动了一连串的攻击和诬蔑。原来，陈嘉庚于电请重庆教育部在闽、粤二省开办华侨师范学校遭到拒绝之后，便于一九四二年二月间倡议创立南洋华侨师范学校，并积极筹募捐款，兴建校舍，准备秋季开学。重庆教育部竟然来电，以不许学生回国升学相威胁，抢先在报纸上公布。新加坡国民党人也乘机大放厥词，诬陷

陈嘉庚“收取华侨赈款，充作学校基金”等等，吠影吠声，层出不穷，造成了“有党与无党分裂，意见日深”的局面。陈嘉庚为了避免“南洋华侨在抗战中相互倾轧”，不予置辩。

为了破坏南侨大会和闽侨大会的召开，重庆国民党“某要人”竟不择手段，出面要求英国驻重庆大使发电新加坡总督，务于三月二十九日前将《南洋商报》主编胡愈之、南侨总会秘书李铁民等五人驱逐出境。后经新加坡政府派员调查，这五人中都没有犯出境的法律。为了阻止陈嘉庚再次当选南侨总会主席，他们又特派菲侨出身的国民党中央常委王泉笙赶到雅加达，向南侨总会副主席庄西言施加压力，遭到庄的严词拒绝。王泉笙连忙赶到新加坡与当地国民党人在总领事馆里多次开会，密商对策。

这样，随着开会日期的迫近，以陈嘉庚为首的爱国侨胞反对国民党人阴谋控制的斗争，便日趋表面化了。

二

南侨总会开会前夕，以王泉笙和高凌百为首的国民党人，极力开展倒陈的活动。陈嘉庚不愿侨胞在抗战期中自相倾轧，慨然在报上登出启事，辞任南侨总会主席。消息传开，海内外同胞十分关怀，纷纷函电挽留，日以数十封计。重庆国民党要人朱家骅也来电称：“传闻先生于国事颇露消极，凉敌伪挑拨离间之宣传，而非事实也。中央以先生为侨胞领袖，对国家社会贡献尤多，故于先生意见向极重视”，云云。陈嘉庚乃于三月二十六日复电阐明引退之举实缘别有苦衷，电文说：

“曩者国民外交协会约讲西北考察观感，庚凭良心，作实言，乃有人厚诬庚被中共包围，一再控词欺蒙蒋公，并电庚所到东、西、南各省，且复来洋布置与庚

为难，诬毁兼至。近则变本加厉，竟图利用外交，陷害无辜，冀以摇撼赈会，事虽未达，恶意仍存。侨胞效力抗战，原无党派，今则大大不同。又如滇缅路运输积弊甚深，闽省酷吏害民至惨，为自有世界历史所无，事与抗战前途有关，明知多言招尤，实奈良知难遏，蒿目艰难，痛心何限！故辞。”^①

陈嘉庚是因为不愿昧良心，说假话而表明引退之意的。这一举动，光明磊落，和国民党人的鬼蜮行径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广大侨胞的反响可见，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陈嘉庚的威望不但没有被国民党人的造谣中伤所损害，反而比以往更高了。

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上午，南侨大会如期在新加坡开幕，陈嘉庚致词后许多代表相继就出钱出力支援祖国抗战发言，而总领事高凌百却上台大骂华侨“口是心非”，“无诚意拥护中央”，“无党无派是倒行逆施”等等，引起了代表们的莫大愤慨，巨港代表白辰恭等几欲当场退席。陈嘉庚知道高凌百所骂“无疑的是针对我和大会代表说的”，只是因为他是政府外交官，故暂时容忍。不料会后高凌百又将发言稿投登各报，内容比所言更加狂悖。陈嘉庚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于第二天上午，先派人通知高凌百不必到会，继在会上发言，痛斥高凌百“狂谬乱骂，侮辱侨众，乃不知悔改，复投稿各日报毁辱尤甚，较之吴铁城更形骄暴”。他愤慨地说“今日高凌百敢如此狂谬者，无非谄媚吴铁城，奉其意旨作走狗，故敢如是。”提起吴铁城，他更加怒不可遏，便历数其弃地先逃，剥取民脂民膏，大建巨大住宅，南来后自谓“代表蒋委员长”，“到处鼓树党权，破坏华侨团结”，“护恶逞势，助桀为虐”种种罪恶。

陈嘉庚发言甫毕，王泉笙迫不及待地上台攻击陈嘉庚侮辱

^① 《南侨回忆录》第310页。

中央外交官，不许参加此会为不公，提议请高凌百前来，要代表举手表态，虽然有几个国民党员举手赞成，由于陈嘉庚据理力争和大多数代表看穿了他们的鬼蜮行径而未能得逞。

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南侨大会选举第二届正副主席，陈嘉庚虽然一再表示辞任，投票结果，仍以一百五十一票赞成，一票反对当选为第二届南侨总会主席，庄西言（印尼侨领）、杨永泰（菲律宾侨领）当选为副主席。大会就此发表的《宣言》说：

“总会陈主席嘉庚，公忠谋国，一生如一日，其在教育上贡献，古之所无，其以人民地位协助政府抗战，今日仅见！而识足以辨奸，才足以服众，德望足为群伦钦式。徒因守正不阿，刚毅质直，每当有事之时，辄召无根之谤。大会同人最近闻陈主席忽萌退志，骇异之余，深悉其苦衷，而考虑之余，又深以为不可。值以抗战期间，南洋华侨不能无筹赈总会之组织，则不能无陈主席之领导，同人深信南洋绝大多数侨胞需要陈主席，爱戴陈主席，国内绝大多数同胞，亦需要陈主席，爱戴陈主席！”

三

四月一日，南洋各地闽侨代表三百余人，齐集新加坡大世界舞厅开会，陈嘉庚担任临时主席，向大会报告回国慰劳期中亲见陈仪、徐学禹等种种祸闽暴政，以及向蒋介石请求的经过，得到了全体代表的同情与拥护。经过两天的讨论，会议通过了组织“南洋闽侨总会”，创办周刊，发表宣言致电林森、蒋介石和捐资赞助南洋华侨师范学校基金等议案，并于三日，选举陈嘉庚为总会主席、庄西言为副主席之后圆满结束。

大会发给蒋介石的电报，没有得到答复。陈嘉庚认为“彼不睬与不覆，愈表现其为政不公，怙恶不悛”，而自己为民请命，问心无愧，自非再接再厉不可。于是，他又于四月七日以个人名义再发一电，由重庆国民参政会分送林森、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白崇禧等人，电文说：

“南洋筹赈总会会员大会及南洋各属闽侨代表大会，近日均在新加坡开会……两大会议呈电中央八通，均托总领事馆代发，不悉有无达览？侨胞拥护抗战，一秉至诚，出钱出力，以无党无派为最巨，苟以党派为号召，则无异摒弃无党无派者于圈外，岂非自截手足以求强身？自吴铁城来洋，利用宣慰名义，暗植党羽，鼓煽分裂。驻星总领事高凌百更仰承鼻息，变本加厉，阴谋操纵报馆、学校、社团各机关，以遂其破坏团结毒计，吴君在星时，对记者诬毁鄙人无所不至，以念其为委座专使，恐伤尊严，隐忍不较。高君以为懦弱可欺，益肆狂悖，竟在此次赈总大会中大放厥词，斥骂无党无派者为倒行逆施，为破坏抗战。庚认吴、高等辈荒谬绝伦，无可再恕，始揭吴贪黷误国、高拥汪亲德各实据。至于陈仪、徐学禹苛政祸闽各端，经大会电请撤惩，务祈采纳！”①

由于陈嘉庚，仗义执言，据理力争，造成“中外宣斥，舆论哗然”的形势，重庆国民参政会不得不讨论陈嘉庚的提案，决定派员调查，行政院由于接到林森转交各电，也不得不派员调查，结果证明陈嘉庚所揭各条都是事实。此时正值日军再次疯狂进犯，国民党军不战先溃，福州迅速沦陷，陈仪的亲日路线彻底破产，蒋介石才下令将陈仪调离福建，由刘建绪继任福建省主席。

① 陈嘉庚：《呈林主席蒋委座等电文》，《南侨回忆录》第324页。

陈嘉庚发动的倒陈救乡运动，至是始取得了部分的成果。

四

一九四一年，正是太平洋风云紧急，战争一触即发的年头。

陈嘉庚除了集中精力同破坏华侨团结的势力作斗争之外，仍一如既往，密切注视着文化教育事业的每一个进展。

“皖南事变”以后，文化界进步人士的处境更加困难，有的不得不出国暂避。重庆记者协会主席范长江在香港主办《国际新闻社》，宣传抗日救国，写信向陈嘉庚求助，陈嘉庚立即汇去港币一万五千元。范长江继又倡办《华商报》股份有限公司，陈嘉庚慨然认股一半，即港币四万元，先汇去二万元。著名民主战士邹韬奋秘密来港，复办《大众生活》周刊，进步人士郑书祥、吴金卫创办《香港中国通讯社》，都得力于陈嘉庚的资助^①。

紧接着吴铁城南来之后，国民党进一步制定了“南洋教育党化”的方针，由所谓“侨务委员会”设立一所训练党化的学校，把经过训练的毕业生派往各侨校“指导”。陈嘉庚愤慨地说：

“华侨之办学校，系以血汗金钱捐助，且经过甚久时间，方能办得一间良好学校。国内教部对金钱人力无丝毫帮助，乃为其党化权利故，委一青年乳臭未干者来指导全校，其摧残教育为何如！”在一次演讲中，陈嘉庚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指出：

“观此三年间国民党之设施布置，处心积虑，比较欧美政党实有天渊之别。如滥招党员，不择良莠，只求其量，不求其质。知国民受教育者甚寡，他日能在社会活动者，当然非文盲之人，乃强迫学校校长教师，须加

^① 参见香港《文汇报》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二日，《陈嘉庚与文化事业》一文。

入国民党，否则开除。学生如入党者则可优待，谓之教育党化，诸公务人员亦然。致造成上下贪污，猫鼠同眠，误民弊政，无所忌惮，较之君主时代苛殃更甚！”

在陈嘉庚和各侨校师生的抵制下，当地提学司出面阻止，国民党的“南洋教育党化”阴谋一时未能得逞。

陈嘉庚倡办的南洋华侨师范学校，虽然遭到国民党教育部和新加坡国民党人的百计阻挠和破坏，但他仍百折不挠，坚持开办。在星马华侨的热烈支持下，募到捐款二十余万元，校舍建筑和图书仪器设备，粗具规模，于八月间正式上课，有学生二百三十余名，教职员二十余名。正在陈嘉庚积极筹划进一步的扩充的时刻，日寇侵略战争的火焰却日益逼近了。

第十章 避难爪哇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凌晨四点钟，陈嘉庚被“轰”！“轰”！“轰”！三声巨响惊醒了。他开始以为是打雷的声音，立即起床从卧室——怡和轩俱乐部三楼——的窗口向外瞭望，只见火花伴随巨响弥漫天空，振耳的警笛呜呜地大鸣起来。敌机轰炸新加坡，日本向英国开战了！

自从上个月日本近卫内阁辞职，东条英机上台，陈嘉庚就预料到战事难免。象征着日寇铁蹄南进、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轰炸声，在陈嘉庚心中交织着复杂的心情。日军进犯，使东南亚人民和海外华侨的生命财产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他不能不感到痛心。日军逼使英国卷入战争，实际上使中国抗日战争增加了一个同盟国。我国“抗战不孤，而最后胜利决可属我也”。为此，他又万分欣慰。

日军在马来亚登陆，凶报不断传来。十二日晚上，陈嘉庚接到孙崇瑜打来的电话，知道英国两艘主力舰“太子”号和“击退”号前夜在马来亚关丹海面被日本飞机炸沉。十三日中午，又传来吉礁和关丹失守的消息。这时，新加坡英人财政司从华侨银行取走了英公债券八百万元，并准备烧毁所有纸币，形势显得十分危急。李俊承到怡和轩劝陈嘉庚及早离开新加坡。陈嘉庚坚定地说：“时间尚早，不宜遽行！”

他没有打算马上离开，是希望在战争危急关头，为侨胞安全和反法西斯战争多贡献一份力量。

十六日，他发出《通告》阐明当前形势，“望吾侨同心协力，坚持民主国家壁垒，扑灭法西斯强盗集团，拥护当地政府，安定社会人心”，“我侨胞对祖国之赞助，尤当与救济当地战灾，同时加进，万勿稍懈！”十七日，新加坡总督汤麦斯约陈嘉庚谈话，希望他应用自己的影响，号召旅新侨胞挖防空洞。他欣然答应，马上起草启事，送登各报，请各界人士于十九日下午二点钟到总商会开会。虽然反对派报纸故意改为二十日开会，但十九日下午到会的人仍然很多。当场各社团议定雇工人数，派员调查开挖地点，印发传单通知各住户自动开掘，限七天内完成。

自从“太子”号和“击退”号被击沉后，英国慌忙把槟榔屿的英人男妇六七百人全部撤退，新加坡总督且亲到火车站迎接慰问，而许多马来人和华人却被排斥在外，不让他们使用交通工具。在这种不抵抗主义和歧视政策的影响下，槟榔屿很快就沦于日军之手。日军开入槟城时，市区一片混乱，抢劫四起，当地人民和华侨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陈嘉庚和新加坡华侨对英国这种不人道的行径，深为愤慨。新加坡总督汤麦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此后无论何处，凡有不得已时，决不效尤，必视同一体”，并下令释放政治犯，又在吉隆坡发放军械，允许民众和华侨组织抗日游击队。

二十六日上午，新加坡英公安局长和总商会长及一国民党人，突到怡和轩拜访陈嘉庚，谓总督请他出面组织“新加坡华侨总动员会”，协助抗战。事出蹊跷，而所谓“总动员会”的含义虚泛不清，不由得陈嘉庚警觉起来，坚决加以拒绝。这三人死赖纠缠了两个多钟头，喋喋不休。后来总商会长于无意中透露出，原来是蒋介石来电嘱华侨“努力与此间政府合作”。陈嘉庚回答

“既然如此，总商会即当负责领导”，他藉口霹雳州失陷，本人在该地产业尽行丧失，方寸已乱，无法顾及，把他们辞退了。

第二天，公安局长派人来见，以总督“甚形不满”相威胁。陈嘉庚表示“总动员”太广泛，必须具体讲明华侨应该办那几件事，公安局长提出三点：一、各街设义务警察，协助维持治安，防备燃烧弹、降落伞等，并清除被炸倒塌垃圾。二、组织宣传队，到各处宣传。三、代政府雇临时工人，以应各处需要，工资由政府供给。陈嘉庚答应了。

二十八日上午，新加坡总督汤麦斯召集各界要人、侨领和中西报界人士到督署开会，宣布由陈嘉庚领导华侨协助英政府抗战。开会之前，新加坡各报刊布了蒋介石来电，委托新加坡国民党党部、报馆、社团三机关领导华侨协助英政府的信息，用意显然是想把广大华侨自动组织起来抗战的功劳，统统归于“蒋委员长领导”的名下。陈嘉庚在会上发言说：

“蒋委员长何日来电，余本早阅报纸方知，其所委托系党部、报馆、社团机关。然此三机关，与余个人完全无关系。盖党部者，余非党人；报馆者，余不但无报纸势力，且本坡三家日报中，两家常以嫉忌私憾，并为党人利用，时常反对破坏，此为华政司及公安局长所知者。至社团中，本坡当以总商会为首，”那末他们为什么不出来领导呢？陈嘉庚最后表示自己的立场说：

“然今日中英已成共同战线，虽非联盟亦与联盟无殊，贵总督既欲余领导华侨，余若办得到者，当竭诚奉行耳。”^①

这一席话，无疑是给“中华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和国民党党棍们一记响亮的耳光，表达了广大侨胞决心抗日但决不接受蒋介石领导的共同心愿。

三十日，陈嘉庚在中华总商会址召集全体华侨开会，讨论协

^① 《南侨回忆录》第337页。

力抗战事宜，正式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陈嘉庚任会长。下设“保卫团”、“宣传股”和“劳工服务团”。会上，共产党人耶鲁提出“民众武装”的议案，受到与会华侨青年的热烈支持。陈嘉庚从实际出发，认为华侨长期被剥夺参加军事训练的机会，现在仓卒成军，经验毫无，伤亡必众，且恐引起日军报复，所以一再以“民众武装”不在他所承诺的三条之内为理由，力加阻止；后来为华侨青年的抗战热情所感动，认为“彼等同仇敌忾，诚属可嘉”，在只负责介绍华侨参加抗日游击队的前提下，同意设立“民众武装股”。第二天下午，陈嘉庚又在中华总商会开会，举定抗敌后援会各股负责人，决定在晋江会馆设办事处。从此，新加坡抗敌救援活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一九四二年一月，日军在东南亚各地凶猛推进，对新加坡的轰炸也日益加剧，英人纷纷撤退，军港工人出工率一天比一天减少。

二十三日，陈嘉庚亲往军港调查，同行的国民党政府“军事代表团”团长郑介民，托他致电雅加达庄西言代租洋楼一座和汽车一辆，邀陈同机避往印尼。陈辞以“时机未到，不便轻离”。他继续留在危城中，关于第二天在影剧院召集在军港工作的华侨工人，申明中英共同对日作战的意义，极力劝慰华侨工人复工。但是英国政府没有决心坚守新加坡，开始将英人和军用物资秘密地撤退。三十日上午，陈嘉庚从各种渠道获知，英兵乘夜自丹戎巴葛码头下船他去，军港物资不论贵重与否都被扔入海中，老巴刹区的十余门高射炮也撤走了。……他不禁怒火中烧，立即与“华侨抗敌后援会”总务主任叶玉堆等人向总督汤麦斯提出诘问，并要求应给华侨抗敌工作人员安全撤退的便利。汤麦斯吱吱唔唔，不肯实言，对保证华侨抗敌工作人员安全撤退一事，更加不愿负责。其时，重庆政府已通过外交机构向英国交涉，必要时设法使

“中华民国”驻新加坡领事馆官吏及所派委员安全回国，从汤麦斯口中，得知电文中对华侨领袖和民众的撤退问题竟一字不提。陈嘉庚不胜愤慨，叶玉堆义愤填胸地说：“他（指蒋介石）不认我们是中国人了！”

英国即将放弃新加坡，蒋介石把华侨当做“海外孤儿”抛弃了！不愿做日本军国主义顺民的陈嘉庚不得不走上逃往印尼避难的道路。

二

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英军炸毁柔佛通新加坡的铁桥。入晚，英军从新加坡军港发射大炮轰毁柔佛埠所有高大的建筑物。二月一日，军港内尚存十个贮油池，也被放火焚烧，浓烟弥漫中天。同一天，英政府“慷慨”发枪一千支给华侨，“武装民众”抗日。陈嘉庚认为“此等乌合之众，绝对无丝毫效力，而英兵至少尚有五七万人，何须派此绝未训练之人往前线？不但此一千人将就死地，敌人入境必因此多杀许多华侨，英政府此举，最为狡猾残忍，实可痛心！”为了“表明不赞成华侨武装助英政府”，他“乃决意离新加坡。”^①

二月二日，陈嘉庚把他负责多年的南侨筹赈总会、闽侨总会及南洋华侨师范学校、集美学校的有关事务，一一安顿妥当。第二天一大早，他与友人陈贵贱、刘玉水、陈永义乘小汽船离开新加坡。四日中午抵印尼苏门答腊岛的淡美那，当地县长以其入口手续与常例不合，须请示上级，方许再进，只好暂留以待。淡美那的华侨们热情地招待陈嘉庚一行，并派人到宁岳通知当地侨领，设法转告雅加达、棉兰、巨港各地侨胞，共同出力相助。九日早

^① 陈嘉庚：《新加坡将放弃》，《南侨回忆录》第347页。

晨陈嘉庚接县长通知放行后，即坐原船驶往宁岳。十一日由于巨港华侨的协助，陈嘉庚和刘玉水取得进入巨港的通行证，便于次日乘汽车前往。十三日抵双溪那礼的福东树胶厂。因为前程渡船拥挤，不得不退回双溪那礼等候。十四日傍晚抵达距巨港五百余公里的马老白。十五日，阴历元旦，陈嘉庚在乘车前往巨港途中，得知日军伞兵部队已进入巨港，荷兰守军万余人闻风溃逃。只好临时改变行程，于十六日中午来到占卑的直务，半夜回到双溪那礼，一路上只见荷兰官吏争相逃跑，人心惶惶，秩序大乱。

陈嘉庚在临行前，充分估计到，如回归祖国，“国民党要人决不容余立足”，出于无奈，才决定避往邻近的印尼。他想，印尼即不能守，最少可以坚持两三个月，必要时，尚可转往澳大利亚或印度。那能料到，日军侵入是如此的迅速，巨港失陷是如此的突然，从巨港前往雅加达的计划竟成了泡影！他愤恨荷兰官吏军人不战而逃，说：“世界最坏之军人及公务人员，想无如荷人之不负责人！”

然而，难道就这样陷于苏门答腊，垂手待毙吗？不！陈嘉庚决心排除万难，到爪哇去。

当陈嘉庚购置床褥等生活用品，准备在双溪那礼福东树胶厂里暂避一时之际，无意中听说巴东有船开往爪哇，经打发刘玉水打听属实，便于十九日乘汽车赶往巴东。在吴顺通的努力下，终于买到了二十二日启行的早已超员的轮船票。

二十一日夜，陈嘉庚、刘玉水由吴顺通陪同，走下拥挤不堪的轮船。第二天清晨，轮船驶离苏门答腊海岸，向爪哇进发。

三

二月二十五日晚上，轮船停靠在芝拉札海口。二十六日上

午，陈嘉庚随着蜂拥的人潮踏上了爪哇的土地。经当地华侨热情款待，当晚在中华会馆副主席李保仲店里过夜。二十七日午后，办妥入境手续，雇车前往万隆，在东华旅社住了一晚。二十八日上午，由王怀仁陪同抵达雅加达，住庄西言宅。

就在陈嘉庚来到雅加达的那天夜里，日军开始在爪哇岛登陆，海上交通断绝，形势更形危急。陈嘉庚遂于三月一日由厦大校友郭美丞伴送到数十里外芝巴容庄西言的别墅，转往芝安术郊外陈泽海的树胶园内暂避。

三月三日，日军进逼雅加达，荷军望风逃窜，市内一片混乱，当地匪徒趁机抢劫华侨财产，死伤数百人。四日，日军未遇抵抗，长驱入雅加达。五、六两天夜里，芝安术当地凶徒二十余人，图谋抢劫陈泽海树胶园。八日，庄西言在芝巴容的别墅，被洗劫一空。十日，庄西言被日本宪兵队传讯，被迫返回雅加达。

陈嘉庚怦怦不安地度过了春暮。四月初旬，传来了日军在雅加达大肆搜捕华侨和庄西言被捕的消息，陈嘉庚心情更是不安，大有度日如年之感。直等到五月十五日上午，泗水厦大校友郭应麟、廖天赐两人来接，陈嘉庚大喜过望，下午便偕刘玉水等前往芝安术，准备改乘火车往泗水，因买不到车票，在车站旁小旅舍暂住一夜。

十六日早，因泗水车站已被日军严密封锁，便改搭火车经万隆转往日惹。十七日，在日惹买好车票进站时，突遇日本宪兵正在检查旅客身份证。他们怕引起日军注意，只好硬着头皮，乘日本宪兵忙于检查之际，一涌而入，廖天赐在后虽被拦住，刚好他有身份证，遂得顺利通过。

陈嘉庚一行当日抵达梭罗，住市中心的三民旅社，厦大校友黄丹季、陈明津赶来会面。因发现有人注意他们，陈嘉庚和刘玉水立即移住附近的萍水旅馆。数日后，租到了一所空屋，随便买些

粗笨家具，搬入居住。郭应麟夫人林翠锦（集美校友）携两个幼儿及一印尼女工从泗水搬来同住。这样，男女老幼八口人，组成一个战时的大家庭，便没有破绽可寻了。

为了取得身份证，陈嘉庚化名李文雪，由林翠锦陪同前往登记，幸得顺利通过。

梭罗美丽的异国风光，在日军铁蹄的蹂躏下，凄戚而又悲伤。陈嘉庚默默地想起了遥远的祖国和长期侨居的新加坡，那里的人民和亲如骨肉的同胞。枪林弹雨下，他们颠沛流离；漆黑无光的夜晚，他们痛苦呻吟！他的心难过极了。

四、五月份的梭罗，一到中午，天气便很炎热。七月以后，更是热不可耐。为国家民族前途而焦虑万分的陈嘉庚，原已虚火上升，加上酷夏的折磨，牙痛接连爆发两次，因而不得不考虑迁居。黄丹季在玛琅经营家俱厂，很快地租到一所设备齐全的住宅。八月四日，陈嘉庚在刘玉水、黄丹季陪同下，从梭罗搭火车到玛琅，开始了新的匿居生活。

四

玛琅，东爪哇的山城。这里风景宜人，气候适宜。陈嘉庚——“家”的避难地——巴兰街四号，杂处于大街僻巷之间，后面是勃朗打斯河，两岸一片椰林。黄丹季等人事先做了妥善的安排，把陈嘉庚的户口、屋税单及其他纳税关系等都填作三、五年以前的，象是一个老居民的样子。家俱从黄丹季店内搬来，环境清静，生活顺适，陈嘉庚十分满意，觉得并不逊于新加坡，只是行动不能自由而已。

陈嘉庚来到玛琅之后，焦急地关切着战争的每一发展，日夜盼望胜利早临。当地只有日人办的一家日报叫做《共荣报》，陈

嘉庚经常从报道的蛛丝马迹中，细心研究，推测战事发展的趋势。为了安全起见，屋内不敢设收音机，但黄丹季等却不时把秘密收听到的盟国电台广播的消息转达给陈嘉庚。综合各种渠道得来的材料，陈嘉庚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他认为“澳州如能坚守，则联军不久便有反攻之日，而敌寇终必败溃矣”。

十月二十日，黄丹季从朋友那里得到日本宪兵部派人暗查“陈黄来玛”的消息。原来，玛琅侨商陈嘉祺有一个稍懂日语的店员去职后在敌宪兵部担任翻译，宪兵队长叫他调查关于陈嘉庚、黄伯权（新加坡中国银行总经理）两人匿居玛琅的事。这个汉奸曾经查问其旧店东陈嘉祺是否知情，陈嘉祺回答绝无此事，黄伯权已由芝拉扎乘船往锡兰（今斯里兰卡），玛琅那来个陈嘉庚？可能是他本人陈嘉祺，“名相如而实不相如”，谐音误传所致。

黄丹季听了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深为老人的安全担心，要想迁居，一时又难找到妥当的去处。陈嘉庚知道了以后，镇静地说：

“你们绝不可以如此。人生自古孰无死！万一不幸被捕，敌人必强我作傀儡，代他说好话，我决不从！那时一死以谢国家，有什么不得了！我这么大一把年纪，死也不算夭寿，你们千万不可为我着急。”^①

黄丹季等人深受感动，后来决定由郭应麟陪伴避居附近南梦巽勿瓦朗埠厦大校友苏浩然开设的米厂里，直到风声渐渐平息后，于十一月九日回到玛琅。

一天清晨五点钟，天还没亮，巴兰街四号前院突来一阵急如星火的敲门声，黄丹季惊醒起床，发现前后左右已被日本宪兵包围，不禁魂飞天外，只好硬着头皮打开前门，如狼似虎的日本宪

^① 黄丹季：《陈嘉庚先生玛琅避难记》，《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第43页。

兵蜂涌而进，指着黄丹季大喊：“荷兰人！荷兰人！”这时后门一人用印尼话说：“错了！不是四号屋，是二号屋”。原来他们是要逮捕隔邻的那个荷兰军医，走错了门，这一场虚惊可真不小。

为了确保陈嘉庚的安全，郭应麟、黄丹季每每劝他移往别埠。陈嘉庚不愿意，而且知道宪兵部侦查不出他在玛琅的确实消息，逐渐安下心来。

一九四三年三月，陈嘉庚兴起了写回忆录的念头。他向来认为自己对社会、国家无甚贡献，加上幼年辍学，学识肤浅，很少提笔记述。直到前年代表南侨回国慰劳考察，他的思想产生急剧转变之后，才暗暗下了决心，要把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公之于众。那时他曾交代秘书李铁民把沿途见闻观感笔录下来，等返回新加坡翻阅时，发现其中遗漏不少，因责成李秘书补充重写，被其延搁，终未成编。现在趁着终日无事，不正可以逐一回忆，把它记述下来吗？

七十年漫长而曲折的人生，可以记载的很多。陈嘉庚所选定的主题，是华侨在抗战中的努力。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主题，实际上，也只有亲自领导华侨坚持不懈地支援抗战活动的他，才最有资格写作这样的回忆录。写这部回忆录的目的，不是为了颂扬自己，而是向全国人民介绍华侨在艰苦卓绝的民族战争中所作的努力，抒发海外中华儿女热爱祖国的情操。他说：“个人经历虽不足道，然所见所闻多属确切事实，有裨社会观感，且使后人知当祖国抗战时南洋华侨之工作情况，庶不致误认为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危险期间，海外南洋千万人之华侨，尚坦然置之度外而忘其祖国也。”^①

陈嘉庚开始写作不久，便被一些意外的事故所打乱了。动笔

^① 陈嘉庚：《回忆录动笔》，《南侨回忆录》第354页。

才一个多月，五月六日晚上，郭应麟前来报告，下午日本人两次来厂，似在暗查某种嫌疑之事，他怀疑陈嘉庚的行踪已被发觉，建议离开这里暂避一时。当晚陈嘉庚移居黄丹季厂内，次早由黄丹季陪同乘车到峇株刘玉水家暂住。几天后，知道已无危险，又回到玛琅住宅。

刚刚安定下来，斜对面五号屋又迁来了日本宪兵队副队长霸占的一个台籍妇女，由于语言相通，这个台籍妇人，时时借故跑来闯门子聊天，实行“友好”，弄得林翠锦、黄丹季等人欢迎不好，不欢迎也不好。无可奈何，陈嘉庚只好独自迁到峇株和笨珍半路间的一间原属荷人的住宅里，和李荣坤一家同住。

一天早晨，陈嘉庚外出散步，黄丹季跟在后面，保持有十多步的距离。途经日军新设的一个岗哨时，陈嘉庚不肯按照日军的规定，行九十度的鞠躬礼，被冲出来的日军抓住要打，黄丹季机敏地赶上去与日军相撞，挨了一顿拳打脚踢，陈嘉庚幸得脱险而去。

又有一天，陈嘉庚正在前房躺椅上看书，忽然走进一个日本军官，指着他用印尼话大声喝问：“你是谁？你是谁？”陈嘉庚镇定坐着，不发一声。黄丹季闻声赶出，以手示耳，示意老人家是耳聋听不见，解了此围。

住到一九四四年二月初，隔邻辟为日本军官疗养所，敌人来去频繁，容易暴露，于是在二月七日移居巽勿佐村的晦时园。

晦时园，距离峇株埠约三公里，园前有公路，右接峇株，左接笨珍。园后有小山，高约二百余尺。左、右有笨珍山、峇株山，相离约六、七公里，山脉延长，如两手环抱。一公里外，有一湾流水湍湍向东南而去。屋子建筑十分讲究，全屋周围均有无柱走廊，虽淫雨时亦可散步。右畔有花园及百余尺长的藤花棚，左畔有果园和禽畜舍，宅后树木荫森，苍翠欲滴。又有三尺阔的

石路弯曲绵延于林丛之间。从晦时园眺望，一片青翠之中，间以红瓦白壁，风景绝佳。

晦时园原是荷兰人的产业，日军侵入后屋内设备大半遭到破坏，花木也无人照管。陈嘉庚以三十盾向管理机关租来，略加修饰，十分称意。从此，他一直居住在晦时园，到沦陷时期结束为止。

陈嘉庚有鸡鸣早起运动和散步的习惯，匿居以来，因为日本军警时常黎明时搜查捕人，这种习惯就成为防避敌人搜捕的一种斗争方式。散步以后，即回住处，继续写回忆录。这年四月，全书脱稿，这就是著名的《南侨回忆录》，战后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在新加坡出版。嗣后，他又在六月间完成《个人企业追记》，战后附印在《南侨回忆录》一书中。

在匿居生活中，陈嘉庚仍然十分关心战争全局的发展。他经常以敌报记载的一鳞半爪中细心探究推敲，抓住其最本质的东西进行分析判断，从而得出了盟军必胜、敌寇必败的结论。他认为日军在陆战方面占有很大优势，仅就南洋占领区而言，就可以集中二百万人以上的土著兵力，这些士兵生活水准低，耐热耐劳，熟悉当地情况，可以就地取粮，在防守上以主御客，以逸待劳。盟军方面，印度兵不可靠，中国兵能来者不多，英美兵生活水平高，不适于热带作战，虽拥有较佳装备，最多只能占领几个重要城市和交通线，即使整个南洋都已收复，而日本本土仍属安然无恙。所以要战胜日本，不能依靠陆战，而应该充分发挥盟军在海空方面的优势，在取得制海权和制空权的前提下，集中大量航空母舰、战斗舰、潜水艇，轰炸日本重要城市，断绝其对外交通，在不太长时间内，使日本本土陷于困境。这样，尽管日本在中国和南洋的陆军仍然完整无缺，亦难逃最后败亡的命运。去年六月陈嘉庚在梭罗看见《共荣报》登载美国大造航空母舰的消息。八

月间，得到美海空军在所罗门群岛大捷和登陆新几内亚的消息，知道战争的形势正在按照自己所预料那样发展，心中无限欣慰。他得出结论说：“敌人虽占领缅甸，其发展已登峰造极，不能再侵入印度一步，在太平洋方面，海空军早在珊瑚海失败两次，只能望澳洲而兴叹，其势已成强弩之末”，最后崩溃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

陈嘉庚在日常言谈中，很少说及私事，所谈的大都是爱国爱民的大道理，关切的是战事的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他生活简朴，不喝咖啡，不喝酒，也不吸烟。三餐力求简单节约，早餐除牛乳鸡蛋外，喜吃番薯粥。有时，在他左右的校友们为了使他吃得象样点，多备点好菜，他总是不高兴地说：“现在是战时，物力维艰，何苦浪费！前线抗日战士，后方受难灾民，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何忍独享美食。与其吃了不安，不如不吃。”^①以后凡是再煮什么好菜，他索性不动箸，表示无言的抗议。

陈嘉庚身处险境，泰然自若，从不畏惧，也很少忧虑。当时在他左右的校友们很为他担心，有的苦劝他不要在那危险的处境中写回忆录，深恐书稿一旦给日本警探发现，对他更加不利。陈嘉庚不以为然，写了一首诗以明志：

“胜利未达，敌寇未败，潜踪匿迹，安危未卜，余惟置死生于度外，作俚诗一首以见志。

领导南侨捐抗敌，会场鼓励必骂贼。
报章频传海内外，敌人恨我最努力。
和平傀儡甫萌芽，首予劝诫勿迷惑。
卖国求荣甘遗臭，电提参政攻叛逆。
强敌南侵星马陷，一家四散畏虏逼。
爪哇避匿已两年，潜踪难保长秘密。

^① 黄丹季：《陈嘉庚先生玛琅避难记》。

何时不幸被俘虏，抵死无颜谄事敌。
回检平生公与私，尚无罪迹污清白。
冥冥凶吉如有定，付之天命惧奚益！”^①

五

一九四五年，日本小矶内阁倒台，由年已七十九岁的海军上将铃木继任首相。陈嘉庚从敌阁的人事变动中看出了向来独揽大权的日本陆军少壮派已经失势，铃木内阁的任务不外是苟延时日，争取更有利的投降条件而已。果然，仅仅四个月零几天，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喜讯传来，陈嘉庚笑逐颜开，兴奋异常，他的心飞往侨居多年的新加坡，也飞往万里迢迢的祖国。等到交通秩序稍告恢复，他便于十月一日由黄丹季陪同，乘汽车经泗水转往雅加达。三日，出席厦大集美两校校友的欢迎会，会上有人提起希望校主领导华侨襄助祖国，陈嘉庚答称：“华侨果欲帮助建国，必当分别是非。”他准备在次日福建会馆欢迎会上详谈这个问题。

四日，雅加达华侨在福建会馆召开盛大的欢迎会，庆祝陈嘉庚安全脱险归来。会前校友郭应麟等受侨领嘱托，以当地国民党人甚多为理由，力劝陈嘉庚切勿提起国共两党之事。陈嘉庚断然拒绝说：“余不能失信，会场发言亦不能受人限制。”郭应麟回去协商未回，开会时间将到，陈嘉庚乘其他校友所备之车到了会场，见侨胞出席者极多，座位皆满。主席致词毕，陈嘉庚即席发表匿居生活结束后的第一次演说，他首先尖锐地指出：“鄙意会场中发言有三种：一、漂亮话，二、敷衍话，三、老实话。漂亮话，余平素不会说；敷衍话，难免使诸君失望；若言老实话，恐为

^① 《南侨回忆录》第357页。

一部份人不喜听。如此则将无言可说，但既不能不说，又不得不多少。”接着在说到“爱国”二字时，他说，“抗战已属过去之事”，“而建国必先认清是非，如是非不先认清，则政治上一切建设都无从谈起。”“祖国现在政治分为两大派”，“重庆、延安俨然对峙”。“重庆指延安为‘赤’，延安指重庆为‘腐’，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究竟谁是谁非呢？陈嘉庚没有明说，但却含蓄地指出：“重庆政治，可不具论，我华侨都属闽粤人，如已知闽粤两省之政治如何，则亦不难推知重庆之政治状态也。”关于延安政治，陈嘉庚则畅述他亲访延安时所见所闻，据说“是行三民主义，而非行共产政策”。由此陈得出的结论是，“若此次国共会议能真诚合作，实际推行三民主义，诚我国家无穷幸福。设或不幸分裂，最低限度，亦必有一方面能真实行三民主义者。”^①这个“能真实行三民主义者”是谁，已不待说而自明了。

陈嘉庚的讲话，立场明确，爱憎分明，处处流露出无限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情绪，博得了听众的热烈反响。

十月六日上午，陈嘉庚从雅加达搭机飞抵新加坡，正式结束了沦陷时期的流亡生活。

陈嘉庚安全脱险的消息传开，海内外爱国的中华儿女，都为他额手称庆。二十一日，新加坡五百社团联合举行欢迎会。十一月八日，在祖国的重庆市，有五百多政界、党派和社会知名人物参加了“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会堂上悬挂着许多祝词。毛泽东主席送了一件条幅，上书“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王若飞的祝辞说：“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流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冯玉祥送了一首贺诗：“陈先生，即嘉庚，对人好，谋国忠，一言一动皆大公，闻已返旧居，远道得讯喜难名。”

^① 陈嘉庚：《吧城欢送会附答词》，《南侨回忆录》第360—364页。

邵力子主持大会，他热情地称赞说：“陈先生的一生就是：兴实业，办教育，勤劳国事，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所不敢为。”黄炎培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只有陈先生。”

郭沫若代表文协站起来讲话，他说：

“陈先生是建设性的人物，另一方面还有些破坏性的人物存在着，陈先生是坚决地反对有破坏性的人物，……陈先生是诚实公正的人，能为老百姓多说几句诚实公正的话。我们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水够深，火够热，我们决不容许再使水加深，再使火加热。陈先生现在是在庆祝个人的安全，同时正在忧虑全国人民的安全呢！我以良心来庆祝他的健康，庆祝全中国人民自己免掉内战的健康！”^①

他的激昂的演说，不断被掌声所打断，他那有血有泪的呼吁，引起人们的共鸣。重庆《新闻报》报道说：“台上在呼吁，台下也发出吼声。”

伟大的抗日战争产生了象征着“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伟人，亿万中国人注视着陈嘉庚，希望他“再为民请命”！祖国的温暖，人民的呼吁，崇高的评价，无限的希望，使白发苍苍的爱国老人倍感年轻，正象他在返回新加坡途中所表白的那样，决心一如既往，认清是非，领导海外中华儿女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献身！

^① 以上大会情况，均见重庆《新闻报》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报道。

第十一章 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

盟军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给广大东南亚华侨带来了无限的喜悦，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而困难的处境。一方面，老牌的殖民主义国家，从英国、法国到荷兰、葡萄牙，正在磨刀霍霍，准备卷土重来，把罪恶的殖民统治重加给东南亚各族人民；另一方面，日益觉醒的东南亚各族人民更以空前未有的声势和规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斗争。面临着这种新形势，处在半客半主地位，只知埋头生产经商的华侨，该怎么办呢？对于这个问题，陈嘉庚认真、深入地加以考虑。他从当时华侨的实际情况和根本利益出发，认为华侨的唯一出路是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共同发展民族经济。早在1940年十月间从泗水乘火车前往雅加达途中，他遇到几位印度尼西亚独立党人奉他们领袖命令轮流随车保护，陈嘉庚对此感到万分欣慰，因为这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对华侨友好的一种表现。当安全到达新加坡后，他立即致电当时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苏加诺表示感谢，并且说：

“目前苏门答腊有若干地方，中华与印度尼西亚民族间感情尚未臻融洽”，他“已通知该地华人，务须与当地印度尼西亚人保持最密切之友好关系”，希望苏加诺“对各地印度尼西亚人亦作同

样通知，以期中华、印度尼西亚两民族间之睦谊愈益增进”^①。

然而，当时陈嘉庚考虑得最多的还是华侨自身的团结问题。长期以来，东南亚华侨都是按照方言、籍贯、或姓氏划分为福帮、广帮、湖帮、客帮、琼帮、三江帮六大帮和许许多多的同宗会。各帮都有自己的会馆和学校，各自分立，很少合作。抗战后期，由于国民党海外部长吴铁城奉蒋介石之命南来，在华侨内部挑拨离间，制造分裂，陈嘉庚感到莫大的痛心。在日军统治的三年余中，华侨社会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绝大多数华侨在日军屠刀下死的死，逃的逃，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少数人由于种种原因留下来没有走，个别也有为虎作伥，充当敌寇走狗的。对于这些情况，如果不加区别地任意“造作构陷、互相排挤”，势必将引起华侨社会内部的极大混乱和严重分裂。因此，陈嘉庚一接到日本投降之讯，就以南侨总会名义发出“通告第一号”，劝告广大侨胞务要加强团结，“亲爱互助，协力同心，俾于两三年内克复前业，效力建国，实践侨民天职！”他在通告中提出，对于许多“侨胞惨被敌寇酷刑虐杀，迫取金钻，掠夺货物”者，应该由各处侨领从速组织调查委员会，“呈请中外政府”，要求追回原物，赔偿损失，严惩凶手，“务期达到目的”。“至于沦陷期间，敌寇权威之下或迫于压力，或困于生计，不得已营业上与敌交易”，不必“吹毛求疵”，过分计较；对于极少数为虎作伥，任敌走狗，利己害人者，应该静候政府处置。这是陈嘉庚与广大侨胞恢复接触后的第一个文告，对当时华侨社会的安定团结起了一定的作用。

那时候，有人发起组织马来亚华侨总会，已经拟好简章，要求陈嘉庚出来担任领导。这是一件有利于华侨团结的好事，陈嘉

^① 陈嘉庚《电印尼主席促进中印（尼）民族友谊》，《南侨回忆录》第367页。

庚无有不赞成之理。可是，他是一个很注重实际的人，经过对实际情况反复考虑之后，又觉得困难很多，难以实现，所以“再四踌躇”，不敢答应。后来经过许多报刊上言论的敦促，已经不好继续保持缄默，因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发表《我之华侨团结观》一文，强调指出：“所谓团结，空言无补，必当有事实表现”，而要使事实上达到精诚团结，首先必须打破帮派的利益和成见。姑无论南洋各属和整个马来亚，就是就华人最为集中，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新加坡说，也是不容易做到的。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尝试的机会，他提出两条“最明显最易行”的办法：一是统一教育，二是裁并会馆和同宗会。关于前者，他建议成立星州教育会，统一办理全坡华侨教育，所有学校基金、教育经费统一使用，所有校舍统一管理。按照实际需要，在各适当地点设立师范、高初中、高小和国民学校，每学期新生按考试成绩择优录取，并多设贫苦学生的免费名额。关于后者，他建议每帮只留会馆一所，如福建会馆、广州会馆、潮州会馆、琼州会馆、客属会馆、三江会馆，其他一府一县的会馆分别合并于大会馆，同宗会一律取消，所取消的各会馆、各同宗会的产业移交教育会作为校舍，多余的可以出租，其租金即充作教育经费。他估计全坡华侨会馆和同宗会至少有七八十所，如以三分之一的房产作校舍，即可收容学生四千余人，三分之二出租，所收租金每月也有三四千元，这样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合小群为大群”。这样一个既公平合理而又切实可行的事能够办得通吗？陈嘉庚自己估计，“只就福帮而言，无论何人开口，必然碰壁”^①。果然不出所料，他的倡议发表以后，没有一个侨领赞同，而马来亚华侨总会的组织也就从此胎死腹中，没有人再提起了。

到了一九四六年下半年，随着祖国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斗

^① 陈嘉庚《我之华侨团结观》，《南侨回忆录》第377—378页。

争的加剧和内战的爆发，马来亚华侨各社团向来都是在中华总商会的主持下联合举行国庆庆祝活动的，但在一九四六年筹备庆祝期间，中华总商会少数侨领在国民党指使下，坚持在庆祝时所有人都得向反动派头子蒋介石的相片致敬，这就激起了广大侨胞的公愤，纷纷退出，另行庆祝。一九四七年九月，马来亚各地商会联合会在吉隆坡召开，他们又操纵会议，通过了一项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拥护所谓“戡乱总动员令”的议案，许多侨胞更加愤慨万分。十月初，新加坡福建会馆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按照去年办法，联合所有会员及南侨、道南、崇福、爱同等校师生、家长在爱同学校举行庆祝国庆大会。陈嘉庚在筹备会上即席发言，对华侨社会的分裂表示十分痛心。他回顾以往华侨团结的历史说：光复以来，星岛华侨国庆纪念活动多由中华总商会召集主持，因为总商会是各处华侨社团的总机关，各帮代表多有参加，实际上负有“对内对外，领导团结，联络情感”的责任，所以当时人“必公忠无私，直道而行，庶可问心无愧”。可是“自民国卅年（一九四一年）吴铁城南来，掀风作浪，分裂华侨，破坏团结，致南洋各处侨胞有党派与无党派之分，意见日深”，“祖国国共内战，影响华侨派别更甚”。接着他严厉谴责商联会通过的拥护“戡乱总动员令”的议案是“火上添油，助桀为虐”，“有意破坏团结”。因为所谓“总动员令”的目的，第一是“要大征壮丁送往战场作炮灰”，第二是“征粮征财，甚至竭泽而渔，使家破人亡”，这两件事都“关系华侨家乡子弟生命财产”，商联会主持人竟置之不顾，倡言拥护，其结果“必使华侨益趋分裂”，实可痛心。其实，“总动员令出于独裁！刀落头断，施行已有月日”，商联会的表示，完全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如果他们真正“热诚拥护”，就应该“出钱出力”，“派遣其子弟

回国赴敌”，“不宜只发一纸电文就可了事”^①，从而彻底揭穿了这些人蓄意制造分裂，破坏团结的卑鄙面目。

二

陈嘉庚热心华侨教育，数十年如一日，他所响往的华侨团结，也是以统一办理华侨教育为第一步。在一九四五年底安全回抵新加坡后不久，因为看到许多华校尚未恢复，儿童失学游荡，他深刻感到“民族文化前途可忧”，因于十二月十五日召集福建会馆执监委员会会议，决定在春节期间，借大世界游艺场举行游艺会，募捐筹款，以为兴建新校之用。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的一次职员会议上，他发言力说华侨失学儿童每年有增无减，现已接近万人，建立新校实属刻不容缓。这次募捐目标为五十万元，准备在两年内建筑平民式校舍一批，可以容纳新生一百班约四千人。接着又说，大家“同属侨胞”，办教育不应该有任何“地域意见，省籍区别”，如道南学校本届新生，福建子弟只占百分之四十，此次募捐兴学，仍应遵守这条原则。有人以为谘询局已向英国政府建议实施平民教育，不需要我们越俎代庖，这是根本不了解殖民地政府立场的看法。即令殖民地政府完全采纳此议，“亦必首先办英校”，对华校至多补助些少经费而已。最后，他引用西人谚语“金钱如肥料，散播方有用”，号召全体侨胞出钱出力，踊跃认捐^②。他本人虽然在新加坡沦陷期中损失橡胶二万余担，现仍认购名誉券一万元，以为提倡。在他的大力呼吁下，这次募款共得三十七八万元。

陈嘉庚对华侨社会，特别是华侨资本家不认识教育的重要性

^① 陈嘉庚《关于纪念国庆的纠纷》，一九四七年十月六日《南侨日报》。

^② 陈嘉庚《金钱如肥料，散播方有用》，《南侨回忆录》第376页。

深有感慨。他在一九四八年三月新加坡福建会馆的一次集会中说：在三十多年前，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十分薄弱，更没有想到要为社会服务。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把台湾割给日本，福建被斩去一臂，大家只知道清朝黑暗腐败，而不知道该怎么办，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缺乏爱国的教育。许多华侨在海外只能学到一些当奴才用的知识。辛亥革命前，新加坡只有寥寥三几所学校，每校学生不过三四百人，以后虽然逐渐有些进步，学生数增加到四五百人，但因为经费困难，很难发展。一般资本家只懂得子弟长大后为其觅职谋生，而不懂得教育关系到国家的强弱。有钱人家遇有婚丧喜庆，即大事铺张宴客，本坡每日耗于这类无意义的开销达好几万元，每月平均即几十万元，如果能抽出十分之二来办教育，那华侨教育的前途就大有希望了。

陈嘉庚对当时华校的质量也很不满意。他认为办好一所学校一定要注意三件事：第一、要有科学馆、图书馆的设备；第二、要严选教师；第三、要优待学生。关于第一点，他对许多学校“但求其量、不计其质”，图书设备“多付缺如”的现象，表示不满，担心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不适合于回国升学。关于第二点，他认为华校与英校不同，英校只重英文，功课单纯，教学较易。华校则华文艰深难学，教师负担较重。英校全年休假日子也比华校为多，所以他族学校教师每周可授课二十六小时，华校只能授课十八至二十小时，而工资待遇不能降低。关于第三点，他主张有些中等以上学校，不但学费免收，连衣食住、书籍等费也应该由政府供给，只有这样，贫寒子弟才有就学的机会^①。

关于教育方针，陈嘉庚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反对“如机械一样”的读死书。他说，学校教学，“不但教其识字而已，其他

^① 陈嘉庚《华侨中等教育之重要》（在新加坡华侨中等学校董事联席会议上演词），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九日《南侨日报》。

如知识、思想、能力、品格、实验、体育、园艺、音乐以及其他课外活动，均须注重，与正课相辅而行”^①。

关于华校毕业生的出路，陈嘉庚认为主要在于回国升学。过去祖国政治腐败，难怪毕业生很少回国，“此后新民主政府成立，与前必大不相同”，“父兄定必争先恐后，遣其子弟回国升学”，所以华校教学应该按“照国内学制”。但小学毕业生，由于年龄尚幼，尚离不开家庭的照顾，“势非暂入此地中学不可”，所以对于办好学校，“应当极力设法提高其程度，万万不可反使之退步”。有些侨领董事对中学生程度降低的现象熟视无睹，“观望卸责，致使之节减经费，裁去科学课程，增加其辛苦工作，势必更影响学生程度”，陈嘉庚称这类人为“始作俑者”，深恐新加坡、马来亚及南洋各属群相效尤，“事关华侨教育至为重大”，他们的“罪责”将“无可避免”地“为中外所不满”^②。

陈嘉庚风夜吁忧，废寝忘食，奔走呼号，为兴办华侨教育事业排除一个个的艰难障碍。在他的崇高精神的感召下，东南亚华侨闻风景从，热心教育事业渐渐成为社会风气。

三

一九四七年一月初，荷兰殖民军以对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第二次警卫”行动为名，用大炮猛烈轰击苏门答腊巨港华人区，连续五日，许多暴徒乘机大肆劫杀，华侨在混乱中死伤一千余人，房屋烧毁数百座，财产损失二千多万荷盾，这完全是荷兰殖民军蓄谋已久的有计划的反华行动。接着，他们又颁行进出口

① 陈嘉庚《华侨中等教育之重要》（在新加坡华侨中等学校董事联席会议上演词），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九日《南侨日报》。

② 陈嘉庚《华侨中等教育之重要》。

法令，封锁印度尼西亚进出口贸易，在公海上截捕华人船舶，枪杀船员，没收财货，使华人对爪哇和苏门答腊的贸易陷于停顿，损失严重。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派李光前为代表与荷兰政府交涉，毫无结果。为了替被难同胞伸冤，为货物与船只被扣留者声援，陈嘉庚于同年二月十六日在中华总商会召开全坡侨民大会，讨论对付办法。陈在发言中用很多时间声援印尼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对荷兰殖民统治。他强调指出：“此次大战乃法西斯帝国主义者与民主阵营二者之战争，故《大西洋宪章》规定：战后各殖民地应得解放，而东亚各民族应有独立自治权”，“印尼政府之独立，乃为恢复失地之光荣，适符《大西洋宪章》民族独立之规定”，是完全正义的。而过去荷兰把印尼占作殖民地，吮尽土人脂膏，养尊处优，日寇入境……拥有完整之海陆空军数十万人，实力雄厚，竟乃闻风奔逃，争先恐后”，“日寇登陆，兵不血刃，不数日间，荷兰全部文武官员屈膝投降”，“今日荷兰既怯弱无能，丧失领土，论事论理，皆无统治殖民地之资格”。况且，“荷兰人口不上五百万人，而印尼则多至六千左右余万人，与日本相差无几，较之朝鲜及安南民族各多大半，若比菲律宾及暹罗、缅甸则各多四分之三。现东南亚各民族纷纷独立”，印尼人口最多，岂可独居例外！^①

他进一步声讨荷兰殖民当局“竟敢当风狂走，重起殖民野心，鱼肉印尼，欺侮华侨，视同奴隶”，“在其势力范围内，如婆罗洲及他处，莫不极力剥削，垄断独占”，“近乃变本加厉，如巨港之惨案，完全为荷兰所造成，近月来复在海面捕船劫货、枪杀船员，并颁布法令，封锁出入口货物，竟以华侨为唯一对象。”^②

①② 陈嘉庚《在新加坡侨民大会上的演词》，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南侨日报》。

接着，他又针对荷兰所持论点，一一痛加驳斥：荷兰“硬指印尼辖内某种货物系其旧实”，难道不知道“物资附于领土，有如毛之附皮”，荷兰既然不战而放弃印尼领土，已根本失掉认回物资的资格。“况东印度自日寇入据，物资转卖民众，几番易手，现在货主多非当年承买之人”。荷兰又谓“苏岛出产之苧丝葛丝系荷人独有产业”，即令此言属实，“然自它弃守苏岛之后，已属印尼经营，所有货品新旧都有。至在爪哇之树胶及糖茶，既为各色人出产，何从分别谁家之物？”他们居然将本坡新业公司的树胶，于劫取搬送时重印其唛头（商标），冒认为荷兰之出产，与强盗又有什么区别？①

最后，陈嘉庚号召广大侨胞团结起来，象过去对付日本一样，对荷兰实行经济绝交。他算了一笔细账，“现下荷兰川走我国轮船四艘，客货每月至少可收叻币二三百万元，川走南洋之轮船十余艘，每月亦可收二三百万元，合计共为五六百万元，其他由欧美来的巨轮尚未计及”，而华侨在爪哇所有树胶约一万吨，即使被荷兰“以半价强买，每吨廉宜四百元”，合计四百万元，苧丝葛丝存货约二万粒，“每粒八十元，计值叻币一百六十万元”，“准此推算，荷兰封锁华侨之上言两项贸易，任其独占利权，亦不过可得五六百万而已”。所以“我侨若能一致对付，荷兰所得不足偿其一月之损失，不患彼不屈服也！”②

在陈嘉庚的有力号召下，与会侨胞情绪激昂，掌声雷动，一致议决对荷兰反华暴行表示强烈抗议，先由南侨总会出面交涉，如荷兰在一星期内没有作出完满答复，即对荷经济绝交，同时通电国内外请求声援。当时荷兰东印度总督樊穆克得讯大惊，连忙派了三名荷兰人代表和一名华人“顾问”到新加坡找陈嘉庚谈判，他们公开威胁陈嘉庚要“考虑荷印二百五十万华侨的利害关

①② 陈嘉庚《在新加坡侨民大会上的演说》。

系”，不要插手干预，陈当即严词驳斥说：“我真没有料到你们貌似文明，竟会讲出这样蛮不讲理的话”，并且警告他们：荷兰帝国主义终必会给印度尼西亚人民驱逐出去！

四

一九四八年三月，前马来亚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关于马来亚战役的报告书在伦敦发表了。就是这个白思华，正当一九四二年二月中旬，六万日本侵略军猛攻新加坡，许多华侨义勇队在裕廊、林厝湾、武吉智马山前线奋勇浴血抗战的时刻，竟然不耻羞耻地手举白旗亲向日本侵略军司令山下奉文屈膝投降，使八万实力完整的英军成为日军的俘虏。为了掩饰这种战败投降的劣迹，他竟然在这个报告书中夸大敌情，歪曲事实，胡说什么“亚洲人趋向较有力之方面”，“彼等协助敌人多过于协助我等”等等，把责任推在亚洲人头上。所谓亚洲人，显然也包括华侨在内，因而激起了华侨社会的莫大愤慨。为了澄清事实真相，陈嘉庚于是年三月十三日发表《致英国陆军部的备忘录》，列举七项事实，针对白思华报告书有关华侨的错误和不公平的言论痛加驳斥。这七项事实是：（1）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政府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单独不许华侨种稻，限制华侨汇款支援祖国抗战，禁止华校师生参加筹赈工作，禁止华侨抵制日货，驱逐华侨抗日爱国人士多人出境，以致种下了后来马来亚保卫战失败的恶果。（2）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嘉庚本人曾奉新加坡总督汤麦斯之命，动员华侨数千名，日夜挖掘防空壕，于一星期内完竣。（3）同时又奉令组织华侨抗敌动员会，在该会领导下，组织华侨义勇警察三千余人担任防空和维持治安；每日征募劳工二三千人，赶筑各种防御工事，工资由该会先行支付；组织宣传队，在工厂和码头

宣传援英抗日。(4)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英军撤出檳城时，英人男妇六七百人全数安全撤退，其他各族人民则因被当局拒绝提供交通工具而陷于敌手。(5)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英军炸断柔佛桥，破坏军港设备，并将城市中心高射炮撤往后方，足证当时英军已准备放弃新加坡。可是，到了第二天（二月一日），却将步枪一千支发给从未服过兵役的华侨青年，令其手执中国旗帜，开往林厝港前线作战，另外又派维持治安的华侨义勇军三百余人参加前线战斗，因此引起日军在占领新加坡后大规模集体屠戮华侨达数万人之众。(6)吉隆坡未沦陷前，华侨青年即自动组织游击队，在山林阻击日军，其后发展壮大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独力抗击日寇，坚持到最后胜利。(7)战前英政府对华侨义勇军采取种种歧视政策，足证英政府从不信任华侨。最后，陈对白思华报告书有关华侨各节表示严重抗议，要求作出“忠实之修正与道歉”，以平息华侨之愤慨。否则，华侨为保留马来亚战争之真相，亦必作一部报告书，以纠正白思华之错误①。

在陈嘉庚的严正抗议和华侨舆论的一致谴责下，白思华被迫发表一个书面谈话，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关于华侨领袖所提出的抗议……毫无疑问许多地方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推说他的报告书属于军事性质，陈嘉庚所提事实属于民政，故未包括在内。陈嘉庚看见白思华仍在饰词狡辩，很不满意，又于三月二十七日写信给英文《海峡时报》，再向白思华提出质问三点：(1)据他回忆所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旬，曾奉总督命令，每日代雇工二三千人到机场、军港和前线阵地建筑防空壕及其他工事，屡遭敌机轰炸，仍冒险工作不停。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白思华命令

① 《为“白思华报告书”内关于华人事上英国陆军部备忘录》，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三日《南侨日报》。

华侨义勇军守卫最前线，伤亡超过百分之六十。二月一日，英军以步枪一千支发给华侨青年，令其防守林厝港海岸，死伤亦过半。英军投降前，华侨即在吉隆坡组织游击队，“参加者成千成万人，后为人民抗日军，冒千辛万苦，不屈不挠，三年余如一日，至敌败降后始止”。以上这些事实难道不都是属于军事范围吗？为什么白思华在报告书中竟然一字不提，加以抹煞呢？（2）白思华报告书说：“亚洲人站在强有力方面”，“彼等帮助敌人更多于帮助我等”云云，请问亚洲人究在何处助敌？人数多少？属何种族？有何事实根据？白思华应明白说出，不能含混其词。

（3）日军攻占新加坡时，华侨青年和义勇军在头两天战斗中就伤亡近千，英军投降后又有万人左右惨遭日军集体屠杀。如白思华认为这种牺牲还不算大，则请宣布英军在战斗中和当被俘虏后伤亡和被杀的人数，以供比较^①。此信在《海峡时报》发表后，就没有再见到白思华有何答复，无非是理屈词穷，只好以不答置之罢了。

^① 陈嘉庚《致“海峡时报”函——向白思华质问三点》，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报载于《南侨日报》。

第十二章 迎接祖国解放

千百年来，广大侨胞胼手胝足，流血流汗，辛苦劳动，为东南亚各地土地资源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却始终摆脱不了“海外孤儿”的命运，除了经常受到种种无理的排斥、歧视与凌侮以外，不时还会飞来大规模洗劫、屠杀的横祸。在呼天无路、吁地无门之际，他们是多么迫切地期望分裂而贫弱的祖国有一天能够统一、强大起来啊！当孙中山先生筹建兴中会的时候，许多华侨志士慷慨解囊，踊跃参加，在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斗争中尽了一份力量，因而博得了“革命之母”之称。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祖国面临着灭亡的时刻，无数侨胞发起抵制敌货于先，又人人出钱出力，无条件支持祖国抗战，直至最后胜利。他们丝毫无所求于祖国，唯一的希望是祖国能够统一、强大起来，且不说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和生存权利，仅仅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在海外抬起头来，也就心满意足的了。

陈嘉庚也是抱着这样的心理来积极支援祖国抗战的。他在雅加达一次集会中说：“我海外侨胞对国内任何派别，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唯有极望国内政府实践三民主义。……我国政治如能办好，华侨心理中之愉快，比之霎时获利数十万元当更狂喜。”^①根据他粗略的估计，抗战前五年即东南亚未被日军占领前，华侨汇款和义

^① 陈嘉庚《吧城欢送会附答词》，《南侨回忆录》“战后补辑”第364页。

捐总数共有国币五十余亿元，这比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报告的一九三九年全部军费支出十八余亿元多出三倍，单单这一项就足以证明华侨对祖国抗战支援之大。现在抗战算是胜利了，而祖国政局的前途又是怎么样呢？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首先是祖国能不能统一。统一是富强康乐的大前提，没有统一，所有政治进步、经济建设、教育发达以至社会风气的改良都将无从谈起。全国几亿人民，海外千数百万侨胞，无一人不热烈希望祖国统一，陈嘉庚自然也不例外。可是凭着他几年前与国内各方面的直接接触中所形成的看法，又觉得统一前途不容乐观。在他看来，国内有两股政治力量；一股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民主力量，又一股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反动独裁力量，两种力量互相摩擦对立，正如古语所说的“薰莸不同器，水火不相容”，怎样能够糅合在一起呢？一九四五年十月，从重庆传来了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的喜讯，许多人都为祖国统一在望而兴奋万分，只有陈嘉庚一人采取保留态度，他发表感想说：“若真得到民主和平，那比赚什么大钱都高兴，因为这是全国人民的大福气。不过看起来，蒋介石没有诚意。”当时香港《华商报》请他为“双十协定”题词，他就题了“还政于民，谋皮于虎，蜀道崎岖，忧心如擣”四句话，《华商报》编者嫌“谋皮于虎”四个字太刺激，把它改为“仍待健斗”，陈嘉庚看到后很不高兴，认为与他的原意颇有出入。^①

针对当时一部份人的盲目乐观情绪，陈嘉庚还特意撰写了《民主主流血不易得》一文，大意说：“如果以为抗战胜利以后，免再流血，专靠文字宣传，口舌运动，或者美国包藏祸心的资力援助，民主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中华民族就可以永享和平和幸福，试问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吗？若果免再流血，而中共可低

^① 《陈嘉庚先生的生平事迹》，《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第82页。

首下心，以就和平，我敢断言，民主政治决无从实现，自由幸福更决难幸致，八年抗战的牺牲也终于没有代价。因为这样的和平，等于民国元年的让位给袁世凯，更加促成他的专制罢了。若望国民党贪官污吏放下屠刀，还政于民，正无异与虎谋皮！”^①

以后事情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陈嘉庚的预断。有人问他，为什么能有这样的眼光？他回答说：“余无所谓眼光，只有明辨真伪与是非，君子与小子而已！”如果进一步问他，为什么独他能够“明辨真伪与是非，君子与小人”？他又是怎样做到“明辨真伪与是非君子与小人”的？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自己必先忠诚公正”，也就是说：自己必先站在为国为民、公正无私的立场上，而这一点陈嘉庚的确是说到做到了。抗战前夜，他所以那样热情地拥护蒋介石，在两广事变中坚决支持南京政府，在“献机祝寿”中比原规划超额完成十三倍，在西安事变中发电责备张学良，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因为在他心目中蒋介石是国家民族的唯一领袖，支援蒋介石就是支援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至于他所目击的新加坡国民党人的许多卑鄙齷齪行为，他所听到的祖国政治社会种种腐败混乱的传闻，包括抗战初期华侨回国机工受到不良待遇等等，他都认为大概都是下面工作人员不好，与“最高领袖”无关。等到他一九四〇年回到抗战后方，亲自接触到祖国官吏贪污、特务横行、民不聊生的实际情况，陈嘉庚感到万分的愤怒与痛心，但还没有想到与蒋介石个人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在他到达重庆后不久，蒋介石就设宴招待，态度十分客气，在宴请全体参政员时，特意让他坐在首席，在黄山别墅饯别宴上因避敌机空袭而步行上山时，蒋还把自己所携手杖强让与他。这些行动出于一向对部属动辄责骂交加，以暴戾著称的蒋介石身上，不能说是一种破格的“优遇”。所以，在私情上说，正如陈嘉庚自己所

^① 《陈嘉庚先生的生平事迹》，《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第82页。

说的，蒋介石的“深情厚意，终身不忘”。可是，就公的方面说，就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的问题说，陈嘉庚在回国期间对蒋的几次接触中，又深深感到自己与蒋的确存在有许多互相对立，不可调和的地方。其中最大也是最尖锐的一个分歧，就在于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上。陈嘉庚是一个大资本家，三民主义的信徒，他对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从不理解到同情，从同情到支持，从支持到真诚拥护，绝不因为他信仰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从多年爱国斗争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共产党是我国唯一真正救国救民的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相反，蒋介石则始终把共产党看作最大的敌人，必欲消灭之而后快。在“九一八”事变中，他可以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坐视东北四省迅速沦亡而略无顾惜，但对主张抗日的共产党却集中兵力进行了五次的“大围剿”。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被迫于略作抵抗之后，即转而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把装备最好的嫡系部队部署在陕甘宁边境，监视抗日有功的八路军，同时又发动突然袭击，消灭奉命渡江作战的新四军。在陈与蒋两次私人谈话中，每谈到共产党问题时，蒋即破口大骂，有时甚至脸红耳赤，声色俱厉，陈由此看透了蒋介石处心积虑，“谋消灭共产党，实较消灭日寇更为迫切”。如果共产党真的被消灭了，整个国家就会落在这批贪污成性、穷凶极恶的法西斯匪徒手里，中国还能有希望吗？

其次，在如何对待外国侵略问题上，陈嘉庚与蒋介石之间也存在有根本性的分歧。日本决心灭亡中国，并且已经侵占了大半个中国，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陈嘉庚虽远居海外，也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既首倡抵制日货于先，又发动侨胞出钱出力，支援祖国抗战于后。而身为“最高领袖”、手握军政全权的蒋介石，在抗战爆发以前，始终坚持一条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

方针，在抗战爆发以后，又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手段，自己躲在峨嵋山上观战，同时也不让别人抗战。战后的美国包藏着支配中国的祸心，蒋介石为了借助外力来消灭中共，竟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商约和航空条约，“将全国国防秘密、交通主权、工商优惠、经济命脉，拱手奉送外人”，“甚至允许美国驻军”，“使中国成为菲律宾第二”。在投靠外国这一点上，陈嘉庚把蒋介石与袁世凯作了一个比较说：

“袁氏所承认之二十一条从未实现，而蒋氏手中所断送之领土主权不可以数计，所借外债数额尤十百倍于袁氏”，“蒋氏认贼作父、卖国固权”的罪恶，“较诸石敬瑭、秦桧、吴三桂、汪精卫，犹有过之！”^①

又次，在改革旧中国问题上，陈嘉庚对蒋介石也不抱任何希望。陈嘉庚幼年在家乡受过封建思想的教育，十七岁到达殖民地后开始接触到近代资本主义的文明，相比之下，痛感旧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处处落后，非改革不足以图存。他一生致力于普及教育，提倡卫生，改善居住条件，以及破除迷信、赌博、送礼、吃喝等不良习惯，数十年如一日，不愧为一位杰出的身体力行的社会革新家。而自蒋介石以下这一批国民党军政要人，则是“盘据要津，朋比为奸”，“非贪污即无能，贪污必致乱政，无能惟有尸位”，“昏庸老朽，头脑顽固，断不足与言改革”。这是陈嘉庚在回国期中通过实际接触和深入调查而得出的结论。尽管陈嘉庚的观察仅仅停留在表面现象上，未能抓住他们反动的阶级本质进行剖析，但这批人在位一日，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便没有改革进步的希望，则是完全可以断定的。

最后，就个人道德修养方面说，陈嘉庚在《评蒋鼎文之谈话》一文中说：“我自己所能者仅为诚、信、公、忠四字……蒋

^① 陈嘉庚《新岁献辞》，一九四八年元旦，《陈嘉庚言论集》第13—18页。

委员长与我绝对相反，我知之最深。”^①就陈嘉庚一生所言所行、立身处世看，应该承认，诚、信、公、忠四个字，他的确是做到了的。而蒋介石为人狡猾诈伪、流氓成性，妄想以一手掩尽天下目，不可谓诚；出尔反尔，反脸无情，任意撕毁双十协定，不可谓信；宠用四大家族，结党营私，铲除异己，实行蒋氏一姓的封建法西斯独裁，不可谓公；出卖国家领土主权，勾引外力，豢养特务，残杀爱国人民，不可谓忠。以这样一个不诚、不信、不公、不忠之人长期担任国家最高领导，政治怎能有修明之一日，人民又有何幸福之可言呢？

基于如上的认识，陈嘉庚才逐渐由真诚拥护蒋介石转变为坚决彻底地要打倒蒋介石。在他看来，蒋介石是一个穷凶极恶、祸国殃民的专制暴君，甘心媚外，认贼作父的卖国贼，是中国祸乱的总根源。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这一伙近代史上最凶恶最顽固的反动势力如不彻底清除，国家民族便永远没有得救的希望。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他根本不相信国共和平谈判能够成功，毋宁说他早就期待着谈判破裂倒反可能取得更好的后果，因为至少可以避免重蹈一九一一年孙中山把总统让给袁世凯那样的覆辙。

二

一九四六年七月，消息传来，祖国的全面内战爆发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撕毁了墨汁未干的“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于六月底出动兵力二百七十七万人，分向鄂东、豫南、晋南、苏北、晋西南、胶东、冀东、察南、热河、辽南各解放区全线进攻，战火烧遍了华北各地。这是一场“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②。没有美国的经济援助和武装

^① 陈嘉庚《评蒋鼎文之谈话》，一九四七年二月《南侨日报》。

^② 《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1380页。

干涉，民穷财尽、内外交困的国民党反动派是没有足够的实力和胆量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战争的。那时有许多自称为“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光知道反对蒋介石独裁，而不知道反对美国武装干涉，对美国存有这样那样的幻想。陈嘉庚只眼独具，很快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认为美国的干涉是中国内战发生和扩大的根源，因于九月十一日以“南侨筹赈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长，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和大使司徒雷登，劝告美国立即撤退驻华军队，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电文首先揭露蒋介石的暴政说：“蒋政府执政二十年，腐败专断，狡诈无信，远君子而亲小人。其所任用官吏、如孔宋内戚等……贪污营私，声名狼藉，以致民生痛苦、法纪荡然，为中外所咸知，贵国亦瞭若指掌”。接着谈到他所看到的延安解放区的景象：“本人曾经亲访延安中共辖地，民主政治已见实施，与国民党辖区有天渊之别。且中共获民众拥护、根深蒂固，不但国民党军队不能加以剿灭，即任何外来金钱武器压迫，亦不能使其软化。”最后指责并警告美国：现在贵国“竟多方援助贪污独裁之蒋政府，以助长中国内战，长此以往，中国将视美国为日本第二”，希望贵国“顾国际信誉、以日本为前车之鉴……迅速改变对华政策，撤回驻华海陆空军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蒋政府”^①云云。这一封义正词严的电报，经过路透社和合众社的电讯传播到世界各地后，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巨大震动，给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国好战分子的嚣张气焰以一记狠狠的打击。次日，接见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说：“若谓余之通电系同情中共与反对政府，实系歪曲之论，非余本意。余通电内容可分数点：（1）从前日寇以金钱物质诱助中国军阀

^① 陈嘉庚《致华盛顿美国总统杜鲁门、美国国会参众两议院院长、南京马歇尔特使、司徒雷登大使电》，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路透社、合众社电讯稿。

内战，终告失败。（2）蒋委员长执政二十年中，贪官污吏害民至惨，此为目所共睹，余在通电中提及数人，此数人是好人是坏人，请各自批评。（3）时至今日，美国实不应再有海陆空军驻在我国，盖我国非殖民地，非菲律宾也。（4）余亲自到过延安，深信延安非实行共产主义，而系实行三民主义与民主，且今已根深蒂固，所占地盘甚大，游击队亦不可胜数，绝对不易消灭。双方惟有和平妥协，否则不知要打到何时，是否要打到亡国为止，故余在电文中强调和平解决。（5）余于电文中最后吁请美国切不可再以军火物质助长中国内战。美国今日所为，已与过去日本帝国主义无异，故余电文称，如美国立即停止助长我国内战，则上帝将庇佑彼国也。”^①

经过半年多的战斗，国民党军在有生力量大量受到歼灭的打击下，不得不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后方财政经济危机也由于美货倾销和官僚资本的掠夺而日趋严重。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纸币发行量从一九四五年底的二亿元一跃而为一九四七年春的十四亿元，一九四七年七月的物价比十年前的抗战前夕增长六万倍，报纸宣传国民党政府向美国借款五亿至十亿美元，以渡此危局。陈嘉庚认为这种做法“非画饼充饥之骗局，即缘木求鱼之妄想”。他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发表的《美借款与我国纸币》一文中指出：“过去所谓美国借款，绝大部分都是二次大战中剩下的军火和军事用品，如飞机、大炮、战车、枪弹之类，加上接收日军所有，在太平洋诸岛上堆积如山，供给我国内战消耗几年也用不完；另一部分是剩余日用物质如罐头、饼干、糖精、泻盐、剃刀、肥皂等等，充斥亚洲各地市场，虽跌价也乏人承受。对于美国来说，拿“这些剩余无用之物，慷慨任我国赊欠”，“借此废

^① 陈嘉庚《要求美军退出祖国是职责所在——答中央社记者问》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

物利用，既可握我主权，又可助长我国之内战，一举两得，世界咸知”。至于“借贷现金，乃人民之脂膏，原非政府所有；”我国“政治腐败，贪污如毛”，内战尚在进行，“美国人黄金虽多，欲令填此无底壑，谈何容易？”即使能借来些许，“专供军政之维持，亦不过几个月时间而已”。国民党反动派“欲望美国若干万万元之现金，救此病入膏肓、濒于崩溃之纸币”，“真无异缘木求鱼”，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时候陈嘉庚接到集美董事会来信，谓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拟用工赈办法，补助修复被日机炸毁的小学校舍，陈嘉庚复信断然拒绝说：“国家不幸，遭抗战之损失，战事告终后，不能奋志自立，反而依靠外国救济，政府如是，社会如是，华侨机工复员亦如是，甚至教育机关亦如是，其可耻、可悲、可羞、可痛为何如耶！”^①

一九四七年七月以后，国内战争形势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开始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大军强渡黄河，越过陇海路，开辟了大别山根据地；陈赓率领的太岳兵团从晋南渡河，解放了豫西和豫陕边界地区；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解放军转战各地，迅速恢复和发展了苏鲁豫皖解放区。国民党军望风披靡，节节败退，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不久又由全面防御改为重点防御。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布立特、魏德曼、周以德之流，看到国民党败局已成，于气急败坏之余，纷纷呼号叫嚣，要求美国政府发表声明，扩大对蒋军事援助，甚至提出派麦克约瑟进驻南京，直接指挥作战的建议。陈嘉庚痛斥这批帝国主义分子“狼子野心，较诸曩昔之日寇及希特勒，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论美国救蒋必败》一文中指出：“弄枪者毙于枪，玩火者毙于火”，美国大量军事援蒋，既

^① 陈嘉庚《辞谢行总协修集美校舍》，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南侨日报》。

不能“挽救蒋政权之崩溃”，也达不到“贯彻美国侵略之目的”。他举出七点理由以论证美国救蒋必败：第一、“过去两年，美以大量军火及贷款援蒋，益之以美国顾问参预戎机，美国军官编练军队，结果完全失败，反令中共获得若干师之美式装备与美国器械。军火及物资援助无济于事，业已甚明”。第二、“布立特等主张派海陆军由麦卡瑟元帅统率，以实行救蒋侵华，此等于美国对华不宣而战。然中国为大陆国，惟陆军作战方能决定最后胜负。日寇陆军以强悍耐苦著称，然中共以数万之众，尚能坚守至八年之久，美军陆军虽设备较佳，而其质量则远不逮日本，目前中共实力已超过抗战时十百倍，则美国欲求制胜，其可得乎？”第三、“美国所恃以征服世界者，惟原子弹而已，原子弹炸力虽大，亦不能炸半县之面积。我国土地有三千余县之广，纵令美国日夜赶造原子弹，竭一年之力，亦只能炸灭廿余县，欲炸平全中国，则需时百年而后可”。第四、“中共解放区与蒋管区犬牙相接，无法划分。如以原子弹助蒋作战，则势必使蒋区军民亦遭牺牲，试问蒋所统辖之军队民众能忍受乎？”第五、“今日内战胜负决于乡村，而不在乎城市。民众为自身自由幸福计，决不惧任何牺牲及威胁。忆抗战初期，我国缺乏空军，致全国城市任敌自由轰炸，然因民众始终不屈，最后日寇国土遭受盟军狂炸，卒至败降。今如欲恃武器以征服中国，其最后结果亦如是也。”第六、“美如派兵助战，将使中国内战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然英法意等强国未必甘心追随美国之后，如美国一旦发动大战，各国民众势必群起反抗，即美国大部分劳工亦未必甘心为资本家充炮灰。而况此次战争，师出无名，与上次之为反法西斯战争，意义尤大不同。”第七，“军事救蒋既无效果，以贷款救蒋自更属无济于事。即令蒋政府获得数亿美元贷款，如填老鼠洞，如打吗啡针，最多不过使蒋政府苟延数小时之残喘，而欲挽救既定之局

势，则断不可得也。”结论是：“美国以任何方法救蒋终必惨败”，马歇尔、布立特、周以德之流“呼号叫嚣，其愚诚不可及矣”^①。

到了一九四八年春季，国民党军事形势每况愈下，岌岌可危，美空军将领陈纳德向美国国会提出应立即以军事援蒋，否则整个亚洲都会为中国共产党所统治。针对这种谬论，陈嘉庚在《从未来大战形势论美国不敢以军事援蒋》一文中严正地加以驳斥说：“中国决不若日美之野心勃勃，诈伪奸险，损人利己，助桀为虐。中国一旦民主胜利，断不欲统治亚洲其他民族。”至于美帝国主义对军事援蒋为什么至今“犹复聚讼纷纭，迟疑不决”？陈嘉庚在同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将不免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世界大战一旦来临，美国绝无胜利把握，甚至等于自掘坟墓”^②。那时候，在许多进步民主人士中间，甚至在革命队伍中间，都有不少一部分人为帝国主义的其势汹汹所吓倒，有的害怕美国手中有原子弹，有的害怕美国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而陈嘉庚却尖锐地指出：美国不敢大量出兵进攻中国，原子弹并不可怕，美国并没有力量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也只能加速它自己的灭亡。陈嘉庚单凭从报刊上得来的知识，对世界形势的演变以及帝国主义的纸老虎本质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比起那些对帝国主义存有很大幻想的中间路线论者，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了。

三

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

^① 陈嘉庚《论美国救蒋必败》，《陈嘉庚言论集》第9—12页。

^② 陈嘉庚《从未来大战形势论美国不敢以军事援蒋》，《陈嘉庚言论集》第22—25页。

显著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由战争初期的一百二十万人增加到二百八十多万人，国民党军则由四百三十万人减少到三百六十五万人，其中能调到第一线作战的只有一百七十余万人。人民解放军的装备由于缴获大量美式武器而大大加强，战斗力迅速提高。解放区面积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战争形势完全象陈嘉庚两年来所预料的那样，不断向有利于人民方面发展。陈嘉庚以满怀喜悦的心情，密切注视着时局的迅速变化，并不断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希望。他在一九四八年《新岁献辞》中欢呼说：“今岁为民国纪元三十七年，实为我国历史上巨大变革之年，或亦竟为中华民族大革命胜利成功之年！”“今者国内局势几已大定，东北华北人民已获解放，华中华南到处民变纷起，中共解放军大举南下，所向披靡。独裁终必灭亡，民主终必胜利，已不待蓍蔡而后知”。“我国地大、物博、民众，内外恶势力铲除以后，复兴建国，突飞猛进，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贫为富，指顾间事。民国三十七年其或由黑暗进入光明之转变年，亦为我中华民族大革命胜利成功之年乎！回首故国，企予望之！”^①那时候，有些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主张调停国共战争，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陈嘉庚斥之为“不啻痴人之说梦”，认为“值兹时局剧变，胜利在望，自应集全民之力量，毕革命之武功，以为一劳永逸之计，至若姑息养奸，养痍貽患，民主革命功亏一篑，则再历三十六年，恐亦无宁息之日”^②。这是他在总结辛亥革命因与袁世凯妥协而失败所得出的结论。

伪国大闭幕后不久，国民党军事政治形势每况愈下，岌岌可危，蒋介石突然表示不愿做大总统，一时中外人士推测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蒋是半推半就，故意作态，有的说是以退为进，也有的说总统并无实权，所以宁愿退就行政院长。陈嘉庚独一针

^{①②} 陈嘉庚《新岁献辞》，一九四八年元旦。

见血地指出，蒋介石“所以表示不做总统者无他，军事崩溃，人心离散，败局已成，无可挽救，美既不能派兵助战，而第三次世界大战更属遥遥无期，故蒋氏为自身打算，总统高位不敢自居，亦不能自居”。蒋氏也象民国初年袁世凯自行取消帝制一样，在到处碰壁，走投无路之际，“计惟有牺牲总统之职位，以作日后之退步也”^①。有一次蒋介石在伪国民参政会发表演说谓，他在那几年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容忍共产党”。陈嘉庚又针锋相对地进行驳斥说：“蒋介石处心积虑，谋消灭共产党，实较消灭日寇更为迫切。在抗战之前，抗战初期、中期、以至抗战之后，蒋氏固无时无刻不作消灭共产党之想。然中共不但未见消灭，转且日益强大，以造成今日之局势，此非蒋氏不欲消灭中共，实则其力断不能消灭中共也。其所谓容忍中共，非出不得已，即属虚伪诈骗，则所谓错误更从何而来？”^②那时候，蒋政府和国民党人无论在文字上或口头上，开口闭口“每指中共为匪，共军为匪军，共党为匪党，内战为剿匪”，陈嘉庚特意写一篇《辨匪论》加以驳斥说：“匪字解释为寇盗，强暴抢劫谓之寇，偷窃假冒谓之盗，此乃人类中最卑鄙凶恶，无人格如同禽兽者”。而就他自己在延安多日的所见所闻，自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至所有中共干部，“生活均简单朴素，与乡村平民无殊”，“公务员生活费，由政府定例供给，绝对不能别营私业，故无奢侈浪费，更无积蓄财产之可言。”与此相反，“南京政府自民国十七年起，年年发出大量公债券，及实行币制改革，严令没收全国银圆为国币，更源源印发纸币，由是四大家族之财富日渐增进”。“抗战

① 陈嘉庚《蒋介石表示不要做总统》，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七日，《陈嘉庚言论集》第26—28页。

② 陈嘉庚《蒋介石的最大错误》，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陈嘉庚言论集》第29—32页。

事起，巨宦军阀财源更广进”，“而十余年间，除浪费及国内资产外，复寄存美国黄金若干万万元。此种巨富，若非剥削民脂民膏，则系盗窃国库，否则从何而来！？”“此外，特务遍布全国，国民党机关人员贪污勒索，陷害无辜，草菅人命，罄竹难书！”

“去年李宗仁、孙科争选副总统，每人开支运动费数十万万元。八月十九日实行所谓改革币制，蒋经国对四大家族及权威文武官吏不敢过问，对诸商家及人民则威胁百端，几于竭泽而渔”。最后结论说：“以上各情，均为中共所无，独为蒋政府所有，乃反指中共为匪，国民党人若稍具天良，抚心自问，必能明白谁方是匪也！”^①

对于解放战争全局，陈嘉庚更是时刻注视着它的发展变化，及时作出精辟的论断。一九四八年五月四日，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各界代表大会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声明否认蒋介石为中国总统。七月十四日，他在《中国内战何日告终》一文中指出：自内战爆发二十三个月以来，“国军由三百七十余万人减至二百一十余万人，损失达一百六十万人，平均每月损失七万人，而共军由三十余万人增至二百六十余万人，计增加二百三十万人，即每月增加十万人。如今后国共两方军队之增减，亦依照此种速度，则再过一年，国军当减少八十余万人，而共军可能再增一百二十万人，其时，力量将更悬殊矣。”同时，他又着重指出：过去共军“不愿轻作阵地战，而常相机进行运动战与游击战”；近来“不但可作普通阵地战，且可对若干大城市实行攻坚之战。尤可注意者，为共军在若干战场上均操有主动权。如此，则今后逐月消灭之蒋军，可能较以前更多。”^②同年八月九日，在《再论中国内战前途》中说：

① 陈嘉庚《辨匪论》，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陈嘉庚言论集》第43—45页。

② 陈嘉庚《中国内战何日告终》，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七日，《陈嘉庚言论集》第33—35页。

“欲知国共将来谁胜谁败，在政治方面，须视民众之向背，在军事方面，当视有生力量之消长”。“国共两方在政治上之设施，已历十有余年，谁好谁坏，毋待详论”，“至军事实力之消长，内战两年，国军由四百余万人减至二百一十余万人，共军由一百三十万人增至三百余万人，今后两方有生力量，如照以前之速率消长，则内战胜败决定之时期，可以想见矣”。因此，他认为“新华社社论谓内战结束，至少须再经过三四年，系指全国完全解放统一而言”。至于“腹地大局胜利”应该要快得多，“只要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解放，不论蒋政府逃到什么地方，他们的大局便是已经失败”，“对国际上无可再代表国家之资格矣”^①。十月十日，在新加坡福建会馆演讲《历史经验证明蒋政府必倒》，在列举近代沙皇、威廉第二、墨索里尼、希特勒以至日本帝国主义，迷信武力，不顾信义，终致败亡等历史事实之后说：“蒋介石执政二十年，背民主而独裁，断送国权，纵容贪官污吏，违诺反信，屈指难数……但知利己独裁，不顾民族惨祸，其罪恶比较上言诸人，有过而无不及。天道至公，安能免于败亡！”同时谴责美国，“假仁假义，名为调解国共纠纷，实际则帮助蒋政府对付中共”，“助长我国内战，迄今未已”，“其计划之失败”是“绝对无可挽回”^②的。

胜利在望，万姓腾欢，海外华侨对于未来的新政府究竟抱有什么样的希望呢？早在一九四八年初，陈嘉庚在新加坡福建会馆就职典礼致词中还只是粗略地谈到，“如果有了好政府”就会“派来好领事，这好领事就再也不象现在这种敷衍从事的领事了。到那时，好领事就会自动的设立指导促进华侨教育的机关”，

^① 陈嘉庚《再论中国内战前途》，一九四八年八月九日，《陈嘉庚言论集》第36—40页。

^② 陈嘉庚《历史经验证明蒋政府必倒》（在新加坡福建会馆庆祝双十节大会上的演词），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陈嘉庚言论集》第55—58页。

也会“规定合理之婚丧礼仪，节省无谓浪费，以办有利事业”，这是就海外华侨社会说的。在国内，“到了祖国好政府成立以后，在福建广东等地方，当多设立师范学校及中等学校，收容华侨学生”，“同时，必能对华侨回国，予以适当保障”，表示了希望祖国政府能够促进华侨教育和保障华侨投资的愿望。到了一九四九年初解放战争已在全国获得基本胜利之后，陈嘉庚在福建会馆常年大会的一次讲话中就比较具体地提出了关于兴利除弊的十二点意见，在除弊方面，他认为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有六大弊政：（1）“多年来严征实物、壮丁、金钱”的“三征残酷”；（2）“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3）“各县市官吏、党部与特务间，争权夺利，无恶不作”；（4）“贪官污吏互相袒护，吸剥人民膏脂”；（5）“花天酒地，奢侈淫逸”；（6）“钳制舆论，封闭报馆杂志，残害文化界青年”。以上六种苛酷凶恶，祸害至为剧烈，新政府必能加以改革。此种改革，既免费用金钱，亦毋须技术人才，时间可极短促，三四月就可拯人民于水火之中。在兴利方面，他主张（1）“普及教育”；（2）“注重卫生”；（3）“土地改革及振兴农林水利”；（4）“整设水陆交通”；（5）“振兴轻重诸工业”；（6）“开发矿产与海利”。“以上六项重要事业，需要巨大资金、技术人才及相当时间”，但若积极实行，由小而大，由近而远，五年十年之后，当略有可观，再加二三十年，无难与欧美先进国家并驾齐驱。我国地大物博人众，土地改革后，“合众人之力，团结一致，无寡而得均，生产进步，诚无限量，或可居世界之第一位也”^①，对新中国前途充满着无限的信心。至于华侨投资祖国生产事业问题，他认为“私人资本家能备数十万元至百万元以上来

^① 陈嘉庚《新中国必能兴利除弊》（在新加坡福建会馆常年大会上的演说），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七日《南侨日报》。

往经营者”为数极少；“创立股份有限公司，若素乏信用，亦非易事”；最好能“由政府负责组织股份有限公司”，向华侨募股，“担保每年有若干本息”并“不至蚀本”，用这种方法鼓励华侨投资，“比较公债券更为有利。”^①

国民党军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就歼以后，败局已无可挽回，于是在美国授意下，蒋介石假装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出面谈判和平，陈嘉庚特致电李宗仁说：“老河口厚待，感激难忘，面示蒋介石作事甚偏，偏则无是非，损人格。先生竟与同流，良可惋惜。国共谁方胜败，尽人皆知。四大家族可逃美国，先生等将逃何处乎？一误安可再误？请速接受中共条件，公私交利，否则遗臭千古，后悔无及矣！”^②同时又致电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为闽民请命，电文说：“近闻先生征丁征粮，更形严厉，助纣为虐，等于自杀，请以陈仪为鉴，造惠桑梓，亦可为自家善后计。”^③美联社记者马斯特逊平素对中国人民所受痛苦颇表同情，有一天到怡和轩俱乐部访问陈嘉庚，提出了几个有关中国政局前途的问题，陈一一作了明确的答复。马氏问：“中共获得胜利以后，是否有办法将中国目前之残局改善？如果会，需要多久的时间？”陈答：“这在我看来并不难，相信中共在胜利之后，最多不过一年余，就可将中国局面改善”，“中国资源丰富，人力充沛，在中共胜利以后，中国在经济上必不成问题，只要地方治安良好，交通恢复，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衣食住问题能得妥善解决，中国即能步上复兴之道。”问：“中共可在几个月内肃清国民党残余？”答：“除散布在台湾以及新疆、西康、西

① 陈嘉庚《新中国必能兴利除弊》（在新加坡福建会馆常年大会上的演词），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七日《南侨日报》。

② 陈嘉庚《致李宗仁电》，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日，《陈嘉庚言论集》第114—115页。

③ 陈嘉庚《致朱绍良电》，一九四九年三月九日，《陈嘉庚言论集》第114页。

藏等边僻地区之部分外，散在其他地方之大部分反动武力，相信可在今年内肃清。”问：“陈先生在抗战期间，曾经协助蒋介石，后来为什么反对他？”答：“因为在我回国的时候，看到了中国政治真象”，“蒋介石政府乃无希望之政府，盖蒋介石乃一不顾信义，经常不遵守诺言者，即余个人亦曾数次受其骗”。问：“中共控制中国以后，中国是否将继续与英美及欧亚各国通商？”答：“如果欧亚各国都能以平等原则对待中国，则我们当然欢迎他们跟中国通商。”问：“有许多人说，中共受莫斯科指挥，先生以为然乎？”答：“这是国民党反动派那一班人所说的，可是，我到延安时，既未见到有苏联帮助中共的证据，至今亦未尝见有苏联帮忙中共之现象。”问：“现在中共方面充满热烈之反美情绪，将来这种情绪是否将继续存在？”答：“如果美国的对华政策改变，这种情绪当不致继续。因为我们充分了解，坚持目前美国对华方针的，是美国的执政者，并不是美国人民的意见，中国人民会对美国人民加以原谅。”①

① 陈嘉庚《与美国记者马斯特逊的谈话》，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南侨日报》。

第十三章 参加开国盛典与畅游南北

—

在人民解放战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声中，陈嘉庚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接得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来电，约其北上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他立即复电说：“革命大功将告完成，曷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对于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则表示“于政治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冒名尸位，殊非素志”^①，微露婉辞之意。五月五日，陈嘉庚偕庄明理、张殊明乘“加太基”号邮船离开新加坡回国，行前将《南侨日报》和侨团工作交托王源兴，嘱咐说：“凡事只要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依归，个人成败应在所不计。”并指示《南侨日报》：“本报宁可关门，不能改变一贯立场。”同月二十八日，由香港乘“振盛”号轮北上。他自述此行目的有三：第一、东北是祖国工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国民党接管后，所有工厂设备多被“盗窃废弃，不事生产，已历三年，败走时又多破坏”，到底情况如何，关系祖国经济恢复前途，必须亲往一看。第二，中外报纸常有中共只能治农村、不能治城市的论调，他尽管不相信，但一想祖国领土辽阔，“除旧布新”，需要大量良好的干部，“求其尽宜，颇不易易，急欲加以考察”。第三，近二十年来新加坡公共卫生大有进步，死亡率不断下降，我国同胞素来不讲卫生，死亡

^① 陈嘉庚《复毛主席电》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南侨日报》。

率一定很高，他准备将《住屋与卫生》一书摘成三千字左右的短文，在国内各报广告栏刊登，以广宣传。

六月三日，陈嘉庚一行到达大沽口。三日上午到达天津，他上岸时看见检查人员工作很认真，态度却很和蔼，连一根烟一杯茶都不肯接受，工人装卸货物，小心搬动，很少发生碰坏或被窃的行为，这些都与国民党时代大不相同，心中感到很大的欣慰。

四日，乘专车到达北京，到站迎接者有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沈钧儒等人。七日由周恩来陪同，前往西山见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也在座，谈论中外局势，半夜始归。十一日，朱德总司令约请午饭。十三日，出席北京市各界欢迎会，会议由叶剑英主持，陈嘉庚在会上报告日军侵入至败退期中的南洋各地情况。十三日晚，出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他发言说：“由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斗，全中国大部份土地已得到解放，海外华侨无不同声欢庆。……中国共产党虚怀若谷，广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来共商建国大计，因此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实在无限钦佩。这次祖国大革命的胜利，对全世界极有影响，对海外华侨也有很大影响。不久全国解放，民主政府成立，华侨在海外地位也可提高，对祖国的愿望快实现了，海外华侨听到新政协筹备会成立的消息，一定非常高兴。本人相信联合政府成立之后，海外华侨绝大多数都会拥护民主联合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①

在北京的几天游览中，陈嘉庚感想很多。他认为北京商业虽很发达，但大部份都是供封建官僚消费用的，今后应该“在人民政府的改造下，有计划地稳步地由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许多宫殿亭阁园坛寺庙以及著名历史古迹等封建时代帝王赏玩的地

^① 陈嘉庚《在人民政协筹备会议上致词》，《新中国观感集》第2—3页。

方，也都是“用民脂民膏筑成的，现在由人民自己接收过来了，今后也将由人民自己使用它”。除了几条干路外，马路都很狭窄，横街小巷几乎不能通行汽车，现在北京已定为人民政府的首都，相信若干年后，能够“变成一个现代化人民的大首都”。

六月下旬，响往已久的东北之游开始了。六月二十二日，陈嘉庚由庄明理陪同乘火车离开北京，途经天津、山海关，于廿六日上午八时到达沈阳，在这里参观游览了一星期。在参观中国医科大学时，对该校采用新的教学方法，除在课室内由教师授课外，还在课室外组织三人的钻研小组和十二人的学习小组，由学生自己互相启发提高，陈嘉庚认为这会“自动的提高他们的互助精神，克服自私的偏向”，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在参观沈阳监狱时，看到监狱建筑很好，地方清洁，空气充足，犯人吃的伙食和管狱员、警察完全一样，个个体格健壮，精神饱满，看不出是身在囹圄的人，感到十分满意。特别是组织犯人识字、学文化，参加各种生产和文体活动，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积极改造自己，不少人因而提早出狱，陈嘉庚对此印象极深。有一天中午，看见二十余个犯人在外面种田收工后提着锄头回狱，没有任何警察在旁监视，尤其惊奇不已。七月三日，参观煤都抚顺，看见一天可产一万多吨的龙凤井，由于国民党政府光知道取煤而完全不管井内的准备工作，以致许多地方崩塌、涨水，还需要几个月才能恢复原来产量。五月，参观本溪湖的广园厂，原来规模很大，设备也都是新式的，可是国民党时代把许多“可以移动的东西盗取饱私”，现在极力修复，一九五〇年才能开工。本溪湖老厂日本投降时还在生产，国民党接收时将厂封闭，炼半成的铁就凝结在炉内，三年多不见开工，解放后大力抢修，已先修好一个炉，陈嘉庚等到达时恰好看到这个炉试炉出铁，“觉得非常兴奋，深幸来得其时”。

七月九日，乘火车到达哈尔滨，参观东北烈士纪念馆。馆址是过去日本的特务机关，也是国民党监禁政治犯的秘密监狱，成千上万烈士的鲜血就洒在那块土地上。陈嘉庚看到东北抗日游击战士的武装全身像，看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杨靖宇烈士和许多烈士的遗像、遗物，“感到无限的悲切，万分的感动”，留下题词说：“为保卫和平而抗战，精神不死；为打倒独裁而牺牲，千古流芳！”

七月十三日，到达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十四日，访问松花江边的一个农村——新江村。经过土地改革以后，村里的人们“都有自己的耕地，而且所收获的都是自己的，不象以前惨受官僚和地主的剥削”，“人民已经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了”。

十五日下午，到达内蒙古自治区所在地呼和浩特。十六日游览成吉思汗庙。在短短几天中，看到过去大民族欺负小民族的现象已经消灭，汉蒙两族人民之间出现了团结互助的良好气氛，陈嘉庚非常高兴。

十七日下午，到达长春，这是过去伪满的帝都，日本于大战末期曾计划迁都于此，城市规划的规模很大。可是，经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劫收以及围城期中的抢、偷、拆、卖，所有木料都已一无所存。东北电影制片厂的设备，在国内算是最完全的，尽管也遭到劫收和破坏，但解放后已经很快恢复，并摄制了好几部影片。东北大学学生有三千三百多人，分为三个学院，文理并重，学生在假期内都要下乡下厂劳动，教农民读书识字，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廿二日到达吉林，参观几家工厂，造纸厂的规模很大，亚麻厂生产麻布质料很好，也很美观。小丰满的发电能力达七十多万瓩。陈嘉庚由安东渡鸭绿江到达朝鲜的新义州，参观历史博物馆，馆中陈列有很多中国古代名人书画。朝鲜人民在摆脱日本帝

国主义的统治后，仅仅用三年多的时间，已经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

八月一日到达辽阳，参观钢都鞍山。新建马路很宽阔，林荫夹道，建有不少高楼大厦，过去只有日本人才有权利居住，现在日本人走了，共产党来了，工人们一向住破漏屋子的也能住入楼房了。

三日晚到达大连。马路宽阔清洁，行人很少，原来，全市三十多万人口，没有一个失业，大家都忙于工作，只在早午晚上下班时间里，电车和候车站才挤满了人，这“使人们钦服和兴奋”。大连的扫盲工作做得很成功，经过解放后几年的教育改造，“现在乞丐、娼妓、舞娘、赌徒、扒手、小偷，差不多都没有了，街边也没有小贩，没有擦皮鞋的小孩子”。“大连已经做到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有屋住、有衣穿、有书读了”。

大连有许多大工厂，如造船厂、机修厂、玻璃厂等。在日本占领时期，中国人“只有一辈子当工人”，稍为重要的技术部门都不准走近，现在厂中很多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员都是从工人中培养、评选出来的。大连码头的机械化设备，过去也是日本人管理，现在已经由中国人自己管理了。

七日，乘汽车到达旅顺，街道清洁，秩序井然，没有闲散游民和小贩。旅大地区所以能保持这样完整，并有许多新的建设，是因为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没有进入劫收的机会。“这是旅大最大的幸运。”把旅大的完整和其他经过劫收后的城市相比较，“那是一个很强烈的对照，更容易看出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穷凶极恶的面目”。

二

在东北地区进行了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和深入考察之后，陈

嘉庚于八月三十日下午精神焕发、信心百倍地回到了北京。想不到就在离开的几十天中，北京市的面貌已经起了明显的变化。大前门外的嘈杂的摊贩都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天安门广场上堆积如山的垃圾也清除得干干净净，“成了一个可供三十万人集会的平坦的人民大广场”。整个北京充满着生气勃勃的兴旺气象。

从九月一日到十七日，陈嘉庚全力投入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作为华侨小组的召集人，他每天从上午八时起就要开会，有时直开到一二时，第二天早上还要继续开。二十一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了，出席代表六百三十人，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庄严地宣告：“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全场情绪激昂，掌声持续好几分钟，陈嘉庚深为感动，第一次体会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在大会发言中，陈嘉庚以华侨首席代表的名义致词，热烈拥护大会通过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法”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他强调指出，通过这三个议案的实行，我国将会做到：第一，由于在人民政协中，海外华侨有充分的代表权和发言权，“这使到我们华侨在祖国政治中的地位空前提高了”；第二，由于依据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一定能够使新中国政府成为代表与保护华侨和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府”；第三，由于提出便利侨汇，强调民族平等和团结，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完整和“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等政策，“一定会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因而也大大改善华侨在海外的地位”；所以他代表海外华侨民主人士以及爱国侨胞，对于这三个草案“愿无保留予以接受”，并“努力促其实现”^①。

^① 陈嘉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华侨首席代表致词》，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新中国观感集》第4—5页。

在京及会议期间，陈嘉庚与傅作义将军常有接触。有一次看见傅将军在大会上慷慨陈辞，自言过去拥护蒋介石，罪列战犯，及北京受围，始猛省前非，今后应该加强服务以补过。陈听后深为感动，因发表感想说：“古语云：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傅先生坦直认过，义勇高风，无任敬佩！人民政府维新方始，似万里长征第一步，前国民党人误入迷途者尚多，当学习傅先生之智勇，庶有无限前途也！”

九月三十日，陈嘉庚被选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嘉庚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在这开国盛典中，整个北京城沉醉在胜利的狂欢中。陈嘉庚从天安门城楼上向下眺望，只见大广场的墙壁是红色的，游行队伍所执的国旗和星灯也都是红色的，人山人海，红艳艳的是一望无边的红海洋。他发表感想说：中国人民喜爱红色，“结婚寿庆要穿红衣、贴红联、结红彩，过新年要给红包，生孩儿吃红蛋”，今天“欣逢几千年来空前的大喜事”，“自然要把人民的首都变成一个红艳艳的红色首都了”。

二日，陈嘉庚在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说，大意说：“本世纪以来，帝国主义者利用科学上种种杀人的武器，如各种大炮，战车，战舰、飞机、炸弹。发动世界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垄断资本家又想发战争财，野心愈炽，竟欲奴役全世界人民，独占全世界之物资。在中国，美帝国主义者以军火金钱援助蒋介石，发动内战，致使我国人命财产损失惨重，为历来所未有。他们还在扶助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可是，现在全世界人民已经觉悟了，不要再为帝国主义的利润而牺牲了。我相信只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美帝

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一定会被粉碎的。”^①

十月三十日，离北京乘津浦线火车南下，当晚十一时半到达济南。次日，游览市区及名胜。看见一个名为广智院的博物馆，除了陈列文物书画和动物标本以外，还有许多卫生、住屋、造林、水利种种实物和好坏的对照，如旧街道与现代化马路，卫生的衣食住与不卫生的衣食住的对照等，都用模型表现出来。陈嘉庚认为这种教育意义很大，希望各地能多成立这样的博物馆。对济南华兴造纸厂虽然原料缺乏，成本较高，但在新政府发展民族工业限制洋纸进口政策的保护下，仍有发展前途。陈回忆起过去蒋政府“对本国民族工业不但未予保护，反而加以破坏，让帝国主义实行经济侵略”，仍觉愤愤不平。

十一月二日下午到达徐州。从抗战到解放，这个城市“在炮火下度过了十余年，处处可以看到战争的痕迹”。四日清晨到达河南省会开封，街道虽不宽阔，却很整齐。据吴芝圃主席介绍，河南土匪已肃清，强盗小偷亦近于消灭，现在商人旅客可以自由带款携货在各地行走，不怕抢劫，乡村夜不闭户。陈嘉庚听后颇为欣慰，认为这是“解放区的好现象”。

七日上午，乘吉普车沿黄河南岸前进，饱览黄河景色。中午经过花园口，陈嘉庚想起这就是抗战初国民党军决河的地方，“当时因此受难的达十八县，死亡及无家可归者百余万人”，不禁心有余痛。下午到达郑州，晚九时改乘京汉线火车南下，因为修路关系，在路上耽搁了四天。十二日上午才到达汉口，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星期，参观武汉三镇和大冶的华中钢铁公司。该公司本来是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日本投降后还留有铁砂三十万吨，国民党政府曾计划建设一个日产三十吨的炼铁炉，可是经过三年多

^① 陈嘉庚《在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致词》，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第124页。

的时间还没有建成，现在已由人民政府积极建设完成，不久就可以开炉出铁了。

在汉口期间，得悉国民党飞机连日滥炸厦门集美学校，死伤数十人，陈嘉庚万分愤慨，特发表书面谈话加以谴责。

十九日晚乘粤汉线火车继续南下，二十日清晨到达长沙，这是陈嘉庚一九四〇年回国慰劳时旧游之地，当时是到处残瓦颓垣，一片荒凉的悲惨景象，今天却是朝气蓬勃，有无限美好的前途。陈嘉庚感慨万千地说：“虽然地方是旧的，人物也有些是旧的，但是它的精神却是新的！”

在工商界座谈会上，陈嘉庚听了许多真实的意见。有一位经营运输行的工商业者在陈述过去备受反动政府种种摧残，解放后得到人民政府多方面帮助之后说：“我得了这样的帮助，等于在死亡线上被救出来，因此我们喊出拥护共产党，喊出毛主席万岁，这都不是口号，而是百分百的从心内呼喊出来的。”其他如火柴厂、织布厂的经理和商店的东家也都“异口同声的赞扬人民政府的保护工商业政策”。陈嘉庚认为“他们都是由心坎里露出感谢解放军、感谢毛主席的真情”。

二十二日，乘吉普车离长沙，沿着湘赣公路东行，于二十三日中午到达南昌。南昌是江西的省会，全省政治经济中心，在蒋政府统治末期，由于苛捐杂税和败兵抢掠，“商店关门者十之七八”，现在由于人民政府的协助，商业已恢复旧观，秩序也很良好。

二十四日夜半乘浙赣线火车离南昌，于次日（廿五日）到达上饶，因为沿途尚有土匪，迟到二十八日下午才乘第三野战军特备的中型吉普车向福建前进，有一连武装随行保护。在二十九日进入福建境后，所见公路两旁“茶园已尽荒芜”，由此可以想见国民党军“抽壮丁、强征粮和苛捐杂税”所造成的恶果，陈嘉庚

为此不胜感慨。

十二月三日，陈嘉庚由南平乘省政府特备的汽船到达福州。福州是八月十七日解放的，我军伤亡极少，但却消灭了蒋军四五万人，在军事上是一个很大的胜利。由于各路蒋军东奔西逃，最后都汇集在福建，加上地方惯匪、恶霸、特务、流氓乘机流窜捣乱，所以本省还有剿匪的任务，估计在一年内可以完全肃清。

十九日晚乘汽车到达涵江，二十日下午到达莆田，出席县人民代表会议的欢迎晚会。二十一日傍晚，在暮色苍茫中到达泉州，当晚便有许多客人前来探望，陈嘉庚对他们说：“封建的、腐败的旧中国已经永远倒下去，新中国已经站起来，而且日渐茁壮长大了。祖国的前途真是光明灿烂。政府工作人员都是抱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埋头苦干，全国人民拥护政府，协助政府，努力把新中国建设起来！”又说：“解放有相当时间的地方，一般情况都很好，人民的坏习惯大都戒掉，逐渐养成了节俭勤劳的新风气。已经过土改的农民们都在精耕细作，收获比往常增加了好几倍，未经过土改的，也在普遍推行减租减息。工商业也朝着一个方向蓬勃发展起来。我们福建是新解放区，当局正在致力剿清土匪和减租减息两大工作，可以说还在巩固和恢复的阶段中。”在逗留泉州七天中，陈嘉庚对闽南侨眷的生活十分关切，不厌其详地殷殷询问他们的情况。

二十七日晚，陈嘉庚平安回到老家集美。第二天清早，便身披大衣，手提手杖到集美学校去看被日机、蒋机轰炸的情况，发现集美学校许多教室宿舍倒的倒，毁的毁，没有一所是完整的，集美社受到破坏的程度也差不多。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消极悲观，他在学校欢迎会中说：那是最后一次的轰炸，从今以后，我们可以努力加强建设，我们应该为集美的新生而欢呼！接着，陈嘉庚便定出了重建集美学村的计划：第一步是清理灾区，修筑道

路，救济灾民；第二步是建筑新村。一待台湾解放，除原有各校应该次第恢复外，还打算增办华侨师范和工矿学校。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由集美乘汽船到达厦门，对欢迎者即席发表谈话说：“南洋侨胞愿参加祖国建设大业”，“新中国需要的不是消费建设，而是生产建设。”在厦门大学师生员工欢迎大会中，陈嘉庚描述未来厦大的远景说：“福建将来建筑铁路，北接浙赣线，西通粤汉线，成功之后，厦门工商业发达起来，那时候，厦大的范围也可以扩大，东边到胡里山，北边到南普陀，靠市区的一边到厦港深澳村，能够容纳学生三四万人。”

二十四日离厦到漳州。二十七日到龙岩，参观冬瓜形煤矿。龙岩煤产丰富，可惜运不出去，陈嘉庚希望人民政府能够建筑闽赣、闽粤两条铁路解决福建对外交通问题。三十日到长汀，二月一日到赣州，四日到曲江。六日换乘火车到广州，在那里停留五天，参观黄花岗烈士墓、南方大学、广东造纸厂和佛山市。广州是我国四大城市之一，但马路弯曲狭窄，与厦门相似，听说是因为孙科任市长时挪用路款，以私害公所致。横跨珠江两岸的海珠大桥，也被国民党撤退时炸毁，市民于搭渡时莫不怨声载道。

在这次全国性的旅行中，陈嘉庚看到了祖国新生的风貌，看到了祖国光明的未来，他的心和祖国贴得更紧了。

三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一日，陈嘉庚最后一次出国，由广州乘广九路火车至香港，换乘轮船于十五日到新加坡。那时候，华侨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对“一边倒”政策和《共同纲领》中没有规定要保护商人怀有疑惧心理。针对这种思想情况，陈嘉庚在对《南侨日报》记者的谈话中着重指出：“所谓一边倒，是倒在和平、民

主、进步、建设的这一方面，并不就是倒在苏联身上。”《共同纲领》中所说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已经把正当商业资本家包括在内。《共同纲领》第三十七条规定“保护一切合法的公私贸易”，只要不是大垄断资本家，不阻碍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都会得到合理保护的。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进一步阐明说：“共维世界和平，即须与苏联亲善，同走一条路之谓。乃有人误会，或立意歪曲，散布谣言，谓系要作苏联附庸，真是无中生有，绝无丝毫根据。以我国土地之大，人民之众，民气之烈，若有良好政府领导，定可与列强并驾。就毛主席而言，文武才干，英明智慧，不但为我国历史所未有，亦为世界各地所仅见。将来新中国建设成功，其光荣芬芳，前古后今殆无出其右，为公为私，安肯自屈卑下，附庸于人！此理之绝无者也。”

三月四日，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各社团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演讲《回国观感》，就自己亲眼看到的新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人民生活方面，作了一次很详细很动人的报告，指出新中国前途无限光明。大意说：“军事对外对内已胜利，尽人皆知。我经东北、华北、华中到处查知军纪甚好，不打人，不骂人，不取人财物。及到华南，则亲闻亲见，借人民屋宅同住多月，虽家乏男子，未闻发生不正当事故，到处口碑载道。”又说：“到处与军政要人接触，咸都诚恳虚怀、勤奋俭朴，遵守政府纪律。诸领袖俭素之风，前后不易”。“现下除华南外，其他诸省治安甚好，盗匪罕闻，河南全省夜免闭户。前者各省多有陋俗，赌徒、娼妓、乞丐到处多有，现多已被感化，参加生产。各地集会结社，去恶向善，人民有严密组织，现东北老解放区识字已将普及，而新解放区亦正向此条走”。“至于粮食问题，去年秋季东北、华北、华东、华中水灾严重，政府极力调整救济，毛主席下令各灾区县长负责，不得使饿死一人，故化险为夷平安渡过。

交冬以来，风调雨顺，杂粮可以丰收。加以土地改革，农民自耕其田，勤奋培养，成绩优异。且江河流淌，铁路公路，东西南北，水陆畅通，运输便利，人民政府又在相当市镇设立贸易局，预防商人操纵，以资调剂市场。”在谈到东北情况时，陈嘉庚兴奋地说：“东北粮产丰富，轻重工业设备有很好基础”。“当日日本失败时，大体未有破坏，国民党败走时亦多未遭破坏，其破坏者，多系国民党接收后，三年余不继续经营，失于保管，加以主管人盗窃，故多不完整。解放后人民政府积极修葺，至去年大约可恢复十之二三。此后恢复定可较快”。“东北现出产大量钢铁原料，一两年之后，除东北扩大添建外，每年至少可剩原料与机器十之七八，运入关内各省建设重轻工厂”。他最后结束说：

“我此次回国游历，对东北印象最深，看到中国远大前途亦最愉快，认为抗战八年所流之血，其最大代价即在收复东北也。”^①

同日，在怡和轩俱乐部接见华盛顿州世界事务协会主席汤姆生，在谈话中，对这个顽固分子的许多荒谬论点，进行驳斥，质问他：“美国为什么要帮助蒋贼飞机残杀我们中国人民，封锁中国的海岸？”并严正指出：“我亲自到过中国，亲眼看到美国帮助蒋介石残杀中国人，而苏联并没有，美国总是凭空虚造，硬说中国受苏联的支配。其实，新中国已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现在，中国绝不需要美国的帮助，只要美国不再帮助蒋介石来残害中国人民就好了。”“美国如果真正有意维持世界和平，就不应该阻碍中苏英美对日本和约之早日签订，就不应该再驻兵朝鲜，而应依照过去盟约实行”^②。

① 陈嘉庚《回国观点》（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各社团欢迎大会讲词），一九五〇年三月四日，《新中国观感集》第77—86页。

② 陈嘉庚《严正警告美国反动派》（与华盛顿州世界事务协会主席汤姆生的谈话），一九五〇年三月四日《南侨日报》。

二十七日，在福建会馆会员大会上演讲：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福建“治安定可日趋良好，土匪迅可肃清”，将来修筑闽赣、闽粤铁路，扩大厦门海港，开发龙岩煤矿和安溪铁矿，前途大可乐观。在谈到国内外形势时，陈嘉庚着重指出：“中国、苏联、美国为世界大国，人众地广，富有物产，中国民众在三国中居首位，国界与苏联毗邻，举足极其轻重。而过去政府腐败，独裁、贪污，无恶不作。加以美国资助军火财物，加剧中国内战。中国人民痛恨美国之助纣为虐，拥护解放军，共诛卖国贼蒋介石，于短时期内全国解放，成立人民政府。在英明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兴利除弊，百政维新，将见三大国中原属落后之中国，勃兴发展，独立自强，美国虽野心未死，百计破坏，已惨败涂地。近中苏亲善，结为盟友，力量伟大，对于维护世界和平，贡献甚大。至美国当局借词共产主义与之抵触，然独立国家，政权属之人民，实行共产政治与否，当由各国人民自决，与美国何干？”^①

三十一日，陈嘉庚在《南侨日报》发表《谣言与事实》一文，列举他在国内亲眼看到的三点事实，以驳斥美国野心家所捏造的“中国灾情如何严重，死亡如何惨多，为无美国救济所致”的谰言，最后说：“昔禹有三年之水患，汤有七年之旱灾，其他朝代之灾难亦常有之，但免靠外国救济，而中国人口仍增加”。今日中国“组织之严密，布置之周到，民心之团结，有如一家，一地有严重灾情，若大部分人民节俭救济，则困难不难迎刃而解也。百十年来，我国政治腐败，外国侵略几吸尽我民族膏血，人祸天灾，无年不有，推原祸始，侵略者岂不谬哉？！”^②

① 陈嘉庚《福建建设前途乐观》（在新加坡福建会馆会员大会演讲），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七日，《新中国观感集》第86—89页。

② 陈嘉庚《谣言与事实》，一九五〇年三月三十一日《南侨日报》“时论”。

陈嘉庚在新加坡处理未了事务期间，曾连续在《南侨日报》发表他在新中国观察的观感，后来汇编为《新中国观感集》，后面还附有《住屋与卫生》、《民俗正论集》两文，在各地印行六十万册，受到广大侨胞的欢迎，使新中国在海外的威信得到提高。

第十四章 为着祖国的富强和统一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一日，陈嘉庚从新加坡乘飞机回到北京，从此定居国内，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和统一祖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斗争，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除了继续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外，还当选为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和中华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陈嘉庚是举世闻名的爱国华侨的模范，在归国后的各项政治活动中，他总是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就如何加强广大华侨与祖国的联系以及如何保护华侨在海外的合法利益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有关改善海外华侨处境的问题上，他在一九五〇年五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的发言中说：“华侨在各地有一千万人，或受殖民地政府的苛待，或被当地民族排斥，损失惨况，不可胜计，海外孤儿告诉无门。自我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惟望早日建立外交关系，派出使领，以正常外交手续，予以切实保护。”^①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中又说：“华侨一向期望祖国独立、自由、民主、强盛，现

^① 陈嘉庚《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〇年五月。

在这个希望完全成为事实了。就是因为如此，华侨已经不是所谓‘海外孤儿’，而已经有了一个伟大的慈母，这就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迫害归国的侨胞受到了祖国人民政府的关心照顾，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只有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能够如此。现在华侨所居留的地方，很多处在美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的奴役之下，处境非常困难。但是，广大华侨的爱国心，是永远不会向帝国主义低头的，爱国侨胞的心和国内同胞的心，是永远结在一起的。”^①

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公布，陈嘉庚在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发言表示衷心拥护说：“这个宪法是全国人民的宪法，是全国人民多年来的愿望，是海外华侨多年热切殷望的宪法。这个宪法草案是毛主席亲自领导下起草的，是吸收各方面人士参加、经过长时期地讨论和研究的。宪法草案第九十八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我看有这一条就很好，就够了，再多了不是做不到，就是不必要。宪法草案有这么一条，对于国外华侨就是很大的鼓舞。”^②

接着，又在《光明日报》发表《宪法草案鼓舞了华侨的爱国热情》一文，略谓“宪法草案明白规定，华侨同国内全体人民一样是国家的主人，华侨和国内人民一样都选出代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人民拥有的国家最高权力。由此可见，祖国是何等重视、何等热爱她在国外的儿女。宪法草案对华侨的关怀和照顾用立法手续固定下来，这就会更加巩固国外华侨的自信心，使

① 陈嘉庚《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② 陈嘉庚《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

他们加强团结，热爱祖国。”^①

一九五五年五月，我国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陈嘉庚认为这个条约的签订，是“完全符合海外广大华侨的愿望，也符合我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共同利益；它显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谊有了新的发展，同时，对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与友好合作也作出重要贡献。”他在《庆贺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签订》一文中高兴地指出：“华侨是沟通我国人民与驻在国人民团结友谊的桥梁。双重国籍问题合理解决了，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根据自愿，无论选择那国国籍，我相信都会进一步加强彼此的友谊关系；同时，我也相信，任何国际问题只要双方赤诚相见，循着和平协商的途径，都会达到相互谅解求得顺利解决的。”^②

一九五六年十月，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陈嘉庚在开幕词中热情号召华侨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说：

“华侨一向爱国爱乡，很愿意对祖国和家乡有所贡献，可是旧时代的中国，在国际上处在被压迫的地位，内政又非常腐败。那时候，华侨要在家乡安居也有困难，更谈不到建设祖国和家乡。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长久以来，华侨期望祖国强盛，现在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在这个伟大的祖国，华侨可以和全国人民一道，贡献自己的力量，参加建设事业，实现建设家乡的理想了。”

“几年来，已有不少华侨回到祖国，当前归国华侨联合会应该更广泛地团结和组织归侨、侨眷和华侨，加强社会主义教育，

① 陈嘉庚《宪法草案鼓舞了华侨的爱国热情》，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光明日报》。

② 陈嘉庚《庆贺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签订》，一九五五年五月五日《厦门日报》。

进一步鼓励并帮助他们参加祖国建设事业。爱国的侨胞对于推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应该和祖国人民一道，担负起应负的责任。归国华侨联合会应该经常向有关部门反映侨情，积极提出建议，使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同年，新加坡人民热烈展开争取公民权运动，陈嘉庚给予很大的同情与支持。他对新加坡访华团团员们说：“现在你们新加坡即将自治独立，你们说已把新加坡作为永久居留的家乡，就要争取成为新加坡的公民，效忠新加坡，并要比过去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我们一辈，更加努力为你们的新国家效力。”^①一九五九年七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竞选中获得胜利，陈嘉庚亲自写信给该党领袖李光耀致贺，信中说：“闻讯之下，欣庆无任……敬祝贵党成功，新加坡国万岁！”^②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赢得了新加坡朋友们的敬佩和称赞。

一九五九年，印度尼西亚发生大规模的排华暴行，华侨的生命财产损失惨重，陈嘉庚对此表示莫大的愤慨与痛心，他在全国侨联第四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回顾了华侨与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悠久、亲密的友谊说：

“我国侨民旅居印度尼西亚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岁月中，华侨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亲切相处，以他们辛勤的劳动对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能磨灭的贡献。华侨经济随同印度尼西亚民族经济的发展，而成为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广大华侨不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同印度尼西亚人民融合在一起，而且在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始终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并肩作战，共同抵抗了荷兰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相继取得独立以后，特别是在万隆

① 高德根《悼——代伟人陈嘉庚先生》，《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第34—35页。

② 陈嘉庚信函原件，集美学校校委会藏。

会议以后，我们两国的友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华侨和当地人民的关系也是更加亲密。这些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华侨和印度尼西亚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斗争中，已经结成了患难之交。”接着，陈嘉庚尖锐地指出：“但是，现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别有用心势力，却以德报怨，公然把华侨当作敌对国家的侨民看待，对他们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这完全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行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是海外侨胞最有力的靠山。我国政府和人民对于在印度尼西亚遭到非人道的待遇的侨胞感到特别的关切。我们热烈欢迎这一切要求回国的侨胞重返祖国的怀抱。”^①

在祖国政府和人民的有力声援下，许多受迫害的印尼侨胞相继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入学、就业、定居等方面得到了妥善的照顾，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所掀起排华逆流很快就平息下去。

二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一日千里。许多世代代的梦想一一成为现实，这是何等伟大而深刻的变化啊！陈嘉庚身历其境，不由得兴奋异常，时时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把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略尽一分微薄的力量引为最大的安慰。

长期以来，福建经济落后，交通不便，正如陈嘉庚所形容的，“全省十二万余方公里，人民一千二百余万人，竟未有一寸铁路！”福建人民和海外华侨多么渴望着能有一条畅通全省南北的铁路！陈嘉庚在一九五〇年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中提出了修建福建铁路的建议之后，又一再写信给毛主席和周总理重申这

^① 陈嘉庚《在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一届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开幕词》，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一请求。毛主席、周总理采纳了他的建议，鹰厦铁路于一九五四年正式动工了，工程进展迅速，不到两年就全部告成。陈嘉庚高兴采烈地说：“鹰厦铁路原计划须至一九五七年底才能完成，而现在已经提早在今年年底以前完成，全线通车，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不但鼓舞了福建和全国人民，也大大鼓舞了国外华侨。”他又指出：“鹰厦铁路的通车，不但对于解放台湾有巨大作用，对于开发福建富源也有巨大作用。龙岩专区不但有优良的铁矿，也有丰富的煤矿和其他矿产。要使鹰厦铁路发挥它的更大作用，就不能不及早从漳平伸一支线到龙岩去”^①。这个愿望不久又完全实现了。

厦门本来是一个小岛，陆地交通十分不便，陈嘉庚倡议在集美与高崎间填海筑堤，不久建筑成功，一向孤悬海外的小岛自此与大陆联成一片，火车汽车可以直达，对厦门市交通的改善和海防的巩固起了莫大的作用。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福建人民又相继在集美——杏林和东山——八尺门间建筑了海堤。

福州是福建最大的都市，人口七八十万人，但长期缺乏自来水的设备，城市公共卫生和消防工作都很受影响。一九五〇年陈嘉庚回国未久，即对北京自来水工程进行调查，制定兴建福州市自来水的方案，交与省人委负责人，很快就被采纳施行，人人称便。

福建山多田少，粮食不足。陈嘉庚在一九五四年全国人大会议中提出了“闽省多袋形海滩，应改造为良田水利”的议案，也得到人民政府的采纳，逐步付诸实施。厦门郊区的杏林湾，在修了海堤后，共有土地和水面面积三万多亩，已开始经营水产养殖，并种上了水稻。马銮盐场围垦成功后，也成为厦门化学工业

^① 陈嘉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基地，年产盐能力达十三万吨。

陈嘉庚认为福建虽不产棉，但海运发达，可以从国外进口棉花，以谋纱布的自给。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厦门杏林纺织厂建立起来了，现已成为拥有五万纱锭的大厂。

陈嘉庚根据其多年经营橡胶业的经验，在全国人大、政协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一再建议采用价格低廉的绉胶，以代替烟胶，经过国家经济委员会召开专题委员会研究，认为他的建议合理可行，能为国家节省外汇支出，应该在橡胶工业中积极推广。

为了发现新的能源，满足农村用电需要，陈嘉庚于一九五八年在集美兴建了一座海潮发电站，想利用潮汐涨落的力量发电，这在当时是一个创造性的尝试，最初计划投资二十余万元，后增至九十余万元，终因技术不过关而中止。尽管这样，这种不怕失败、勇于创新的精神是很值得人们学习的。

此外，陈嘉庚还在发展文化，改善卫生等方面提出许多有远见、有价值的建议，如组织大众化的股份有限公司，引导华侨回资；规定中文书写统一自左而右横写；发展农村小学，提高农村小学教师的待遇；在全国各中学普遍设立科学馆；在沿海各重要地区设立水产航海学校；规定民间新建住宅应注重卫生方面的设计；限制种烟面积，提高纸烟税，停止对公务员配给纸烟，禁止未成年者吸烟和以纸烟作为应酬品等等，有的已见诸实行，有的在今日看来仍有坚决实行的必要。

三

如何实现祖国的统一，更是陈嘉庚晚年所时刻关心的问题。

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一苇可渡，自古就是大陆与台湾两地人民通商往来的孔道。一六六一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这里出发，渡海东征，收复了台湾。一六八三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台湾

成为福建的一个府，与厦门合置一道，名台厦道。从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间，有数以百万计的大陆劳动人民分乘官私船只，从厦门出发，络绎不绝地移入台湾，成为开发台湾的先驱。一八九五年甲午战后，清政府把台湾割让日本，福建无异“被割去一臂”，陈嘉庚当时已经二十一岁，目睹许多同胞麻木不仁，“仍不知苦”，无限痛心，自此立下了倾资兴学，唤醒民众的志愿。现在全国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得到了解放，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却仍然继续盘踞台湾，借助外力，对大陆沿海进行种种破坏与捣乱，又怎能不引起这位爱国老人的莫大关心与愤慨呢？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发表解放台湾的联合宣传，号召“全中国人民更加坚强地团结起来，为解放台湾、反对美国干涉、保障祖国安全，保障世界和平而奋斗”。陈嘉庚热烈地响应这一号召，对《光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铁一般的事实。从远一点看，台湾的开发和明朝的郑成功有很大的关系，郑成功是福建南安县人，由于他带了许多福建同乡渡海去建设他的根据地，台湾的建设才得以逐步发展。从近一点看，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以前，台湾曾属福建省，台湾和福建的关系有如唇齿之相依，福建漳泉地区的老百姓，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亲人去台湾谋生，海峡里的闽台航船，来来往往，不绝于道。如果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有谁相信么？全中国人民都关心台湾的解放，闽南人尤其关心台湾的解放，因为台湾同胞当中，很多是他们的血亲。”^①

一九五六年初，全国人民政协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陈嘉庚在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中

^① 陈嘉庚《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发言，热情支持和平解放台湾。他说：“这个号召很快就会深入到台湾人民的心坎，八百万台湾人民之中有将近六百万人是闽南人，他们说的话和我现在讲的话一样，是厦门语系的话。他们有很多是当时追随民族英雄郑成功到台湾去的后代，他们在那里反抗过清朝的统治，也抵抗过日本殖民统治者。他们还有不少人是台湾有家，在闽南也有家的。几年来由于美帝国主义霸占台湾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统治，使他们父子兄弟之间未能团聚或互相往来，过着痛苦的生活。当他们听到周恩来主席对他们的关怀和号召，一定会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兴奋。祖国建设的成就是那样辉煌，家乡面貌的改变是这样巨大，福建铁路很快就要通车了，火车要一直开到厦门市，他们一定会非常振奋。在这里，我要告诉台湾国民党人员，福建人民对于你们勾结美帝国主义、奴役台湾同胞的罪行是痛恨的，但是，只要你们响应周主席的号召，幡然改悟，走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使台湾同胞回到祖国怀抱，福建人民也将和全国人民一样，宽大对待你们，不究既往。”^①

同年十月五日，陈嘉庚又在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言并号召海外国民党人共同为和平解放台湾而努力，他在开幕词中说：“当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盛而感到自豪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台湾还在外国势力的控制之下，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海外的国民党人，比较老一辈的很多和我们一同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又曾经密切合作，为筹款抗日而共同努力。他们本来也期望祖国强盛，但其中有一部分因为目前对祖国的真相不够了解，所以对祖国采取了怀疑或者对立的态度。我们希望他们回到爱国的行列来，共同推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②

^① 陈嘉庚《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六年二月十日。

^② 陈嘉庚《在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一九五六年十月五日。

第十五章 晚 年

在晚年家居期间，陈嘉庚把余生的大部分精力投入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校舍的扩建。

在集美学校方面，从一九五〇年开始，着手修复遭到战争破坏的各校校舍，至一九五五年逐渐完成，以后即转入于新校舍的大规模增建。

一九五三年间，因看到南洋各地华侨教育受到种种的限制和摧残，回国求学的侨生将会日多一日，便建议人民政府在集美创立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简称侨校），专收归国侨生，进行补习教育，经过一两年补习后报考正规高中等学校，该校于一九五四年正式开学，在校学生很快就达到三千余人。

一九一九年创办的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原设有航海、驾驶、捕捞等专业，在陈嘉庚的积极倡议下，于一九五二年增设了养殖专业，一九五四年增设轮机科，一九五八年分为两校：水产学校设有渔捞、养殖、轮机等专业和机械工厂、渔轮、渔场等实验场地，学生七百余人；航海学校有船舶驾驶、轮机管理、公路桥梁架设、汽车修造等专业，学生六百余人。

一九五二年，商业学校改为财经学校，设有工业统计、会计核算、制造计划等专业；一九五九年又改为轻工业学校，设有财会统计、糖机、轻机、糖化、酿造、发酵分析、棉纺、棉织等专

业，学生一千四百余人。

集美中小学也得到很大的发展。一九五七年，高达十五层的集美中学南薰楼校舍建成。学生数最高时达三千九百人，小学生有一千三百余人，学前幼儿六百余人。在一九六〇年前后，集美各校学生总数共一万一千余人，十年中（从一九五〇年算起）增加了九倍半；校舍面积达十六万平方公尺，为解放前未受战争破坏时的四倍。一九五五年，建成了一座可容纳四千人的福南大会堂，供各校师生和集美镇人民集会之用，周末和假期则放映电影，以丰富学村的文娱生活。此外他又增购大量书刊、仪器，以充实图书馆和科学馆的设备。扩充集美医院，有医师、护士职工七十八人，病床从十八张增至八十多张。扩建电灯厂，发电量从二十二瓩增加到五百瓩，彻底解决了集美镇居民的照明问题。建筑小型水池、水塔，引用坂头水库的水，以满足师生用水需要。

为了美化学村周围环境，陈嘉庚还在集美半岛南端筑堤围垦，建成内、中、外三个毗连的小池，面积共十八万九千多平方公尺，外池最大，宽三百米，长八百米。他亲自设计在四岸修造七座富有民族风格的亭台楼阁，名为“七星坠地”；中央有座天坛式的中亭，亭边外加一个小亭，称为“孤星伴月”。每年端午节，附近各村农民在此竞赛龙舟，十分热闹，平时则作为学生课余划船游览的场所。在东南方海滨又建有游泳池两个，面积一千多平方公尺。在东方鳌头小岛上，建立集美解放纪念碑，高二十八公尺，一称“鳌园”，中有很多由闽南石匠雕刻的精美的山水和人物的浮雕，现在已成为游览胜地。

在厦门大学方面，陈嘉庚专心考虑校舍的建筑问题。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由他筹措经费，亲自设计监督建成的校舍，有建南大会堂、图书馆、生物馆、化学馆、物理馆、教工宿舍、学生宿舍、游泳池、大操场、学生餐厅等，面积达五万九千

多平方公尺。建南大会堂有五千多座位，是厦门市最大的礼堂；以建南大会堂为中心，东有图书馆、物理馆、西有化学馆、生物馆，五座大楼并列一行，面向大海，使华侨从海外乘轮入港时可以一览无余。大操场原计划直修至海滨，与游艇码头相接，成正圆形，后因被公路遮断，暂修成半月形，取名“上弦场”，面积仅为原计划之半，然已可容纳一万余人。

此外，他又募款三十余万元（内自捐十五万元）在厦门大学西边创立一所规模宏伟的华侨博物院，于一九五六年开始筹备，一九五九年建成开幕。接着，他还建议在北京筹设一所华侨博物院。

在增建两校校舍中，从设计、绘图、备料到施工，陈嘉庚事必躬亲，一丝不苟。他每天都要到集美工地检查、指挥，当场解决问题。厦大工地，最初一星期来两次，后减为一次，但是说来就来，从不误期，有一次突然风雨大作，他还是准时来了。在京卧病期间仍然不断通过电报、电话和写信进行具体的指导。他设计的建筑物，外观务求雄伟壮丽，具有传统的民族风格。为了使屋内有充足的空气和阳光，房间外面一定要有一条宽阔的单向走廊。房门一律开在当中，窗户可上下拉动，房顶不用天花板，以防鼠患和尘埃堆积，厕所一律建在户外，以保持卫生，即十几层高楼也不例外。

为了适应大规模建筑的需要，陈嘉庚特地成立一个学校建筑部，招收闽南各地石匠、木匠、泥水匠千余人，组成基建队伍，并在龙海县石码设立砖瓦厂烧制砖瓦，石料多就地开凿石山取用，以节省运费，木料则向山区采购。对于当时需要从香港进口的钢筋、水泥和小五金等，他都精打细算，非到万分必要，实在无物可代时，才同意采购一些，由于他统率有方，校舍建筑工程的进展十分顺利。

二

一九五五年七月至十二月，陈嘉庚由庄明理陪同，到东北、华北、西南、中南等十六个省市参观访问，这是他自一九四〇年以来所作的第三次全国性旅行考察活动。

陈嘉庚第二次来鞍钢参观，回忆起解放初期第一次参观的情况，对比之下，全厂设备已经焕然一新，规模扩大了好几倍，大型轧钢车间，无缝钢管等新产品、新设备应有尽有，新老技术人员都在意气风发地努力生产。看到了这种新兴气象，陈嘉庚高兴地说：“钢铁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过去腐败政府统治时，连一根小小的针都要靠外国进口，现在我们在短短的几年间，就建成这样大规模的钢铁基地，我们就更有信心能把我们的国家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了。”^①

同年秋后到达兰州时，看到那一条条宽大坚实的柏油马路，那一座座簇新雄伟的大、中型工厂以及许多新建的学校和民房，陈嘉庚几乎认不出这就是五年前的兰州了。他惊叹说：“我一九四九年到兰州时，当地人士用这两句话来形容兰州的市容：‘有雨三尺泥，无风满街尘’，而今天的兰州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城市了。”^②

十月一日，到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立即被邀参加自治区成立大会，发言说：“晚清及国民党反动政府时代，少数民族受贪官污吏及土豪劣绅欺凌剥削，生活惨苦，汉族良民亦同祸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后，我往东北访问乌兰浩特人民政府，越年访问张家口、归绥、包头和内蒙古自治区负责人，咸称工农业及教育卫生已逐渐开展，人民生

^{①②} 庄明理《悼念陈嘉庚先生》，《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第27—30页。

活亦有提高，汉族人民与各族人民空前亲善团结。去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一般区域八十万人得选一人，少数民族及国外华侨、则远少此数可选一人，宪法明白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他如康藏、青藏两公路，不惜牺牲巨大财力建成。在农业工业文化卫生及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等方面，对少数民族关怀照顾亦甚显著。今日国基奠定，各族人民努力方始，增产节约，克勤克俭，庶不负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乃真诚敬爱毛主席也。”①

在僻处西南的贵州，陈嘉庚也发现了许多可喜的景象，他满怀希望地说：“抗战时，我也来过贵州两次，人家在形容这个省的穷，都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当时我觉得这个省的确是一个穷省。但是，现在桂黔铁路即将贯穿省垣，川黔铁路也在动工兴建中，山区的矿藏正在开发，农田水利也在大量兴修，人民的衣着已不象从前那样褴褛难看，从人人都有喜颜悦色的笑容看来，他们的生活一定是安乐的。”②

十一月，在视察海南岛橡胶园时，陈嘉庚亲自介绍了有关种植橡胶和经营管理橡胶园的经验。

在旅程中，他对同行的庄明理说：“一九四〇年我们所到过的许多地方，看见那种腐败的情况和衰退的现象，我的内心感到很忧虑。解放后，我们每次所到的地方，所看到的各方面的情况，都一次比一次进步，新气象，新建设多到不胜枚举。象这样的情况，的确使人感到愈看愈欢喜。”③他当时已达八十二岁的高龄，不仅没有为长期的旅程跋涉所苦，反而在祖国万马奔腾的鼓舞下感到更年青了。他同庄明理约定五年之后再作第四次的全

① 陈嘉庚《在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

②③ 庄明理《悼念陈嘉庚先生》。

国性旅行。

三

陈嘉庚日常生活很有规律。他有早起的习惯，每日清晨五时睡醒时，全身躺在床上，稍稍用力向左右翻转数十次，然后起身下床，做健康运动，再用温水或冷水冲洗，用毛巾擦全身数次。从六十岁起，日日如此，从不间断。早晚都手执手杖步行到建筑工地巡视，就地解决问题，来往至少有好几里路。所以尽管已达八十余岁高龄，还是精神矍铄，健步如飞。

陈嘉庚自奉甚俭，自己规定每日伙食费不得超过五角，儿子和孙子们也不例外。他每餐食不过饱，爱吃的东西有番薯粥、高粱米粥、海蚝和箭头鱼等，都是家乡集美的土产。有一次，事务员考虑到他终日操劳，额外买了一只鸡做菜。他知道后非常生气，并下令停发事务员一个月的工资，以示处分。那时，女婿李光前请他照料南安梅山国光中学的校务。陈嘉庚每到梅山，总叫司机在乡外停车，和随行人员一起提着两个冰棒罐下车，坐在公路边的磐石上，吃起咸稀饭配油条的午餐，然后步行到国光中学，不让学校破费款待。中央给他的三百元月薪，他除每月十五元的伙食费外，全部存入集美学校校委会会计处，作为公用。招待客人，大概是油炸蚝、蚝煮线面、炒米粉、薄饼、煮芋头之类，再加一道汤，总共不过四五样。有一次，陈毅将军来看他，炊事员买了一斤糖果回来，事后陈嘉庚批评说：“首长至多尝一两粒糖，买两角钱满够了。”他常常说：“该花的千百万都不要吝惜，不该花的一分钱也不能浪费。”他身上穿的衣服，脚下着的鞋袜，床上挂的蚊帐以至手中携的布伞，经常是一补再补，每次长途旅行，随身必带针线包。他原来在集美有一所住宅，抗战

中被敌机炸毁了，却始终不肯重修，自己一个人长年住在集美学校董事会楼上的一间小房里。房内陈设十分简单，一张古老的床，半新不旧的写字桌，一对不对称的沙发（一张是多年前的，一张是上海集友银行新送的），一口装水用的七斗小瓷缸，一面普通的洗脸盆，一个掉了几处瓷的牙杯，两只破旧的皮箱，以及七拼八凑的凳子。每晚九时以后集美镇的电灯熄了，他就点起蜡烛继续工作，蜡烛盘用一个破茶杯翻过来的底来代替。

陈嘉庚一天到晚都在为社会服务，晚年居乡，没有亲属在身旁服侍。在新加坡全力支援祖国抗战期间，也是长期住在怡和轩俱乐部，一年难得回家一两次，甚至连春节也不回家度岁，儿孙们只好分批到怡和轩向他拜年，有的儿孙一年之中只有那一天才能见到他。他对儿孙的看法是：“针无两头利。”正如他家书中所说：“我既然立志为社会服务，当然不能再为儿孙计；若兼为儿孙计，则不能尽量为社会服务。”

陈嘉庚鄙薄沽名钓誉，不喜欢别人颂扬，有一次发现《南洋商报》准备转载一条颂扬他的报道，立即要求该报将其抽出，重新排版付印。一九四一年到长汀参观内迁的厦门大学时，看见各系办公室命名为“嘉庚堂”，他很不满意，责备学校当局不应该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他一向不许亲属为其祝寿，有一次子孙们正在私行庆祝时，他偶然从怡和轩回来，合家连忙撤去所有祝寿陈设，不敢让他看见。

陈嘉庚不畏权势，看不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一九二一年厦门大学成立时，当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特意送来制作精美、亲自题字的横匾一面，陈嘉庚弃置地上，不许悬挂。有一次，国民党中央委员戴愧生于路过新加坡时专程到怡和轩拜访，千方百计邀他合照一张相片，陈嘉庚坚执不肯，戴自讨一场没趣而去。

陈嘉庚对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许多“陋俗”，如嫁娶丧葬，浪费铺张，演戏酬神，昼夜聚赌；无谓应酬、酒肉征逐；迷信风水，停柩不葬；少年早婚，蓄童养媳等等，认为都足以“费金钱，损精神，败风俗，妨治安”，而极力加以反对。对于近代从外国传入的营业跳舞厅，则斥之为变相妓院，“有百害而无一利”，更加深恶痛绝。对男子穿马褂长袍，妇女穿旗袍、涂口红等，也颇不以为然，一九二八年间，曾向重庆国民党参政会提出“废除长袍马褂”的议案，但未获通过。

陈嘉庚主张城市必须现代化，市区建设图案必须预早计划，街道和空地必须占全市总面积百分之五十以上，所有商店住宅前必须留有空地，房间必须开有窗户，以保证有充足的空气和日光。沟渠和垃圾必须逐日清扫，各种车辆必须洗刷整洁，市内不许饲养家畜，路边不许贩卖食物，以保持卫生的环境。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蒋机轰炸福州市，烧毁店屋住宅四千余间。陈嘉庚于次日发一封电报给周恩来总理，要求规划重建福州市，电文中说：福州“因自来建屋概用木板，街巷密狭，横直无序，卫生不讲，每遇火患，多以千数，急功克复，仍用木板，危险长存，请电示省长，严令市民复踵旧习，须归市政重新计划，留最新式街巷，建合卫生砖屋，可转祸为福也”^①。对于农村中的厕所、水井和蚊蝇孳生地，尤应特别注意。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他特地打了一封电报给当时的福建省省长叶飞：“闽南最害乡村厕所林立，请严令乡政合作，废私厕立公厕”^②。他动员集美全镇居民填平房前屋后、路头巷尾、粪蛆成团、蚊蝇满坑的私厕，砌起七十六座卫生清洁的公厕。他认为卫生问题关系“国民身体强弱，寿命长短”，“必须彻底改革”。所以把《验方新编》和《住屋与卫生》两书，多次翻印数十万册，在国内外广泛散发，

①② 陈嘉庚电稿，集美学校校委会藏。

借以唤起同胞注意，他在提倡卫生方面所付出的精力仅次于兴学。

一九五八年元月间，陈嘉庚的右眼眶上突然隆起一粒肿瘤，经专家检查，断定是鳞状上皮癌，经过悉心治疗后，初步得到控制。不久又到东北、山西、湖南等地参观，积极参加各种政治社会活动。一九六一年三月起，多次发生脑血管痉挛，并伴有点状出血，经专家数次会诊，病情曾有好转。六月下旬，又突然发生脑溢血，幸及时获得抢救。但因为多次脑血管病变引起部分脑组织发生变化，加以年老体衰，终因全身机能衰竭，于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临终前，陈嘉庚对其家属和亲友口授遗嘱说：“一、最紧要的是国家前途！中国有两派：旧的一派是国民党，这一派很坏；新的一派是共产党，它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人有一次死，早死晚死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国家。国民党过去做尽坏事，他们逃到台湾去了，那一些人一生自私自利，假公行私；这一派现在还在捣乱，多开国家不知多少钱。我们应尽早解放台湾，台湾必须归中国！二、我国海岸线长，海洋事业一定要大发展，航海学校一定要办下去。三、棺木一定要运回集美，子孙们来了，不要哭，穿黑就可以了。”并交代把在国内银行的存款三百多万元，全部献给国家。按照他的遗愿，其中五十万元捐作北京华侨博物馆的建筑费，五十万元充作集美福利基金，二百多万元用于建筑校舍。他一生献给文化教育事业的钱，按照黄金价格计算，合人民币一亿五千万万元，忠诚地实践了“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诺言。

陈嘉庚逝世后，立即组成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委员的治丧委员会。八月十五日上午，首都各界人士二千多人公祭陈嘉庚先生。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致悼词说：“陈嘉庚先生是华侨

的领袖人物，是一个爱国爱乡、热心公益教育事业的爱国老人。……陈嘉庚先生和我们永别了，但是陈嘉庚生前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社会经济面貌，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动国外华侨大团结等方面，表现了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海外广大华侨树立了一个好榜样。……陈嘉庚先生的逝世是我们的一个损失，我们谨以最沉痛的心情向他表示哀悼”。

二十日，陈嘉庚的灵柩运回集美，安葬在鳌园中。

陈嘉庚逝世了，但他的崇高品德和爱国精神却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它的海外儿女的心中，正如雅加达华侨代表们在追悼会上所哀唱的：

“先生啊！安息吧！你的音容永远常存。你是华侨旗帜，你是民族光辉，你为民主而斗争，我们要继续你的精神。……”

附 录

试论陈嘉庚

陈碧笙

陈嘉庚先生（一八七四——一九六一）是当代爱国华侨的一面光辉旗帜。他一生热爱祖国，立志为社会服务，在团结广大侨胞，提倡教育事业，支援祖国抗战，反对封建专制，促进祖国统一和富强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目光远大，意志坚定，刚直无私，忠贞不贰，谗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所不敢为，体现了海外中华儿女的高贵品质。他的嘉言懿行为广大侨胞树下了良好的楷模，也受到全国人民的共同景仰。本文试图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陈嘉庚先生生平事业和活动的各个方面进行探讨分析，以求给予一个比较恰当的评价，不当与错误之处，敬希广大读者和熟悉陈氏生平的同志不吝批评指正。

一 关于陈嘉庚生平的几个时期

陈嘉庚的一生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六个时期：

（一）幼年时期（一八七四——一八九〇）：十七岁以前，在家读私塾，“识字甚少”，间亦参加一些家庭副业劳动。

（二）壮年经商时期（一八九一——一九一三）：十七岁至四十岁，在新加坡经营商业，略具规模。三十七岁（一九一〇）

起参加同盟会，筹款接济福建光复政府和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三）中年企业大发展，积极兴学时期，四十一岁至五十四岁（一九一四——一九二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项营业顺利发展，一九二五年前后达到顶点，成为东南亚最大的企业家之一。从一九一八年开始，用赢利收入先后创办了集美学校、厦门大学和南洋华侨中学，同时积极募款赈济祖国难民。

（四）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时期，五十五岁至六十六岁（一九二八——一九三九）：一九二六年以后，企业连年亏损，终于一九三三年停业，对厦集两校经费仍竭力维持，主要精力用于倡导抵制日货，组织南侨筹赈总会，支援祖国抗战。

（五）积极参加祖国民主运动时期，六十七岁至七十六岁（一九四〇——一九四九）：一九四〇年回国慰劳、访问延安后，思想发生深刻变化，开始同情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日军占领期间匿居爪哇三年余。大战结束后，出而领导东南亚华侨的民主救国运动，与国民党人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

（六）晚年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七十七岁至八十八岁（一九四九——一九六一）：一九四九年以后，定居国内，代表海外广大侨胞，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政治社会活动。一九五〇——一九五六年间，继续筹款扩建厦大集美两校校舍。

以上是就陈嘉庚生平活动时间的顺序说的，如果就他活动的地点说，陈嘉庚在国内生活的时间，幼年时期有十七年，晚年时期有十二年，壮年至老年时期曾回国六次，每次时间一年至三年不等，共约十一年，三者合计共四十年，在国外的时间约四十八年，除匿居爪哇三年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新加坡度过。如就他的活动内容说，经营企业的时间，从一八九〇年在顺安号学商到

一九三四年陈嘉庚公司收盘结束，共四十四年；兴办教育的时间，从一九一三年创办集美小学校到一九五六年扩建厦大、集美两校校舍完成，前后亦共四十四年；参加政治社会活动的时间，从一九一〇年参加同盟会到一九六一年在北京逝世，共五十一年，而在一九三四年企业停闭后主要从事政治社会活动的时间有二十七年。由此可见，陈嘉庚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是用在兴办教育和参加政治社会活动上，中晚年以后尤其如此。

二 关于陈嘉庚的企业经营

首先应该指出，陈嘉庚是一个有成就的企业家。这一点很重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陈嘉庚既非豪门巨姓出身，又从未当上一官半职，手中无权无势，唯一的凭借就是他在海外辛苦挣来的一笔钱。没有这一笔钱，陈嘉庚生平的许多活动，不论是兴学也好，办报也好，救灾也好，捐献也好，以至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也好，都将无从谈起。有钱万事可办，无钱寸步难行，这两句话对于陈嘉庚所兴办的事业是特别适用的。所以，陈嘉庚必须首先是一个企业家，然后才有可能成为兴学家、慈善家、社会改革家和爱国侨胞的领袖。有些同志不肯正视这个客观存在的事业而试图加以回避，是不必要的。

作为一个企业家，陈嘉庚的营业活动几乎百分之百地放在国外，尤其是放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他初期也曾试图在家乡试办一些新式企业，如在集美设立制蚝罐头厂，在厦门经营房地产业，以及集资筹建同安集美公路等，但都没有成功。因此，他所兴办的企业，在国内与封建官僚势力没有什么牵连，在国外又不断遭到殖民垄断资本的排挤和压迫，这就决定了他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比国内一般民族资产阶级具有更大的坚定性和彻底性。

陈嘉庚在海外所兴办的企业多种多样。在商业方面，有米店和房地产业；在农产加工方面，有熟米厂，冰糖厂、菠萝罐头厂和生熟胶品制造厂；在种植业方面，有菠萝种植园和橡胶种植园；在交通运输业方面，有航运业；其中尤以橡胶、菠萝两项热带产品的种植和加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获利也最巨。在一九二七年前后的极盛时代，他拥有种植园万余英亩，大小工厂三十余所，分支商店一百余处，常年雇用职工数万人，资产总值在叻币一千二百万元左右，是当时东南亚最大的企业家之一。

在象新加坡、马来亚那样典型的殖民地社会中，陈嘉庚所以能够顶住当地殖民垄断资本的排挤压迫，日货的削价倾销和同行业的剧烈竞争，而把个人企业发展到如此巨大的规模，决不是由于一时的侥幸，而是由于他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具有如下两点他人所不能企及的特长：其一，他具有相当敏锐的眼光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在他三十一岁那年（一九〇四）开始经营新利川罐头厂时，很快就发现当时各洋行订购的菠萝罐头，除了普通庄以外，还有多种需量不大但出价较高的“杂庄”，无人注意及之，因此就特别注意承揽这项“杂庄”而稳获厚利。他又发现当时各厂采购菠萝都是在季末停产时开始核算，始知盈亏得失，乃独出心裁，改为当日所购原料限当日制完，当晚即核算盈亏得失，以为次日选购和议价的依据。在三十二岁那年（一九〇五）兼营冰糖厂时，他厂都用大锌锅熬制，以柴薪为燃料，陈嘉庚独改用内铜外铁的大锅熬制，以锯屑为原料，使生产成本大为降低。在三十八岁那年（一九一一）参观暹罗北柳某家熟米厂时，看见该厂晒谷砖埕装有活动屋盖，陈嘉庚大为佩服，回去后立即拨款叫各厂仿制并加以改进。陈嘉庚虽然不是马来亚种植橡胶的第一人，但却是当地看到橡胶有无限发展前途的第一人。他在一次偶然的会中听到林文庆、陈齐贤所种橡胶园以高价售出之后，立即把他

们剩下的十八万粒种子全数买来，在福山园试种，从而奠定了后来大规模经营的基础。凡此种种，一个眼光短浅、思想僵化的人是决计做不到的。其二，他治事勤劳，严格认真，一丝不苟，对重点企业“日日必到，巡视考究，往往至五六点钟之久。”^①虽然还没有一套现代化的管理制度，但对于生产、经营中出现的任何“逸怠”、浪费现象是一刻也不能容忍的。他知人善任，不问亲朋故旧，凡不称职者立即撤换，不留情面。

作为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陈嘉庚不肯屈服于外国垄断资本的压力。在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猛烈袭击下，他所经营的各种企业损失惨重，负债累累，终于被迫接受外国银行条件，将所有企业改组为陈嘉庚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方针时常受到外国人董事会的干涉。陈嘉庚不愿俯仰由人，没有几年，他就下了决心，忍痛将所有厂店关闭停业，不再做外国资本的附庸。这种不在外国垄断资本面前低头的精神表现了海外中华儿女的可贵品质，是他大大不同于一般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资产阶级的地方。

陈嘉庚兴办企业还含有为祖国培育技术人才的深意。他认为二十世纪是橡胶时代，新加坡工人绝大多数都是华侨，在这里兴办橡胶工厂，“可以训练职员工人，如师范之训练学生，俾将来回国，可以发展胶业”；^②“愚于个人营业之外，尚抱此种目的，故不惜资本，积极勇进。”^③他在经营企业中，也很注意识拔人才，奖掖后进，后来成为东南亚产业界的重要人物如李光前、陈六使等人都曾受益于他的培养与提携。

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一个资本家，他虽然无时无刻不在孳孳不倦地追求利润，但他所挣得的钱，既不用于个人享

^① 《致厦大校长林文庆书》，一九二五年十一月。

^{②③} 《南侨回忆录》，“个人企业追记”。

受，更不想把它留给子孙，而几乎百分之百地用于社会公益事业。他自奉极俭，一分钱也不肯浪费，而对于办学、救灾、支援祖国抗战等有利于国家社会的事业却数十万、数百万地慷慨捐输，毫不吝惜。他生平最喜欢引用西方的两句谚语：“金钱如肥料，撒去方有用。”他常常同友人谈话说：“财自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我金钱取诸于社会”，亦当“用诸于社会”。他还以“针无两头利”为喻教导子孙说：“我既立意为社会服务，当然不能再为子孙计，若兼为子孙计，则不能尽量为社会服务。”^①那时东南亚有许多富侨，财产比陈嘉庚不知要超过多少倍，而对于社会公益事业，却斤斤计较，一毛不拔，陈嘉庚慨叹以为他们“生平艰难辛苦，多为子孙计”，“真其愚不可及！”^②黄炎培在一九四五年重庆各界庆祝陈嘉庚先生生还大会中发言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③，这是一句很恰当的评语。

三 关于陈嘉庚的倾资兴学

自黄炎培写的《陈嘉庚毁家兴学记》在上海《东方杂志》发表以来，“毁家兴学”之说不知道流行了多少年。我们在上面说过，陈嘉庚必须首先是一个企业家，然后才有可能成为兴学家或教育家。陈嘉庚本人也曾多次向友人指出，他的“兴学”并没有达到“毁家”的地步，甚至从未动过“毁家”的念头，如果“家”真正“毁”了，又用什么来“兴学”呢？所以，改用“倾资兴学”四字来说明他的办学热忱，应该更确切一些。

陈嘉庚为什么要兴学呢？他在一九一六年《致集美学校师生

① 陈厥祥《集美志》第70页。

② 《南侨回忆录》，一九七九年香港时代书局版，第17页。

③ 《南侨回忆录》，“战后补辑”。

书》中说：“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直追，难逃天演之淘汰。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以撓吾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殫心力而为之，唯日孜孜无敢返豫者，正为此耳！”在一九一九年为筹建厦门大学的演讲词中说：“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唯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若并此而无之，是置国家于度外，而自取灭亡之道也！”很明显，陈嘉庚兴学的动机完全是为了救国，他是一个典型的教育救国论者。以往对教育救国论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指责，我们不暇在此一一详辨，但想着重指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尚未发生，读书救国论、教育救国论还没有盛行到足以成为广大青年参加革命的阻力的时候，一个海外商人出身的陈嘉庚，能以国家民族的存亡为重，不惜“牺牲金钱，竭殫心力”为发展教育、启迪民智而奔走呼号，不管怎么说，都是值得我们钦敬怀念的。即使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蓬勃发展以后，也不应该把教育与革命绝对对立起来。越是具有现代文化的人，越容易接受先进的革命思想而献身于革命，这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吗？

陈嘉庚在祖国的兴学活动主要集中于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的建立上。集美是他的故乡，从一九一三年创设两等小学开始，经过抗战中被迫合并内迁和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的轰炸破坏，到一九五六年全部修复，前后四十多年间，举凡经费的募集，校舍的修建，设备的充实，校长的聘请以及办学方针的制订，陈嘉庚无不悉心筹划，全力以赴，四十余年如一日，可以说是他的一生心血所聚。虽然几经挫折，学校的规模仍然不断扩大，从普通中小学发展到拥有师范（男子、女子、幼稚）、水产、航海、农林、商业、华侨补习、国学专门部等七八所中等专科以上学校的学村，附设有科学馆，图书馆、医院、发电厂、大会堂、游泳池等现代

化设备，学生人数最多时达一万一千余人。象这样规模巨大、设备齐全的学村，在全国还没有第二处。厦门大学创建于一九二一年，是福建省的第一所大学，也是由华侨创立，注意培养华侨学生的第一所大学。在创建时，陈嘉庚独力承担开办费一百万元，经常费三百万元。他计划中的厦门大学，校舍面积应有两千多亩，学生人数三、四万人，除文、法、理、工、教育等学院外还准备增设医、农两学院。他自揣力量有限，计划开办两年略具规模后亲向东南亚各地富侨募捐，结果是到处碰壁。最初每年须负担集美厦大两校设备费和经常费八九十万元，一九三〇年营业失败以后，逐渐缩减为三四十万元，很多人劝他停止校费以维持营业，陈嘉庚担心两校“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责大”^①；仍毅然忍痛承担，竭力支撑，直到一九三七年初，始将厦门大学让给国民党政府接办，以便集中力量办好集美。

陈嘉庚在东南亚的兴学活动，开始于一九一〇年担任新加坡道南学校总理之时，接事未久，他就向侨胞募款五万余元扩建校舍。一九一八年，又多方奔走，募捐五六十万元，创办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这是东南亚华侨自办的第一所高级中学，也是聘请国内教师，使用国语教授的第一所华文中学。初建时仅有教师十人，学生七十三人，以后发展为拥有一百多名教师和千余名学生的设备齐全的学校。在陈嘉庚模范行为的带动下，东南亚各地华侨捐资兴学，蔚然成风，华文中小学的设立“几如雨后春笋”，抗战前夕达到三千余校，男女学生四十余万人，教育和国语普及的程度超过国内。这对于华侨文化水平、民族意识的提高及其与祖国联系的加强，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

在教育救国思想的指引下，陈嘉庚十分注意普及教育。早在

^① 《南侨回忆录》“个人企业追记”。

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创办厦大、集美两校期中，他曾发起组织同安教育会，自捐开办费一万元，常年费五千元，按学生名额对各乡立小学进行补助。接着又提出“十年普及教育计划”，每年由同安旅外华侨捐款（或通过补助）设立小学二十所，十年二百所，一九二一——一九二二两年间先后设立了四十所，后因捐款不继而中止。这样新设的学校，质量虽不一定有保证，但他认为“质虽欠佳，而量则愈多愈妙”，仍然竭力坚持下去，从同样思想出发，在兴学过程中，他始终把师范教育放在首位而极力加以提倡。一九一八年集美学校开学时，分师范、中学两部招生，师范生三班，中学生二班，中学生只交膳费，免交学宿费，师范生则各费全免，并由闽南各县招选贫寒子弟三四人至五六人入学。一九二〇年，又增设女子师范和幼稚师范两校，一九二一年厦门大学成立时，也分为师范和商业两部，师范部下又分设文、理两科。在南洋华侨中学办有成绩之后，陈嘉庚又坚决排除当地国民党人所设置的种种障碍，于一九四一年创办了新加坡南洋华侨师范学校。我国封建主义有数千年的历史，要清除封建影响，转弱为强，迅速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实为根本之图。陈嘉庚在兴学活动中重视普及教育，应该承认这是很有见地的。

陈嘉庚只管兴学，不管办学。他所创办的几十所学校，所有教学行政完全由校长全权处理，“绝不干涉”。尽管这样，在长期的兴学实践中，他对教育方针、制度、设施和华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也形成了自己一套的看法。关于教育方针，他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反对“如机械一样”的读死书。他说：学校教育，“不但教其识字而已，其他如知识、思想、能力、品格、实验、体育、园艺、音乐以及其他课外活动，均须注重，与正课相辅而行。”^①关于提高教育质量，他提出要注意三件事：第一要有科

^① 《华侨中等教育之重要》，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九日《南侨日报》。

学馆、图书馆的设备，第二要严选教师，第三要优待学生，特别是贫寒子弟，不仅免收学费，连衣食住书籍等费也应由国家全部负担^①。关于专科学校的设置，他认为福建海岸线长，海洋资源丰富，应该首先办好航海、水产等专科学校。关于东南亚华侨教育，他主张除各大帮各保留一所会馆外，所有府以下的会馆和同宗会应全部解散，其产业移交华侨教育会管理，然后按地区分别设立师范、高中、初中、高小、国民各级学校，招收华侨学生，并且完全采用祖国学制，以便毕业后回国升学^②。在今天看来，这些看法还有不少值得参考之处。

四 关于陈嘉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活动

陈嘉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活动，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以反对日本侵略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反对美国干涉为主。不管它是怎样强大、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只要它妄图干涉、侵略祖国，陈嘉庚就毫不犹豫地坚决、彻底地加以反对。

陈嘉庚第一次站出来反对日本侵略，开始于一九二八年日本出兵占领青岛、济南之役。在担任“山东惨祸筹赈会”主席期间，他到处奔走，募得国币一百三十余万元汇往南京施赈，并积极发动抵制日货运动，虽所办橡胶厂被奸商放火焚毁亦绝不后悔。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四省迅速沦陷，陈嘉庚悲愤异常，立即召开新加坡侨民大会，致电国际联盟表示强烈抗议，同时把抵制日货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发

① 《华侨中等教育之重要》，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九日《南侨日报》。

② 《我之华侨团结观》，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生，陈嘉庚剑及履及，联合东南亚各地华侨，组成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筹赈总会”），号召全体侨胞踊跃输将，先后募得国币两亿多元，汇回国内，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战。一九三八年，南京失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发表主和言论，陈嘉庚不顾私人交谊，去电痛斥汪精卫是“秦桧卖国求荣”，并向当时的国民参政会提出了“敌未退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这一个“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①，给当时喧嚣一时的主和论以沉重的打击。陈嘉庚坚决主张抗战到底，反对一切妥协、投降活动，后来在一九四〇年回国慰劳期间所以日益不满意国民党而寄同情于共产党，主要是因为他看清楚了国民党完全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只有共产党在真诚奋勇抗战的缘故。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牺牲，付出了极大伤亡的代价，好不容易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可是，正当战争疮痍未复，和平统一在望的时刻，蒋介石集团却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撕毁墨汁未干的“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发动了一场“美国人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②当时有些人光知道反对蒋介石独裁，而不知道反对美国的干涉，对美国存在有这样那样的幻想。陈嘉庚只眼独具，很快就看出了美国的干涉是中国内战发生和扩大的根源。一九四六年九月七日，他以“南侨筹赈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参众两院议长，劝告美国顾全国际信誉，撤退在华驻军，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否则“中国将视美国为日本第二。”这一义正词严的电报，经过路透社和合众社电讯传播到世界各地，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巨大震动。接着，他又连

① 邹韬奋《抗战以来》。

② 《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80页。

续发表了《美借款与我国纸币》（一九四七年四月）、《论美国救蒋必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从未来大战形势论美国不敢以军事援蒋》（一九四八年三月）等等，针对一部分民主人士中间存在的恐美、崇美心理，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本质，用大量事实说明：原子弹并不可怕，美国既不会出兵中国，也不敢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也只能加速它自己的灭亡。在当时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中，一个商人出身的陈嘉庚，单凭从报章上得来的知识，就能作出如此深刻、准确的判断，不能不说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应该指出，陈嘉庚当时所反对的，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内政的无理干涉，而不是美国人民。他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对美联社驻新加坡记者马斯特逊的谈话中，明确地指出：“如果欧美各国都能以平等原则对待中国，则我们当然欢迎他们跟中国通商。”在谈到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时，他说：“如果美国的对华政策改变，这种情绪当不致继续，因为我们充分了解，坚持目前美国对华方针的，是美国的执政者，而不是美国人民的意见。”^①

五 关于陈嘉庚反对封建专制的活动

陈嘉庚的反封建活动也可以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抗日战争以前，以反对封建王朝、军阀统治和旧时代的风俗习惯为主，基本上停留在发表言论和主张上，实际行动并不很多；抗日战争后期，在逐渐看清楚蒋介石政权的反动独裁本质以后，就勇敢地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与国民党人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

在辛亥革命思潮的影响下，陈嘉庚于三十七岁那年（一九一〇）

^① 《与美联社记者马斯特逊谈我国新局势》，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剪去辫发，与清王朝决裂，自是即积极参加同盟会的活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从路透社电讯得悉福建光复政府成立，立即召集福建华侨开会，汇款接济，对孙中山的政治活动也筹款相助。在民国初年南北对立的国内政争中，他始终站在国民党人一边，坚决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他遵循孙中山关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训，提出了除了政治革命以外，“工业需要革命，文化需要革命，还有更重要的一项，就是心理革命和人格革命”^①的主张。在经济问题上，他反对华侨“挟资回里，……放钱债，高利息，购良田”，因为“田地有限，原为农村生命线，一归大地主，则农民不能自存，”^②表现出不赞成高利贷剥削和土地兼并的倾向。在服制问题上，他反对穿着清代遗留下来的长衣马褂，认为“违背革命真理，保存亡国风气，其弊自可胜言！”除了撰写《复兴民族与服制》一文详陈利弊外，又于一九三八年正式向重庆国民参政会提出改革建议，未获通过。在丧仪问题上，他在一九二八年担任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期间，曾召集侨胞公议，革除治丧中宴饮浪费旧俗，规定“死后不得留棺过七天”，认真执行，“颇生效力”。此外，对于当时流行的许多“陋俗”，如“嫁娶丧葬，浪费铺张；演戏酬神，昼夜聚赌；无谓应酬，酒食征逐；迷信风水，停柩不葬；少年早婚，蓄童养媳”等等，他认为这些都足以“费金钱，损精神，败风俗，妨治安”，而极力加以反对并亲自撰写《民俗非论集》一书，印刷数十万册，广泛散发，以资宣传。这些方面的活动，在他生平所兴办的事业中，虽然只占不很重要的地位，但在他全力投入支援祖国抗战以前，却始终与他的兴学活动相辅而行，具有一定的

① 《在怡和轩欢迎国术南游团会上的演词》载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日《南洋商报》。

② 《畏惧失败才是可耻》，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7号，一九三四年四月。

反封建的意义。

在对待以蒋介石为首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认识和态度上，陈嘉庚经历了一个由拥护到怀疑，由怀疑到反对，由反对到坚决打倒的一个不平凡的过程。

在很长一个时间内，陈嘉庚把蒋介石奉作国家民族的唯一的“最高领袖”，把蒋介石支配下的国民政府看作祖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而加以真诚的拥护。一九二八年南京政府甫告成立，他即把“拥护南京政府为首要目的”定为《南洋商报》的必守规则，在办事处公开悬挂。一九三六年初，李宗仁、陈济棠联合反蒋，另组西南政府，陈嘉庚以侨民大会主席名义去电谴责。同年秋季，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国民党人发起捐资献机祝寿运动，原分配马来亚华侨捐献飞机一架，陈嘉庚积极劝募，超额完成了十三架。双十二西安事变发生，他愤怒至极，把张学良所赠相片摔掷地上，去电责张“自坏长城，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抗战初期，他又把南侨筹赈总会募来的捐款两三亿元扫数汇与南京行政院。直到一九四〇年亲率慰劳团回国，由于蒋介石对他优礼有加，殷勤备至，他更不能不感到，“蒋委员长待余极厚，深情厚意，终身不忘。”可是，当他亲眼看到蒋介石宠任的“军政要人”不是昏庸老朽，贪污无能，就是朋比为奸，残民以逞，蒋介石为人也是诈伪成性，贪权国位，一意孤行，很难有改变的希望时，他对这些人的看法，就从希望一变而为失望，再变而为绝望。等他到了延安，经过多方面的深入调查考察，亲睹共产党人“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井然”种种动人事迹，相形之下，陈嘉庚“衷心无限兴奋，喜慰莫可言喻，……前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①自是，他就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

^① 《陈嘉庚言论集自序》，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

上，而对于一心一意必欲消灭共产党而后快、置国家民族存亡于不顾的蒋介石，就自然而然地站在相对立的地位了。

由于对蒋介石集团有如此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所以在抗战胜利后反对蒋氏封建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陈嘉庚的态度始终是鲜明、坚定的，没有半点的含糊与动摇。一九四五年十月，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的喜讯传到新加坡，许多人都以为祖国统一在望，但是，陈嘉庚却采取保留态度，担心和平很可能因为“蒋介石没有诚意而破裂”。他清醒地估计到，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民主力量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反动独裁力量犹如“薰莸不同器，水火不相容”，不可能糅合在一起，也不应该糅合在一起，因为这样“不经过流血斗争”而“获得的和平”，不过“等于民国初年的让位给袁世凯，更加促成他的专制罢了。”^①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陈嘉庚所料，大家都为他的真知灼见、料事如神而感到惊奇和佩服。在解放战争进行期中，陈嘉庚先后发表了《祖国光明在望》、《蒋介石的最大错误》、《蒋介石表示不要做总统》、《中国内战何日告终》、《国共决无和平可言》、《再论中国内战前途》、《从历史经验证明蒋政府必败》等多篇文章，坚决主张“集全民之力量，毕革命之事功，以为一劳永逸之计。至若姑息养奸，养痍貽患，民主革命功亏一篑，则再历三十六年，恐亦无宁息之日！”^②这种革命到底的精神，比起当时民主阵营中某些“中间路线论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应该指出，陈嘉庚所以那样真诚地拥护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绝不是因为他信仰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认为共产党在延安所实

① 《独裁绝没有前途，民主必经大流血》，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

② 《新岁献辞》，一九四八年元旦，载《陈嘉庚言论集》，一九四九年新加坡南侨报社，第17页。

行的就是三民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不可能具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世界观，但却忠实地继承着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传统，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谁能救国救民就拥护谁。就这一点说，陈嘉庚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三民主义者，比起那些满口“三民主义”，一心只想依靠外力，保持党派私利，甚至不惜阻挠祖国统一的假三民主义者之流又不知高明多少倍！

六 对于陈嘉庚的评价

陈嘉庚是当代华侨最杰出的领袖，是华侨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

第一、陈嘉庚是华侨史上第一个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活动集合于一身的领袖人物。他以经营企业起家，在凭借财力倡导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卓著成效之后，进而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最后成为广大侨胞共同敬仰的威信很高的领袖。他不仅是一个著名的企业家、慈善家、兴学家和社会改革家，而且还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尽管他经常自称“不懂政治”。

第二、他是华侨史上第一个把东南亚各地华侨组织在一个统一的团体之内的领袖人物，在他所倡导的“南侨筹赈总会”存在的十多年间（一九三八—一九四九），东南亚华侨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统一的组织，第一次有了共同奋斗的目标和共同行动的纲领，因而也就第一次能够在许多有关切身利益问题上团结起来，采取联合一致的行动，从而对当时东南亚的局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三、他是华侨史上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捍卫华侨利益的领袖人物。他曾经顶住英国殖民政府的压力，向国联调查团揭露鸦片公卖政策对华侨的毒害，在新加坡参事局中反对限制华人种植

水稻，致函新加坡总督抗议驱逐侯西反出境，发表声明驳斥英国殖民军司令白思华中将对华人的诬蔑，谴责荷兰殖民军屠杀巨港华侨，积极调查华侨在二次大战中的损失，筹建华侨死难纪念碑，致电苏加诺要求共同维护印尼人民与华侨的友谊等等。他的公正言论和斗争精神赢得广大侨胞的钦敬和信任，使他成为华侨利益的捍卫者和代言人。

第四、陈嘉庚是华侨史上第一个把东南亚华侨利益与祖国命运密切联结在一起的领袖人物。他一方面通过倡办华文中学和华文报刊，使广大侨胞的文化水平和民族意识迅速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通过自己在祖国兴学和支援祖国抗战等模范行动，有力地推动了广大侨胞更加关心祖国，热爱祖国，积极参加祖国的改革和建设。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东南亚侨胞与祖国关系的密切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

陈嘉庚是属于华侨出身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一生所做出的贡献，他可以说是孙中山以后中国现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

一九八一年四月

陈嘉庚年表

-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阴历九月十二日），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父陈杞栢是新加坡的侨商。
- 1882年（清光绪八年）九岁。在南轩私塾就学，塾师陈寅。
-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十七岁。应父函召，第一次出洋，到新加坡。
- 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十八岁。在其父所营顺安米店学商，助理货银账项。
-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二十岁。归国与张氏成婚。
-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二十二岁。第二次出洋到新加坡，仍在顺安米店营商。是年，清政府将台湾割让日本。
-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二十五岁。回国葬母，因风水先生言正穴方位不合，乃停柩墓侧以待。
-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二十六岁。携妻张氏第三次出洋，仍在顺安米店营商。
-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二十七岁。归国葬母，在厦门购地建筑店屋。
-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三十岁。第四次出洋。其父所营顺安等号连年亏损甚巨，宣告停业。
-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三十一岁。因陋就简，创立了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并接办日新公司，三个月间获利近四万

元，增设米店一间，名曰谦益。

1905年 （清光绪三十一年） 三十二岁。购地五百英亩种植菠萝，名曰福山园。增设日春菠萝罐头厂，兼制冰糖。

1906年 （清光绪三十二年） 三十三岁。在福山园菠萝树间套种橡胶种子，这是经营橡胶种植业的开始。冬，与人合办恒美米厂，制造熟米，专销印度。

1910年 （清宣统二年） 三十七岁。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剪去辮发，这是参加政治活动的开始。被举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协理，被举为新加坡道南学校总理（后改董事长），向闽侨募捐五万余元，建筑校舍，这是致力教育事业的开始。在柔佛垦辟橡胶园两处，一名祥山园，一名福山园。

1911年 （清宣统三年） 三十八岁。辛亥革命胜利，福建光复，被推为福建保安会会长，筹款二十多万元支援福建财政，另筹五万元接济孙中山。

在暹罗北柳创设谦泰菠萝罐头厂。

1912年 （中华民国元年） 三十九岁。携眷回国，筹办集美小学校。

聘请日本技师在集美试制海蚝罐头，失败。

1913年 （民国二年） 四十岁。集美小学校正式开学，购地扩建校舍和操场。第五次出洋，停闭北柳罐头厂和笨珍港祥山园。

1914年 （民国三年） 四十一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罐头厂和熟米厂被迫停产。

1915年 （民国四年） 四十二岁。租轮四艘，经营航运，获利颇巨。

筹款二十余万元救济天津水灾。

1916年 （民国五年） 四十三岁。购进三千吨轮船一艘，名为

东丰。将一部份罐头厂改建为制胶厂。

- 1917年 （民国六年） 四十四岁。购进三千七百五十吨轮船一艘，名为谦泰。将熟米厂改建为制胶厂。因两年来营业顺利，派弟敬贤回国创办集美中学和集美师范学校，积极扩建校舍。
- 1918年 （民国七年） 四十五岁。两轮被德国潜艇击沉，将所得保险赔款在柔佛购进胶园一千英亩，名大同橡胶园，又开垦荒山二千英亩种植橡胶。
集美学校师范部和中学部正式开学。发起筹办新加坡华侨中学。
- 1919年 （民国八年） 四十六岁。春，新加坡华侨中学校正式开学，这是东南亚华侨自办的第一所华文中学。五月，回国积极筹办厦门大学，认捐开办费一百万元，经常费三百万元。组织同安教育会，对各乡小学校给予常年补助，受益者三十余校。
- 1920年 （民国九年） 四十七岁。集美学校增设女子师范和商科。创办集美水产航海学校。
- 1921年 （民国十年） 四十八岁。厦门大学在集美开学，聘林文庆为校长，在演武场兴建校舍。
- 1922年 （民国十一年） 四十九岁。第六次出洋。在马来亚增设橡胶厂九所，积极扩展橡胶制造业。印行《验方新编》，广泛赠送。
- 1924年 （民国十三年） 五十一岁。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商报》。积极扩展橡胶熟品制造厂，自制各种橡胶、靴鞋、医药和日常生活用品，开设分店十余处自行推销。
- 1925年 （民国十四年） 五十二岁。在柔佛购入橡胶园七千余英亩，在新加坡也买入一千多英亩。是年，各项营业获

利近八百万元。“实有资产共约一千二百万元”，是他“一生中登峰造极，得利最多及资产最巨之时”。

1926年（民国十五年） 五十三岁。扩建南洋华侨中学校舍。创办集美农林学校。

胶价暴跌，营业亏损甚巨，被迫将厦大集美两校校舍建筑工程局部停工，但经常费仍竭力维持。

1928年（民国十七年） 五十五岁。五月三日，日军侵占济南，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募款救济受祸难胞。熟胶品制造厂被奸商放火烧毁，产品又遭日制胶品削价倾销，资产损失过半，仅余五六百万元。

1931年（民国二十年） 五十八岁。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袭击下，各项营业每况愈下，欠债无力偿还，被迫接受债权人条件，将所余资产估值二百余万元改组为陈嘉庚股份有限公司，由董事会管理，陈任总经理，银行另派一人为副经理，限定每月补助厦集两校经费五千元。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 六十岁。因不愿接受外国银行控制，将陈嘉庚有限公司及所属各工厂全部停闭结束。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六十四岁。七七抗战发生，发起组织新加坡筹赈会，被推担任主席，捐募新加坡币一千万，支援祖国抗战。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 六十五岁。被选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

致电汪精卫反对其主张同日本谈和，并向国民参政会提出“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议案，获得通过。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六十七岁。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并冲破当地国民党人的种种阻挠破坏，率领该

团于三月初由仰光飞抵重庆视察。五月访问延安，深为共产党人艰苦朴素、浴血抗战的精神所感动。七月，在重庆国民外交协会演讲西北观感。九月，回福建视察。反对陈仪祸闽暴政。十二月返抵新加坡、公开揭露蒋介石集团祸国殃民罪行，颂扬中国共产党。

1941年 （民国三十年） 六十八岁。召开南侨总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重新当选为第二届主席。组织南洋闽侨总会。创办南洋华侨师范学校。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领导组织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

1942年 （民国三十一年） 六十九岁。新加坡沦陷，避居爪哇前后三年。在此写成了《南侨回忆录》和《住屋与卫生》。

1945年 （民国三十四年） 七十二岁。八月，日本战败投降，经雅加达回抵新加坡，调查华侨在战争中损失。

1946年 （民国三十五年） 七十三岁。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和美国参众两院，反对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挑起内战，反对美军驻扎中国。
创办新加坡《南侨日报》。

1947年 （民国三十六年） 七十四岁，召开新加坡华侨大会，反对荷兰殖民军屠杀巨港华侨暴行，议决准备对荷兰实行经济制裁。发表《南侨总会第十五号通告》宣布国民党独裁政府罪状。

1948年 （民国三十七年） 七十五岁。在《南侨日报》发表《新岁献词》，主张把革命进行到底。
发表《南侨总会第十六号通告》否认伪国大所选举的伪总统与任何国家订立的丧权卖国条约。

1949年 （民国三十八年） 七十六岁。应毛主席电邀，抵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及第一届第一次会议，被

- 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会员。到东北、华东、中南等新解放区视察访问。
- 1950年 七十七岁。最后一次出洋到新加坡，结束未了事务。不久回国，从此定居于家乡集美，主持厦大、集美两校校舍的修建。刊行《新中国观感集》。建议修建福建铁路。
- 1951年 七十八岁。在全国人民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发言，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进犯朝鲜。
- 1953年 八十岁。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建议填筑厦门——集美海堤。
- 1954年 八十一岁。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 1955年 八十二岁。视察东北、华北、西北、西南等地。
- 1956年 八十三岁。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发言，拥护和平解放台湾。
- 当选为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 1959年 八十六岁。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会上发言，“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容许任何国家进行干涉。
- 创立厦门华侨博物院。
- 1961年 八十八岁。在北京逝世，遗体移集美家乡安葬。

主要参考书目

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

《陈嘉庚言论集》

《新中国观感集》

《民俗非论集》

《住屋与卫生》

中华全国归国

华侨联合会编：《陈嘉庚先生纪念册》

陈厥祥著：《集美志》

杨进发著：《战前的陈嘉庚言论史料与分析》

魏应麟著：《陈嘉庚传》

郑良著：《陈嘉庚》

王增炳 余纲著：《陈嘉庚兴学记》

陈碧笙著：《陈嘉庚年谱》

南洋华侨筹赈总会编：《南侨正论集》

厦门《集美周刊》

厦门《厦大周刊》

新加坡《南洋商报》

新加坡《南侨日报》

仰光《仰光日报》

香港《大公报》

重庆《新华日报》

厦门《厦门日报》